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9卷



湖南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
（1944年7月14日）
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 ……13
（1944年7月15日）
和武道的谈话 ……16
（1944年7月18日）
致各战略区电 ……18
（1944年7月22日）
在《德国的内战》上加写的一段话 ……19
（1944年7月24日）
给谢觉哉的信 ……20
（1944年7月28日）
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 ……22
（1944年7月28日）
和王震谈组织南下支队问题 ……25
（1944年7月）
发展沪杭周围及沪宁路沪杭路两侧的游击战争 ……28
（1944年8月3日）
致林伯渠电 ……29
（1944年8月6日）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30
（1944年8月12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 ……33
（1944年8月12日）
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 ……34
（1944年8月13日）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39
（1944年8月15日）
在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电上的批语 ……54
（1944年8月17日）
致董必武、林伯渠电 ……55
（1944年8月18日）
复李先念等电 ……56
（1944年8月21日）
复张云逸等电 ……57
（1944年8月21日）
给陈毅的信 ……58
（1944年8月21日）
对华中部队整训的意见 ……59
（1944年8月22日）
复林伯渠等电 ……62
（1944年8月22日）
给续范亭的信 ……63
（1944年8月22日）
和谢伟思的谈话 ……64
（1944年8月23日）

致董必武电 ……77
（1944年8月29日）
给秦邦宪的信 ……78
（1944年8月31日）
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81
（1944年9月5日）
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 ……86
（1944年9月6日）
致张云逸、饶漱石等电 ……91
（1944年9月7日）
致晋西北、晋察冀电 ……92
（1944年9月7日）
为人民服务 ……93
（1944年9月8日）
为张思德题写挽词 ……97
（1944年9月8日）
复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电 ……98
（1944年9月9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 ……99
（1944年9月11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00
（1944年9月12日）
复罗荣桓、黎玉、萧华电……101
（1944年9月14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02
（1944年9月15日）

坚持为人民服务……103
（1944年9月18日）
为张侠题词……105
（1944年9月18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电……106
（1944年9月18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07
（1944年9月18日）
驳国民党政府提示案……108
（1944年9月19日）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111
（1944年9月21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14
（1944年9月22日）
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18
（1944年9月27日）
致吕正操、林枫电……123
（1944年9月30日）
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124
（1944年10月1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29
（1944年10月7日）
张平群发言错误，人民要求立即改组政府与统帅部……130
（1944年10月8日）
对《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抨击英首相丘吉尔演说》的批语……132
（1944年10月8日）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134
（1944年10月11日）
关于建立豫西根据地的部署……138
（1944年10月14日）
军委关于准备对付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致邓小平、滕代远等电…140
（1944年10月14日）
在董必武、林伯渠来电上的批语……142
（1944年10月19日）
对即将去前线干部的讲话……143
（1944年10月25日）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47
（1944年10月30日）
对随军南下干部的讲话……150
（1944年11月1日）
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55
（1944年11月2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57
（1944年11月6日）
和赫尔利的谈话……158
（1944年11月8日）
电贺罗斯福当选连任……166
（1944年11月10日）
延安协定草案……167
（1944年11月10日）
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169
（1944年11月10日）

华南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广西与南路……171
（1944年11月14日）
为悼念邹韬奋逝世题词……173
（1944年11月15日）
在一份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情况通报上加写的一段话……175
（1944年11月15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76
（1944年11月19日）
给郭沫若的信……177
（1944年11月21日）
给柳亚子的信……179
（1944年11月21日）
给沈雁冰的信……181
（1944年11月21日）
在周恩来同赫尔利会见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83
（1944年11月21日）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民党党政人事调动* ……184
（1944年11月22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86
（1944年11月23日）
复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电……187
（1944年11月24日）
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188
（1944年11月24日）
致周恩来电……189
（1944年11月25日）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190
（1944年11月）
给陈毅的信……191
（1944年12月1日）
给谢觉哉的信……194
（1944年12月1日）
复周恩来电……196
（1944年12月1日）
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197
（1944年12月4日）
复王震、王首道电……198
（1944年12月4日）
和包瑞德的谈话……199
（1944年12月8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6
（1944年12月9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207
（1944年12月12日）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209
（1944年12月15日）
给赫尔利的信……219
（1944年12月16日）
晋察冀部队应努力向日军占领区发展……220
（1944年12月18日）
在王树声、戴季英的电报上的批示……221
（1944年12月19日）

怎样办地方报纸……222
（1944年12月20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223
（1944年12月20日）
给邓宝珊的信……224
（1944年12月22日）
复赫尔利电……226
（1944年12月22日）
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227
（1944年12月24日）
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228
（1944年12月25日）
复邓小平电……229
（1944年12月25日）
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电……230
（1944年12月25日）
致王震、王首道电……231
（1944年12月30日）
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232
（1944年冬）
两次为中央直属机关群众代表大会奖状题词……234
（1944年12月）
对薄一波一份自我检查的批示……236
（1944年）
和王树声的谈话……237
（1944年）

和G·斯坦因的谈话 ……238
（1944年）
新年献词——争取胜利早日实现* ……241
（1945年1月1日）
在延安干部新年晚会上的讲话……245
（1945年1月1日）
和郭述申等的谈话……246
（1945年1月1日）
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247
（1945年1月3日）
复太岳区党委电……250
（1945年1月5日）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251
（1945年1月10日）
给刘昆林的信……259
（1945年1月11日）
关于召开国事会议预备会议给赫尔利的信……261
（1945年1月11日）
给和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的指示……262
（1945年1月24日）
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和国民大会等问题致周恩来电……263
（1945年1月28日）
和林伯渠等的谈话……265
（1945年1月30日）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266
（1945年1月31日）

关于劳动英雄的讲话……269
（1945年1月）
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271
（1945年2月3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272
（1945年2月3日）
延安权威人士驳斥魏道明谎言* ……273
（1945年2月4日）
复周恩来电……275
（1945年2月5日）
挽彭雪枫联……276
（1945年2月7日）
为彭雪枫题写挽词……277
（1945年2月7日）
给孙毅的信……278
（1945年2月7日）
坚决打击反动者，争取较好者……280
（1945年2月11日）
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巩固根据地……281
（1945年2月11日）
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电……282
（1945年2月11日）
复周恩来电……283
（1945年2月11日）
给秦邦宪的信……284
（1945年2月12日）

接见中共中央军委通讯局春节拜年同志的谈话……287
（1945年2月13日）
对延安地区拜年团的讲话……289
（1945年2月14日）
时局问题及其他……290
（1945年2月15日）
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311
（1945年2月17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315
（1945年2月18日）
给萧三的信……316
（1945年2月22日）
为苏联红军纪念日致斯大林元帅的贺电……319
（1945年2月22日）
复河南区党委电……320
（1945年3月1日）
给王梓木的信……321
（1945年3月2日）
在王若飞三日来电上批注的一些意见……322
（1945年3月5日）
电唁A·托尔斯泰之丧 ……324
（1945年3月6日）
在王若飞六日来电上的批示……325
（1945年3月7日）
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326
（1945年3月8日）

给王枚的信……329
（1945年3月10日）
和谢伟思的谈话……330
（1945年3月13日）
给任弼时的信……337
（1945年3月24日）
给李富春的信……338
（1945年3月29日）
对河南区党委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的复示……339
（1945年3月30日）
复王震、王首道电……342
（1945年3月30日）
建立湘北根据地然后南进……343
（1945年3月31日）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344
（1945年3月31日）
关于布置接收第一架起义飞机致华中局电……351
（1945年3月）
和谢伟思的谈话……353
（1945年4月4日）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354
（1945年4月9日）
对《新华日报》五日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的批语……357
（1945年4月9日）

关于太岳四四年生产情况与四五年生产计划的报告给太岳区党委的复示……358
（1945年4月12日）
关于罗斯福逝世的唁电……359
（1945年4月13日）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360
（1945年4月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367
（1945年4月21日）
两个中国之命运……382
（1945年4月23日）
论联合政府……385
（1945年4月24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454
（1945年4月24日）

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

（1944年7月14日）

斯坦因（以下简称斯）：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

---

[1] 这个谈话原载斯坦因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1946年7月曾由晨社译成中文出版。这次收入本文集，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按英文原版重新翻译。斯坦因（1900—1960），出生于德国柏林，1941年加入英国国籍。1944年，作为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关于毛泽东同斯坦因的这次谈话，斯坦因曾将谈话记录送毛泽东过目。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说：“我的访谈笔记翻成中文送给他看，以确保笔记的准确无误。几乎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没有把笔记还我。一天，我偶然遇到了他，他抱歉说，‘我必须把我告诉你的一切，征求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他们同意了’。我的访谈笔记还回来了，未作任何修改。”“我把有关的访谈要点发表如下，不加一点我个人的评论，以确保其文献性。”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这就是一九四〇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党员的观点。那时我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斯：你所考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正是由于在我们作战的区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我们

才从一开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军队，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一九三七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你们在内战时所采取的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激进政策是否还将实行？

毛：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

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

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斯：共产党对土地政策的改变，在当时是如何决定的？

毛：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我们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加以实施。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

实行一切土地逐步转移给耕种者的方法，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同时还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于地主、佃农，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

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取决于真正的国内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

实现。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全部地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战后国民党坚持进攻我们的话，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

但是，不管将来国内是和平还是内战，我们宁愿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减租和交租的政策，因为总的说来这将减少前进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我想提醒你一下，一九三〇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一个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佃农主要作物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对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不能够、也不愿意将土地法付诸实施，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因此，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仅是减租的方式。

斯： 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

毛： 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产党打算在战后的中国起什么政治作用呢？

毛：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区域内一切抗日的人们的意见。共产党愿意并且时刻准备同所有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人密切合作。这种愿望表现在我们的民主代表制性质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选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斯：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毛：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合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假使国民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话。而且，我们将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履行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对国民党许下的四项诺言。

斯：关于四项保证，在重庆时我常听到人们笼统地提到它及其附带的条件，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毛：我们允诺：（一）不继续实行我们过去实行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三）把边区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民主政府；（四）将我们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1]

---

[1] 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保证实行以下四项：（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我们那时说过，我们将履行自己所声明的诺言，但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一）停止内战；（二）对日作战；（三）推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1]

斯：对目前的政策，或对你所阐述的中国远期目标，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反对意见？

毛：没有，现在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意见。在以前的时候有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的反对意见早已毫无影响。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死了。另一种是张国焘的偏向，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抗党的正确路线，最后孤身一人离党而去。现在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这两种偏向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团结，而且没有留下影响团结的痕迹。

斯：你是说你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

毛：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末，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

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

---

[1] 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所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

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末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这种观察实际情况，研究好的和坏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时间，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有时可能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政策，在执行政策

过程中犯了错误，对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批评和教育。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透彻地研究和分析一个工作中好的例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天的《解放日报》来说吧，有一篇长文章[1]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它详细讲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如何改正缺点成为一个最好的连队。我们军队的每个连的干部和战士都要阅读、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做法，利用一个连队的好经验对五千个连队进行政策教育。今后你还会看到有关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或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类似的文章。

我们再来谈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很坚决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错误，纠纷和误解仍然不断发生，到处还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在包办一切。因此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党人士有实际权力的重要性。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要向所有同志具体讲明，我们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仅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党和非党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们必须通力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了。

斯：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在政策上犯过重大的错误？

毛：在所有基本点上，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只是在把这些基本政策应用于具体情况时，有时才容易出现某种偏向，有“左”的，有右

[1] 指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军委总政治部写的《警七团的第七连》一文。

的。然而，这些偏向并不是全党性的，也不是党内某个派别的，而是党内某些人的。从这些错误中，全党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某些时期，我们党内曾有几个人相信共产主义现在就可以在中国实行了。但是，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使共产主义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在我们党内不可能有一个主张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小集团存在。

国民党断言在我们党内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这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自身被派别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党，也许这就是这样的谣言在重庆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斯：你是否有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你对某个问题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

毛：是的。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

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

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二十三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二十三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

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三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

（1944年7月15日）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2]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四十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四个师团，蒋军近四十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3]有十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地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十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

---

[1] 这份电报的发出时间是1944年7月19日，发给李先念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

[2] 蒋，指蒋介石。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1]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2]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其余三十七万军队、二百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3]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

---

[1] 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

[2] 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1944年6月20日到达重庆，进行“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

[3] 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1]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的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1] 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和武道的谈话[1]

（1944年7月18日）

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前，我们在一段长时间内克制对国民党的批评，因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然而发生了国民党进行军事威胁的七月事件，我们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批评。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在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和共产党的分歧应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从那时到今年五月，我们没有进行批评。最近提出的批评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国民党军队没打好，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第二，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批评比我们尖锐激烈得多，并指出中国有不抵抗的危险。鉴于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才提出批评。为了改变局势，国民党必须改变它的根本政策，它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的谈话的一部分。

域采取同人民团结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得到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

致各战略区电[1]

（1944年7月22日）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1] 这是毛泽东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中共的态度等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电的主要内容。

在《德国的内战》上加写的一段话[1]

（1944年7月24日）

现在不单是外国人反对希特勒，而且德国人——希特勒的同僚们反对希特勒了。希特勒政策走到了它的反面，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

目前阶段的德国内战，还只表现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还不是从人民方面发动的。但是国防军的叛变，是站立在德国人民反希特勒情绪日益高涨的基础上面的。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德国人民。

---

[1] 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经他审阅修改的时评《德国的内战》上加写的一段话。这里所说的德国的内战，指1944年7月20日由国防军领袖组织的发生在元首大本营的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和国防军在柏林等地发动的兵变。

给谢觉哉[1]的信

（1944年7月28日）

觉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2]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3]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4]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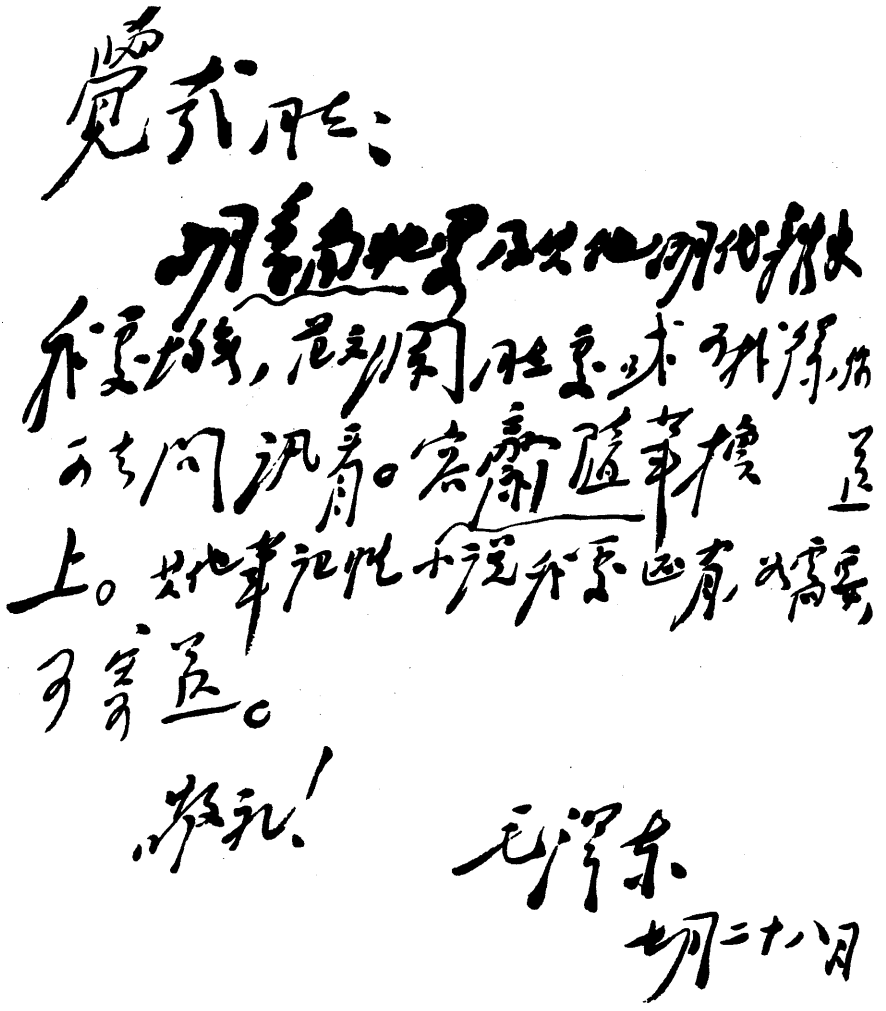
---

[1] 谢觉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 指清初计六奇编撰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前者记述晚明史事，后者记述南明史事。

[3] 范文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主要从事著述。

[4]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撰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及宋代掌故、人物等的笔记。



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手稿。

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

（1944年7月28日）

先念、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1]同志：

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是些什么？

---

[1]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荣桓，即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和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敬，当时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子华，即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今属运城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1]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

[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文。

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毛泽东

午俭

和王震谈组织南下支队问题[1]

（1944年7月）

王震：今年我部开荒种地三十五万亩，可以达到“耕二余一”，争取上缴公粮一万担。最近，贺龙、林伯渠、徐向前、萧劲光同志，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同志，都先后去视察部队，并作了指示。叶剑英同志还亲自指导团对抗演习。根据中央指示，我们一边生产，一边整训，政治工作和军事练兵都有了明显进步，士气高昂，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毛泽东：你们是兵强马壮嘛！要告诉同志们，仗是有的打的，还有艰苦任务。今天找你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当前不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对中国革命空前有利。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中国的敌后战场都取得了胜利，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弃守，大片华南国土沦于敌手。这说明，国民党没有希望了，它正在一天天垮下去。国共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对组织南下支队问题和王震谈话的一部分。王震，当时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南下支队由三五九旅抽一部分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由王震担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于1944年11月9日告别延安南征。

要胜利，中国人民要解放，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目前，我们就是准备如何迎接胜利。

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两年前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那篇文章里也说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希特勒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日本法西斯也将一天一天更加困难。但是，战争还要打下去，战区还可能扩大。美国的强大海军可能在菲律宾登陆，切断日本通向南洋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军队就只有打通大陆交通线。现在粤汉路日军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的企图，下一步还可能进攻贵州、四川、云南，把蒋委员长从峨眉山上赶下来。这样，战争也可能还要打两三年。一旦美军逼进日本本土，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就可能从印度支那、暹罗、缅甸后撤，从华南收缩兵力，退守上海、山东和辽宁。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也会下山，内战危险也将十分严重。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五师抽七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四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

系。四是，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却到山东等沿海地区集结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南征前途的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我们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二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王震：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

发展沪杭周围及沪宁路沪杭路两侧的游击战争[1]

（1944年8月3日）

华中局：

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毛　刘　陈

未江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陈毅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和组织水手工作给华中局的电报。

致林伯渠电[1]

（1944年8月6日）

（一）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俟九月底外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二）国民党将阎锡山与外记者所谈诬蔑我党的全部谬论在西安报上发表，我们决定日内将叶剑英六月二十二日与记者团谈话登报并广播，同时发表文章、消息揭穿阎锡山。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1]

（1944年8月12日）

一

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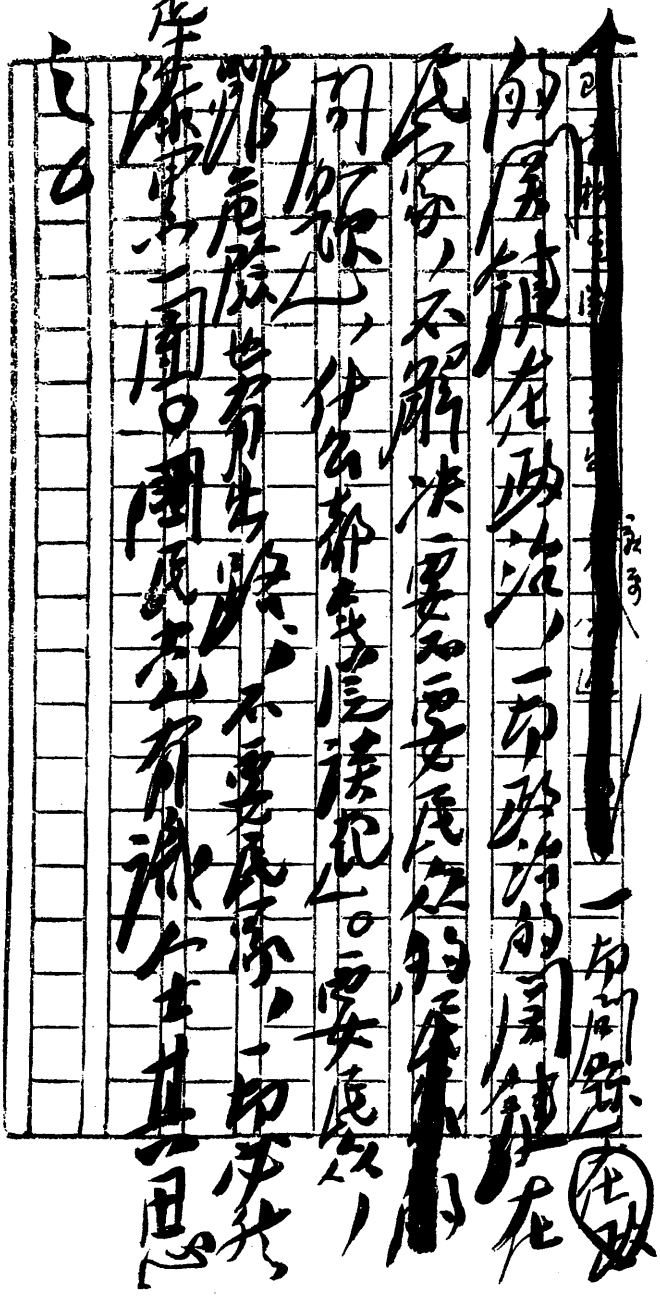
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据说这是“磁铁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解放日报》社论稿《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时加写的三段文字。

战术”，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人民已经看穿你们这个“西洋景”了。

三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毛泽东修改《解放日报》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加写的一段话的手稿。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8月12日）

（一）你们所拟谈话稿甚好，略加修改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你处收到后速在重庆及各处散布，并立即设法送往外国。（二）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三）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1]

（1944年8月13日）

【新华社延安十三日电】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本社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同志首告记者，晋西事变的惨毒真相，过去因为希望阎氏觉悟，一直隐忍下来，从未发表过，此次阎锡山颠倒是非，公然向中外人民淆乱真相，实令人不能再保守缄默。韩钧同志随将事变经过情形详述如下：

阎锡山仇视人民

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汪精卫投敌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当时薄一波同志说："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内来，要求民族独立，只有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阎默然。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

---

[1] 这是新华社的访问记。导语和第一节《阎锡山仇视人民》的改稿原件已散佚。第二节小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反共军与日寇夹击决死队》。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次，均为牺盟、新军所揭穿、所反对。但阎锡山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他又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自卫军等（然而这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基础）。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反对民主，反对发动群众，都是为投降妥协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七七"事变时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理、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装作抗战的样子，而暗中早已在通敌反共了，与敌开过刘村会议，安平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太原道上。决死队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任何人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阎锡山因此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晋西事变的真正内容就是如此。

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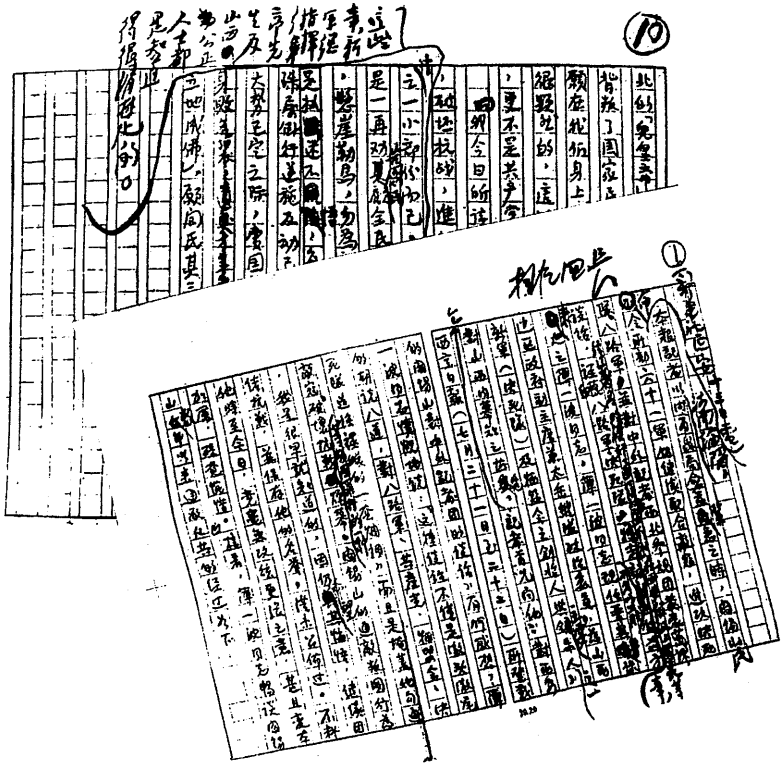
即就晋西事件本身而论，也是阎锡山首先背信弃义发动内

战。阎锡山企图解决新军，蓄谋已久，至一九三九年十月间，乃授权王靖国、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找反共将领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牺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有一个反动军官（刘武铭）问，如何解决？王、陈答以先改组决死四纵队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再集中晋西六个军配合日寇解决决死二纵队，然后协同日军解决一、三纵队。果然不久，阎锡山即委任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九日（即晋西事变前第九天）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计南路纵队为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及警备军之七十三师等，司令由陈自兼，进攻隰县属之义泉、黄土（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北路纵队司令为梁培璜，率十九军及三十三军之一部，进攻隰县孝义边之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当时八路军晋西支队所在地）；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司令崔道修，进攻隰县之泉子坪一带。同时，敌人亦集中临汾至平遥间驻防之敌五千余人于韩信岭一带。于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下令决死二纵队，要准于五日向同蒲线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我正在动员部队执行破击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开始向我进攻，我们二纵队处于日阎两军包围夹击之中，情势至为险恶，有全部被歼危险，不实行自卫，就要死亡。我们只得一面对敌进行肉搏，一面又被迫不得不进行自卫以抵抗旧军，苦战兼旬，始突破日寇和旧军包围，转入晋西北。此即所谓“决死队之叛变”。从此以后，决死队就被称为“叛军”了。

究竟谁是叛军?

究竟谁是叛军呢?是谁勾通敌寇反对人民,破坏抗战,背叛民族?是新军呢,还是阎锡山?新军既未反对人民,视人民为猛虎,亦未参加过通敌叛国的临汾会议,安平会议,亦未派赵承绶、梁延武、王乾元或其他任何人到太原、北平、南京晋谒敌人和汪逆精卫,亦未与敌订立"现地协定",而做这些事情的,恰恰是阎锡山自己。问题非常明白,即阎锡山自己也知道决死队并非叛军。一九三九年以前,他对决死队备加赞扬,说是革命青年,一切办法都是革命的,自愧他的旧军都是昏聩糊涂、落后、不进步,不能向决死队看齐,这且不用说。即在晋西事变以后,他也曾在他的"忠实同志"少数人圈子内说过:"决死队是革命的,抗战最坚决的","薄一波不是军人,但他们练下的军队能与敌人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办法是革命的,进步的"。然而他为什么还说决死队为叛军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在藉此以掩饰他自己通敌反人民反共的丑事和汉奸或准汉奸的原形,并不是什么"韩钧叛变"或"新军旧军冲突",而是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分裂与团结及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事实胜于雄辩,阎锡山纵有百口亦难狡辩。

对这件事,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毛泽东修改的薄一波揭露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通敌反共的新闻稿的手稿。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1]

（1944年8月15日）



1944年8月，毛泽东和朱德等在机场欢迎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

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即史迪威将军总部）所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现在到达了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

[1] 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事。我们谨向远道来此的观察组全体人员，致热烈欢迎之忱！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不论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现在都有英勇的美国将士效命疆场，为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人民而流血战斗。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44年8月，毛泽东、朱德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机场。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

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

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



1944年8月，毛泽东、朱德和美军观察组人员在一起。

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

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则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它总共不过抗击了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地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五年多的时间，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目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

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

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七月一日的《纽约时报》，在其《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中说："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这篇文章是根据外国记者的报道而写的。

早在一月七日的《美亚杂志》，在其《作为反攻基地的中国游击区》一文中说："许多军事当局的意见，认为如果边区的部队能得到充分的援助，这些区域可以成为缩短对日战争的有力的反攻基地。"

六月十日的美国《星期六晚报》杂志，登载了美国名记者史诺一篇题名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中，对于中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意义，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二月间，尼米兹上将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上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和日本。香港或广州或将首先为美军攻取。但是轰炸机由这些城市起飞到日本去，仍是遥长的距离。只是在更北面的地方，中国才是最接近日本。因此在那里的中国游击队，对我们有很大的潜在重要性。"

这些是从国民党遮天手掌的指缝中间透露出去的关于中共情况的反映。

现在不但外国记者团到了延安，而且美军观察组也到了延安。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

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我们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的成功。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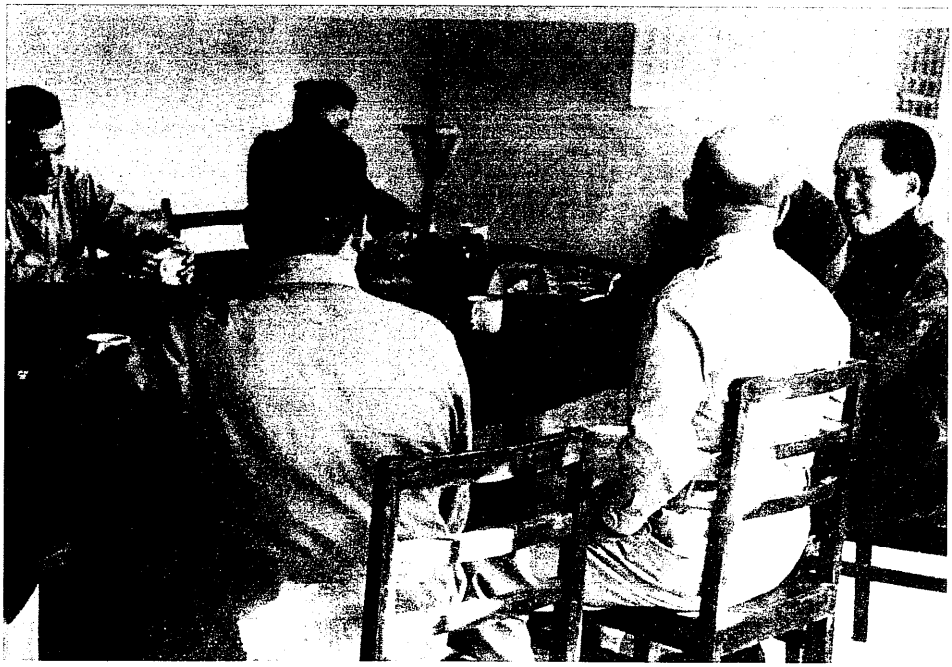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等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合影。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交谈。



1944年，毛泽东、朱德设宴招待驻延美军观察组克里福德·杨少校、罗伯特·佩思等。



1944年，毛泽东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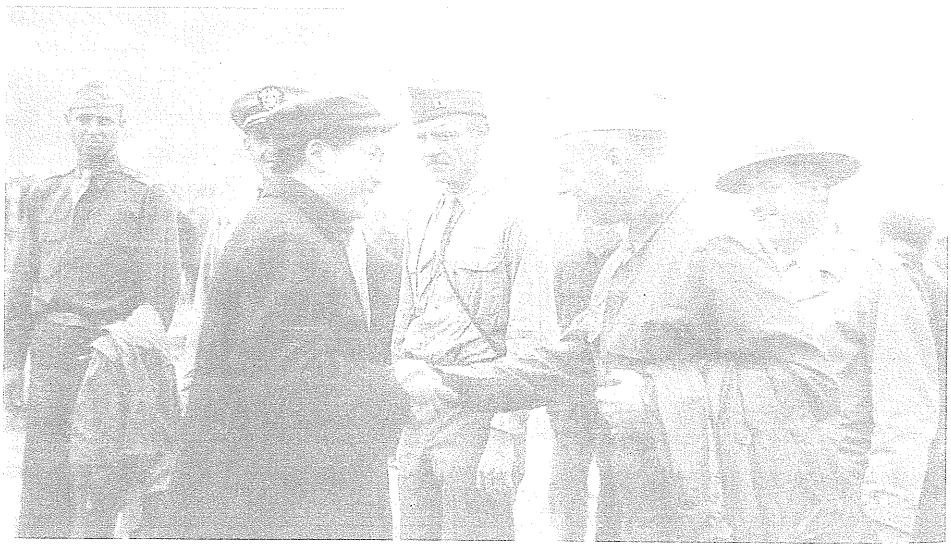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在一起。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在交谈。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交谈。



1944年，毛泽东会见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技术表演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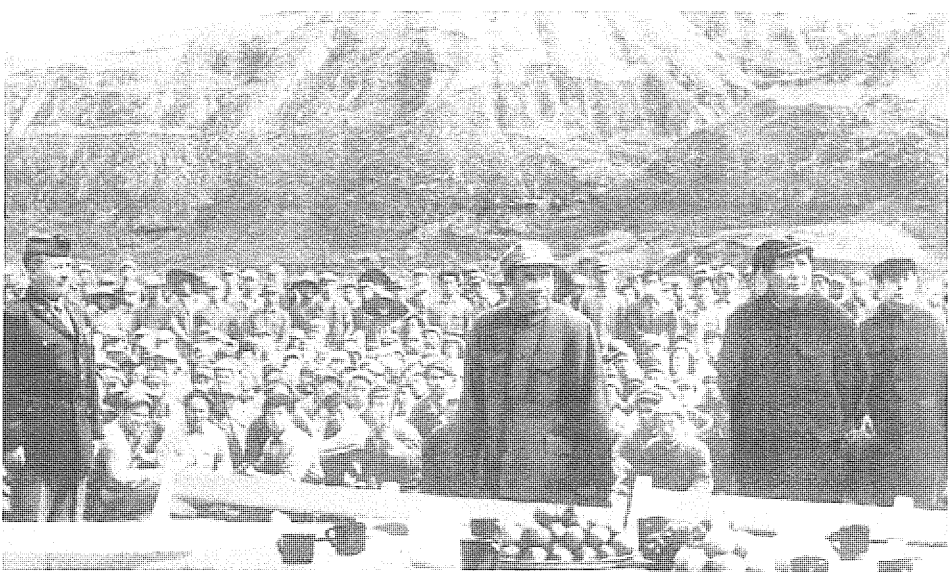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延安八路军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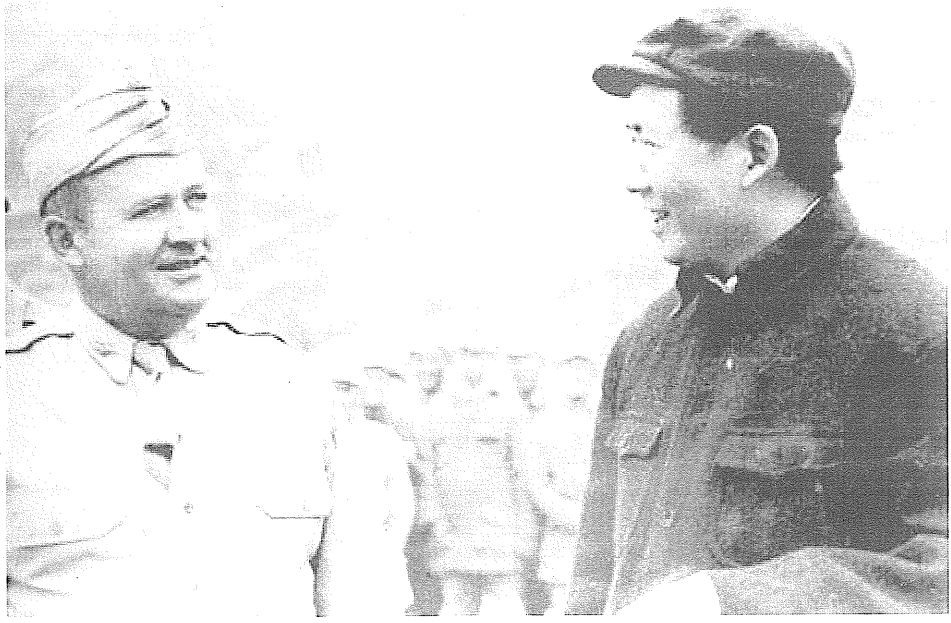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彭德怀和美观察组工作人员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等出席美军中缅印战区统帅部授予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勋章的仪式。前排左起：包瑞德、朱德、毛泽东、叶剑英、杨尚昆、贺龙。



1944年，毛泽东、朱德等参加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授勋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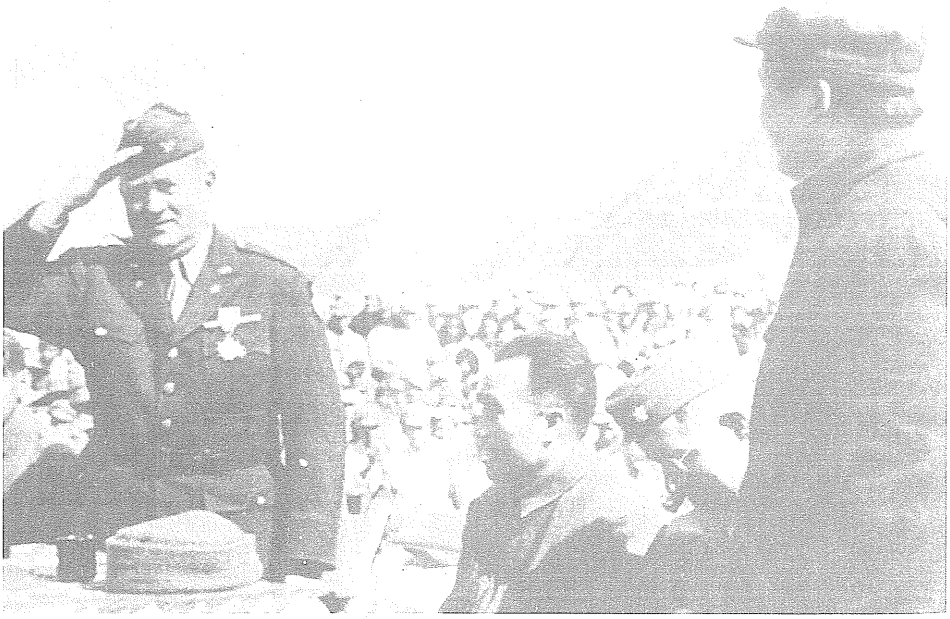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和包瑞德在授勋仪式上。



1944年，毛泽东参加美军为包瑞德授勋仪式。



1944年，毛泽东和朱德在包瑞德上校的授勋仪式上。



1944年，毛泽东参加包瑞德上校的授勋仪式。



1944年，毛泽东和朱德等在授勋仪式上。



1944年11月，海军上尉赫伯特·希契携带中共致美国海军司令部信函离开延安赴华盛顿。图为毛泽东和朱德为其送行。

在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电上的批语[1]

（1944年8月17日）

应与张、左[2]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

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我们如此提议，蒋必不从，将来他召集假国大，我有理由说话。此意我党七大应作决定。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电上的批语。

[2] 张、左，指张澜、左舜生。

致董必武、林伯渠电[1]

（1944年8月18日）

参政会开会，你们可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小党派如有民主提案，我们可副署，但不单独提案，表示在政治解决未达到目的前，一切提案都无从说起。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何应钦、俞鸿钧[2]等如向我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对外发表抗议。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问题致董必武、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2] 俞鸿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

复李先念等电[1]

（1944年8月21日）

可告欧高士[2]少校，彼所提三项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

你们可在合作过程中将国民党进攻破坏情形告知，请其反映到上面去。

---

[1] 这是毛泽东复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陈少敏并告张云逸、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郑位三，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

[2] 欧高士，美军炮兵少校，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派遣，于1944年8月14日到达新四军第五师。

复张云逸等电[1]

（1944年8月21日）

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不久他们即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1] 这是毛泽东复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的主要内容。

给陈毅的信[1]

（1944年8月21日）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一九三九年[2]十二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其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陈毅所写《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后致陈毅信的主要内容。《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是陈毅应包瑞德的约请而写的。

[2] 应为1940年。

对华中部队整训的意见[1]

（1944年8月22日）

饶、张、赖[2]：

十四日电悉。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3]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

---

[1] 由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署名的这份电报的原稿是由当时在延安的陈毅起草的。毛泽东在审阅时作了修改。修改后他写信给陈毅，谈了几点意见："中央整训指示中有用兵一项，今年当然不能强调，应以练兵为主，但应提及。整训指示又规定一年整训主要靠今冬完成，因不但明春春耕到来后练不成，且恐时局变动得快，故团级以上干部讨论练兵办法不宜过久，去冬边区只用五天讨论五天下操，即完成了练兵动员。又高级训练班时间亦不宜太长，以便应付时局。"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1892—1974），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赖，指赖传珠（1910—1965），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3] 张宗逊（1908—1998），陕西渭南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

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材，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训练班。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　刘　陈[1]

未养

[1] 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已到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委托与刘少奇共同指导华中地区新四军的工作。

复林伯渠等电[1]

（1944年8月22日）

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我们在建议书[2]中是请求政府给予四十七个师的番号，所谓五军十六师是暂时至少数目，其余三十一个师仍请政府继续给予番号，决不是可以取消这些军队，也决不是不再请求给予番号。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这样说，和建议书原意是适合的。

---

[1] 8月16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来电提出了在两党谈判中，关于军队数目应如何措词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此问题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中共中央1944年6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

给续范亭的信

（1944年8月22日）

范亭同志：

你的檄文式的文章（寄阎信）看到，即可发表，并广播出去，廉顽立懦[1]，振奋人心。听王彬同志说才知你已入医院，写此等文章当然会加重你的病。但是听说休养方法已改为静卧，是很好的。凯丰同志用此法已痊愈。江青用此法也好得多了。希望你用此法完全治好。

近日国际国内对我们同情的日多，过去被封锁、打击、辱骂的孤立状态可能起一大变化。这个消息或者也可帮助你治病。希望坚持卧治政策。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1] 参见《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谓感化力量之大，使贪得无厌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能够自立。

和谢伟思的谈话[1]

（1944年8月23日）

在简短的一般性谈话之后，毛泽东说，他要谈谈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以下是他谈话的要点。

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1922年至1927年为第一阶段，双方是合作的。这使北伐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当权成为可能。但是，一俟国民党获得政权，就进行垄断，转而反对我们，并试图消灭我们。其结果是进入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的第二个阶段。迫于日本侵略的燃眉之急，第三阶段又重新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国民党并不是那么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参加第三阶段的合作的，它从来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过合作。迫使国民党接受这种合作的有五个因素：

1. 日本的进攻。
2. 外国舆论的压力。
3. 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克制。
4. 中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

[1] 谢伟思（John S·Service）在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司令部顾问。本文是谢伟思整理的和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5. 国民党内部的弱点，这使它无法打败我们。

战争结束时（甚至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这些力量将发生变化。

日本战败，上述那些因素中最强有力和最积极的因素也将随之消除。

共产党是比过去强大了，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争取团结、反对内战的影响也更大了。但是只要国民党的领导还是目前这个样子，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只会使国民党更加坚决地想要消灭共产党。不过，这种做法也只能达到一定限度，如果共产党很强大，国民党就不敢攻打我们了。可是，国民党的领袖们是如此地迷恋权力，他们总是要伺机以逞的。

中国人民一直不敢说话，政治上受压迫，这是国民党造成的。自由主义者、学生、知识分子、政治家、新闻界、少数党、地方集团和现代实业家（他们对国民党官僚主义的工业化感到幻灭，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这些人为数众多。然而他们没有组织，不统一，也没有权力。蒋介石使用武力和特务来对付他们。

国民党是一个没有明确特征或纲领的无定形团体。其中的自由主义集团缺乏有力的领袖，缺乏共同奋斗的目标，也缺乏积极的纲领。在目前的状况下，即使他们有了这些，他们也没有办法和人民接近。国民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领袖们，虽然分裂为互相猜忌的集团，但都是反共和反民主的。他们为自私自利的目的纠集在一起，以便永远保持自己的权力。

仅就这些因素而言，这个国家如果再徘徊于目前这种领导之下，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共产党人从惨痛的经验中对内战深有感触。我们知道它将意味着中国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在远东保持稳

定的影响，它的经济发展，都要被耽搁。不但中国人受影响，而且所有在远东拥有利益的国家都会蒙受影响。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关系重大的。

有件事非常明显，我们共产党人担心内战，我们厌恶它，我们是不会先动手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懂得国民党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我们最终将赢得胜利，然而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避免它。因为，共产党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人民不甘长期忍受专横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目前在重庆和西安是显而易见的，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类书中，更进一步预示了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性。如果人民要战斗，共产党人一定同他们一起战斗。

因此，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党处在今天的地位，它必须重视美国。

所以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不单是美国人自己关心的事情，同样也是民主的中国人民所最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民一般关心三个问题。

第一，美国是否有可能回到孤立主义去，从而对中国缺乏兴趣？美国人对于外国的问题，真要闭眼不管，让中国“自作自受”吗？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如果罗斯福再度当选，恐怕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和关于美国的其他问题是直接向我谈的。因此我以最明确的措词声明，我没有公职上的权力，我的回答纯系出自私人和完全非正式的意见。

关于上述诸点，我提到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和特殊的利益；事实

上，我们并不存在由战争破坏所引起的国内重建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巨大发展的经济和我们愈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将迫使我们超越国界去寻求贸易和投资，所以，我们将不至于变成孤立主义者，或者不关心中国；无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掌管国家，我不相信他们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对华政策。

第二，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和世界上民主的前途？例如，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要使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它是否担心它所承认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确认其合法地位的中国现政府并不能真正地代表中国人民？蒋介石是被单一的政党即国民党的仅仅九十个人选为主席的，而且他们本身甚至还不能确有根据地宣称自己能代表这个党的有限成员！连希特勒也夸耀自己是民主政权，说他是被人民选举的，他还拥有一个众议院！美国是否领会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即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虽然，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美国政府是否领会这一事实，而在于它是否愿意设法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来改善这种局面。

我提到了美国的许多官方声明，其中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和我们对所有国家发展民主的总的愿望。我说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的美国舆论，它的明显倾向已见之于近来美国报刊的评论。

显而易见，国民党必须改造它自己和改组它的政府。在现有的基础上，不能指望它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美国为它赢得战争，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混乱。

政府必须扩大它的基础，吸收所有重要的人民团体。我们并不要求完全的和直接的代议制民主，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并且，在国民党发起和控制之下，它将是一种无益的骗局。然而，马上就能够

做的和应当做的，是召集一个临时性的（或过渡性的）全国代表大会，邀请所有团体派出代表。这些代表一定不要像过去那样由国民党选拔和指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代表——最有资格的领袖。他们应当包括共产党、所有少数党、知识分子团体、新闻界、学生、职业团体、合作团体的中央机构、工人和其他群众组织。

分配代表名额切实可行的折中方案是国民党占半数，其他的合在一起占半数。考虑到实际的政党关系，应在事先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认可委员长为临时主席。

这个临时代表大会，必须拥有充分权力改组政府和制定新的法律，新法律的有效实施保留到通过宪法为止。政府应当直接向代表大会负责，它的作用和权力类似英国的众议院。

临时代表大会应同时对完全民主政体和立宪制度的准备工作负有全责。它应监督选举和召开国民大会，然后转交它的权力并宣告结束。

美国政府愿意发挥它的影响以迫使国民党实行这种建议吗？美国政府愿意提出这种建议并加以积极支持吗？

毛泽东提议，这件事情既然如此重要，就值得我跑一趟重庆，把它提交大使。我说，我会全部报告大使的。我还提到，我早已从重庆的其他方面听到这个建议的要点。

后来，我在8月26日同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获悉，共产党政治局正在考虑把这一建议提交国民党。或许他们是根据最近谈判中国民党拒绝讨论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要求而提出的，国民党曾以“过于抽象”为理由拒绝讨论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要求。

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抗日的一种积极的战斗力量？它是否承认共产党对于中

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有影响的力量？是否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性？如果在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抱什么态度？美国为了保证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制武器来打内战，又在做些什么？

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二和第三所提各点，确定了我们进一步交谈的范围，我对其中的若干要点作了回答，以便进一步详谈和讨论。

关于“支持”共产党的问题，我指出，因为共产党本身是公开支持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所以这个问题使人费解，而且无论如何时机也未成熟。

因为外来的日本侵略威胁着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在1936年至1937年接受了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首先由于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了对日本作战，为期十年毫无结果和互相毁灭的内战被制止了。虽然内战不是我们先动手的，然而我们带头制止了内战。还有，外国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他们却不支持我们。但是统一战线全然不是单方面的。国民党还答应过政治改革，却未实行。

我们支持蒋介石并不意味着支持专制制度，我们支持他打日本。

过去我们不可能提出这个承认问题，从合法的意义来看，它仍为时过早。现在我们只要求美国的政策说服国民党进行自我改造。这是第一阶段。这大概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如果此事大功告成，就不存在内战的危险了。

但是，假定国民党不愿改革的话，美国的政策就应当有其第二阶段，那时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问题就应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会冒同美国冲突的危险的。

我们现在可以先不过问美国武器的供应问题，这些美国供应的武器是可以被国民党用于未来的内战的。但难道我们还期望过去的

历史重演吗？在民国初期，列强只承认北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广东政府才可以自称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南京在它完成北伐和取得成功之前是未被承认的。现在中国内部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方向尚不明朗，但某些类似的情况可能发生。美国是否继续承认和支持一个缺乏效率的、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同旧北京政府差不多的政府呢？

我提出，在外交上撤销对一个未犯有直接不友好行为的政府的承认是不可能的，更不便于在所承认政府的背后支持一个反对党。最后，整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

美国已经干涉了有它的军队和物资运入的每一个国家。这种干涉不一定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国的影响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它使国民党有可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对这个词是有异议的，因为这个词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已失去它的原意。）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欢迎，因为他们需要民主，只有国民党才反对它。

我们并不要求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所有援助，其结果对战争不利，国民党将会垮台，美国在中国的登陆也会增加困难。

周恩来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循着上述各节，把下列话题展开了：1. 美国武器只给国民党必然意味着内战；2. 我们不应忽视日本想要“投降”蒋介石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这对其他盟国是一种诡计，实际上这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希望在中国维持一个软弱的国民党，而不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强大的、统一

的和民主的政府；3. 在中国，要保证决定性地赢得战争和避免内战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武器给予国共双方。

我提到美国的影响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题，对于能否“支配”蒋介石表示怀疑。毛泽东激烈地反对我的看法。

蒋介石是处在他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地位。看一看河南发生的事情和湖南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再看一看广西表现出来的每一种迹象吧！或许下一步就轮到云南了。看一看经济形势吧！蒋介石已经走投无路了。

蒋介石是顽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坏蛋。要跟他打交道，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从经验中学会这一点。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毫不留情。你们不要对他的威胁和恐吓让步，不要让他觉得你们害怕了，否则他就会敲诈勒索。过去美国对付蒋介石的办法非常笨拙，让他用讹诈手段取得了成功。例如：他说什么现在无法维持抗战哪，什么不得不讲和哪，而他的策略在于获得五亿借款。现在孔祥熙出使美国，还要求提供布匹。布匹！我们是不是在同日本打仗呢？难道布匹比子弹更重要吗？我们边区这儿没有棉花，国民党的封锁使我们无法从中国其他有棉花的地方搞到任何棉花。但是我们努了一把力，我们很快地就做到自给自足了。对国民党来说，解决布匹问题要容易百倍。如果他们这个政府有它自己的经济政策，他们早就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了。

你们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要求同蒋介石讲友好，必须把他置于经常的、有力的和一致的压力之下。决不要放松你们的目标，要经常敲打敲打他。

美国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的时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抚慰蒋介石。美国可以告诉蒋

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美国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帮助他。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当更多一些。不要错过孔祥熙在美国的机会。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了。昆明是一个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美国刊物对国民党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马上就看得出来，甚至看来常常会暂时产生不良反应。但只要它是光明正

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话，国民党就会辨别出来），就会引起国民党的犹豫考虑，因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

最后，你们美国人同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好事。观察组到这儿来，我们自然是高兴的，因为它有助于打日本。但是把你们到这儿来的主要意义说成是对国民党施加政治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么说的），这是不需要的。

我注意到他强调的是美国在中国登陆，我暗示战争可能采取其他方法打赢，登陆并不是非登不可的。

我们认为美国人必须在中国登陆，当然，它取决于日本人的力量和战争的发展。但是，日本人的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且不说满洲。

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那对中国来说是十分不幸的。国民党会继续当政，但它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

如果要进行一次登陆，就必须有美军同国共双方军队合作。现在，我们的军队包围了汉口、上海、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处于内圈，而国民党则靠后一点。

如果需要同国共双方军队进行这种合作的话，重要的事情是允许我们在独立的一些防区内进行工作。国民党太害怕同我们一道工作了，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要把我们置之死地。当我们处在独立的防区进行工作时，美国军队就可以看到我们同国民党不同之处：我们拥有群众的支持，我们能打仗。

我问，正如他们所提示的，如果国民党不受约束，或不诱导它进行改革的话，公开内战是否不可避免。

我们可以说内战“不可避免，但也不是确定无疑的”。主观上，现在国民党领袖下定决心要消灭共产党，他们害怕我们，正如他们

害怕人民一样。其原因也是一样的。客观上，有许多因素（谈话开头时所谈到的五种因素）限制了国民党。这些因素中，最有力的日本人的因素将不存在了。另外一个因素是外国舆论，这个因素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外国的，独立于国民党之外。但是，这种因素现在还无法预料，因为国民党仍然希望外国的势力可能会站在它那一边。

国民党已经在为内战忙于寻找借口了。你们了解我们和我们地区的情况越多，那么那些借口的价值就越小。

因此，国民党也可能采取间接的方法来攻击，对于它的挑衅是很难确定范围或建立一道防线的。

但是，如果国民党想阻止在我们地区已经取得的进步，如果他们企图夺走人民新的民主权利，人民就要反抗并要求我们的援助。

国民党的另一条行动方针是通过伪军。伪军将转回到国民党内——宣称他们一向是“爱国的”，然后国民党就利用伪军来占据城市和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将煽动伪军攻击我们和制造磨擦。

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这一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这是可能出现的、带有欺骗性的日本投降蒋介石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日本人在扑灭共产党人的条件下，把他们的武器转交给伪军或国民党。这一点乍看起来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卷入这一局势的这些势力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他们之间的怨恨是如此的强烈，因此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即使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潮流是倾向于我们的。我们坚持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

它的总政策是好的和适用于中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一项条款，都可以从这个文献中找到。

当然，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我们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我们经常自我批评和修订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的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机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苏联，提出了疑问。

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

再进一步说，国民党由于患有反共的恐惧病，所以它也是反苏的。因而国民党同苏联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至于我们去寻求同苏联的合作，那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国已经是够不统一的了！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国民党需要苏联的帮助，这也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苏联却不会反对美国人对中国的关心，如果这种关心是建设性的和民主的。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冲突的地方。苏联只需要一个友好的和民主的中国。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面都将是有益的和符合要求的。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主义者”的名称可能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他们考虑过换一换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减租是从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据未付实施的一项国民党法律）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过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赶走地主。我们对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虑到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请看我们这儿以有限的资源已经做了些什么）。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业”，像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会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

致董必武电[1]

（1944年8月29日）

八月二十日美国空军第二十航空队的一架重轰炸机在苏北盐城、阜宁上空爆炸起火，坠落在新四军建阳金家桥根据地内，新四军第三师和该地游击队立即出动营救。该机飞行员十二名，其中一名毙命，我救出五名已抵第三师师部，其余六名正寻找中。以上情况望即转告有关方面。

[1] 这是毛泽东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给秦邦宪[1]的信

（1944年8月31日）

博古同志：

此文[2]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3]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4]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

---

[1]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2] 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3] 指解放日报社。

[4] 指1944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1]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

[1] 艾，指艾思奇（1910—1966），当时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部长。陆，指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余，指余光生（1906—1978），浙江镇海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

（1944年9月5日）

昨天本报公布边区政府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重要意义，对选举奖励的办法也有详尽和具体的规定，在今年冬天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及今后边区全面建设事业中，必将起重大作用。这是一项新的组织形式与新的工作方法的定型化、合法化，值得引起大家注意。

陕甘宁边区自从党政号召生产运动及各种建设事业以来，随着这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从群众运动中产生，又站在运动前列，把运动推向前进，成为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动力。可是过去我们对此还缺乏自觉的认识，甚至是盲目的，因此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缺少注意和发现，任其自生自长，无声无名，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自从发现了吴满有和赵占魁并进行吴满有与赵占魁运动以后，经过去年冬天的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才被我们逐渐认识，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拔，也逐渐推广。一年多的经验向我们证明：在各种生产建设事业发展中，到处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存在着和生长着，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发现，发现后加以奖

励，广为宣传，使其影响深入群众，号召群众向其学习，则其在群众生产建设运动中就可发生很大的作用，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奖励，是目前边区全面建设事业中一项极重要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这种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是由群众创造的，现在我们把它接受起来，定为今后发展生产建设运动的重要方法。

选举和奖励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首先是为了推动和改进工作。因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创造了超出一般人的劳动标准和工作标准，这种标准，既然在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是可能的，则对于所有的劳动人民与工作人员，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应当是可能的，而他们所以还未能达到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必然在其生产或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如果我们能把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及其条件和办法，在一般群众及工作人员中加以宣传和表扬，则不但可以刺激其积极性，而且可以在互相对照之下，发现其缺点，并进一步以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标准作为自己努力的标准，以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经验，作为自己改进工作的办法，使其生产或工作提高一步，使更多的人向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看齐，使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更加普遍化。一年以来，不论是在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只要那里在群众中产生了一个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经过我们发现，把他奖励宣传，号召大家学习，则那里的生产和工作，就会得到改进提高和发展，证明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普遍可以采用并且是最好的办法。

其次，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和奖励，又是出产和培养干部的一种好方法。因为他们真正是从群众中和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并在事实上证明了是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努力生产或工

作，在生产或工作中获得了成绩，表现出他们的创造才能，并且这些人大都为人正派，又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对政治也有较高的认识，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干部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下一番功夫去培养他们，提高其文化，加强其教育，则他们的优良品质和创造才能，将会更大更快地发扬。现在有些地方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已开始被引进到各种工作部门中来，逐渐成为各种事业中的重要干部了。过去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这些干部至今还是我们边区的骨干，但在今天边区长期的全面的建设环境中，仅仅是这些老干部就非常不够的了，如果我们不能引进一批新的干部到我们的各项建设和各种组织中来，则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不会顺利完成，而这一批新的干部的增进，不在别的地方，恰好就在这些建设事业的本身，就在广大的群众当中，就是由各种建设事业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党政军民各种组织的领导者，必须深刻了解这点，并对此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

再次，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党政军民一体来进行边区全面建设的事业中，还有一种巨大的作用，就是他们能成为党政领导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桥梁。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散布在各个角落和各个部门，他们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着，但他们不是普通的群众，而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自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群众的领袖。党和政府经过他们，可以把群众的意见集中，来改善自己的领导，又可以经过他们，把党政的方针指示在群众中传开，并推进其实现，这样使党政与群众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在今年的生产运动及其他建设工作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了这点，许多劳动英雄回到他们的乡村，宣传党政军生产建设方针，积极推动和组织群众生

产，很自然地成为党、政府和军队各种政策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据说凡是有了劳动英雄的乡村，乡村党政的工作，就好像增加了许多力量，比过去好做得多了。

以上三点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客观上所起的主要作用，这些客观作用一旦被我们自觉地认识并掌握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改进工作、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最好的方法，就成为我们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而我们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才能把今年全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奖励工作做得更好，因此这是首先应在全体党政军民干部中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的。

要把选举和奖励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工作做好，除了上述思想认识问题外，还必须进行很繁杂的组织工作，在组织工作上主要地应保证实现下列三条：

第一，是认真领导。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有些地方是不认真办的，事前毫无准备，临时随便指定劳动英雄，未经群众讨论和选举，今年选举则必须完全纠正这种缺点。所有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从现在起就要很好地讨论边府决定，并在所属范围内开始布置工作，包括关于这一工作的传达和宣传，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各地区各部门具体标准的讨论和规定，关于劳动成绩调查和工作考绩，以及在选举工作中各种工作的筹备与分工等，并于适当时候进行检查，发现缺点，即时纠正，防止对此事采取应付马虎态度。

第二，是发动群众。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许多地方没有经过群众讨论选举，而是单纯由上面发现后指定的，今年则必须按照政府决定认真地由群众民主选举，必须及早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酝

酿，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选举，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真正成为群众自觉运动，防止发生形式主义的毛病。

第三，是慎选好人。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有些人是不合标准的，结果非但不能起劳动英雄的积极作用，反而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失掉选举劳动英雄的意义，这是在今年选举中应加严重注意的。为防止这种缺点，必须把边府规定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广为宣传，由党政协同群众共同提出候选人，每一候选人都应根据标准由群众加以审查，并应经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只有经过群众认真的民主的选举，才能是真正好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也只有真正好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才能在群众中发生积极作用，达到改进工作、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目的。

以上所述各点，不但适用于陕甘宁边区，也适用于敌后各根据地。但敌后必须以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重，并且战斗英雄与民兵英雄还应放在前列，这是自明的道理。在敌后的中心口号是战斗与生产相配合，部队中的战斗英雄与民兵中的民兵英雄之选举与奖励，是应和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选举与奖励同时进行的。敌后各地对此种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有些经验还不多，有些还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迅速采用，以利发展战斗与发展各项建设工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1]

（1944年9月6日）

【新华社延安六日电】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于五日上午在重庆开幕，报到参政员一百六十四人，较历届历次大会为少。蒋介石氏莅会致辞，首述最近中国战场军事演进情形："吾人决不否认这半年以来军事的失利，更不能否认中国抗战这一时期是特别困苦艰辛。"继即声称："（一）中国战场的最后决战今方开始……（二）日寇无论如何决不能在整个反侵略战争一片光明中侥幸逃其覆灭的悲运……他妄想在中国战场侥幸求逞，实无可能。（三）……我可以保证在军事根本上决没有危险，因为危险早已过去了。"关于目前军事失利与经济困难之原因，蒋氏称："今天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困难，实在是我们农业国家在七年长期抗战的必然之势，因为我们国家一向无基础，这种现象实不足奇。就军事上来说，我们在抗战开始以来，每年都有这种失利的事实，而且其失利程度或有较今日为甚的。"从此种"必然之势，实不足奇"、抗战败仗年年有、往年还比今年多的政治哲学中，蒋氏所得

[1] 这是新华社的述评。标题是毛泽东加的。原稿最后部分（从"林虎氏说"开始）已散佚，现据报载补齐。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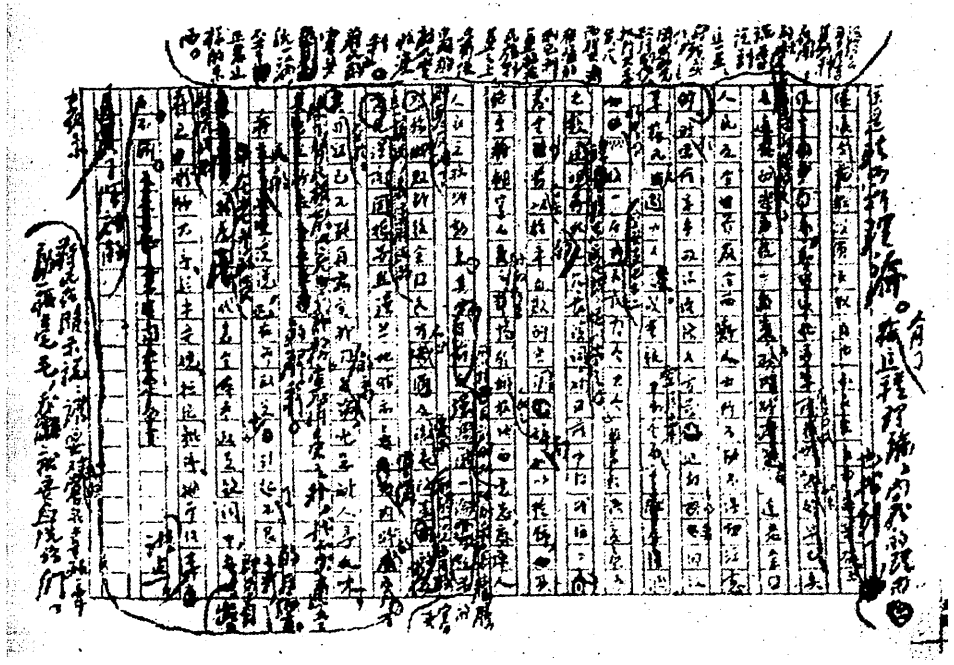
之结论为："要知道敌寇今后无论如何疯狂挣扎，断不能象过去七年那样再有为害于我们国家的危险，敌人所加于我们的危险，到今天实在已成过去。"用武断的词令，想将目前的军事危机掩饰过去。掌国柄者居然发出此种言论，实堪惊异。蒋氏又称："我们国家今后安危成败所系的一点，这无论对抗战，对建国都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国家绝对需要统一。"接着即大唱其无条件的统一论，甚至说，孙中山"革命数十年，毕生奋斗目的是为了国家统一。"按中山先生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蒋氏对这个遗嘱是忘记了。蒋氏并且说，"今日对日抗战也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而不是民族的解放。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是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针锋相对的，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蒋氏又称，"有了国家的统一，才有国家的独立；有了国家的独立，才有国家的自由；有了国家的自由，才能谈到民权自由和民生自由"，倒果为因，完全是法西斯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内战的理由也找到了，这是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所不能不深切注意的。记得去年十月十日《莫斯科新闻》的社论曾说到这一点："内战，或任何一集团或政党欲强制他人执行其意旨，从而将其狭隘的利己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只有使中国的敌人坐收渔利。"蒋氏的寡头统一论，不幸正是这样的东西。对于当前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迫切需要的改革，蒋氏或避而不谈，或重复空洞老调，如所谓"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之类，讳疾忌医、空头支票二语，足以当之。统观蒋氏的冗长演词，对目前中国战场上的严重形势企图以轻率自欺的空洞辞句加以掩饰，其结果将模糊人民之对敌警

惕，松懈人民之抗战意志，麻痹人民之抗战动员。其所以于目前时机强调他的杀气腾腾的寡头统一论，则是反映了豫湘败战后全国各方人心愤懑及要求彻底改革政治、取消一党专政这一情况，表示蒋氏的深闭固拒，并且强烈地暗示着准备内战的威胁。蒋氏在暗示说：谁要对我的寡头专政牵动一根毫毛，我就要血洗你们。至于“日寇已不能再为害我国”的高论，尤足耐人寻味，除了替民族敌人充当义务宣传员之外，找不出适当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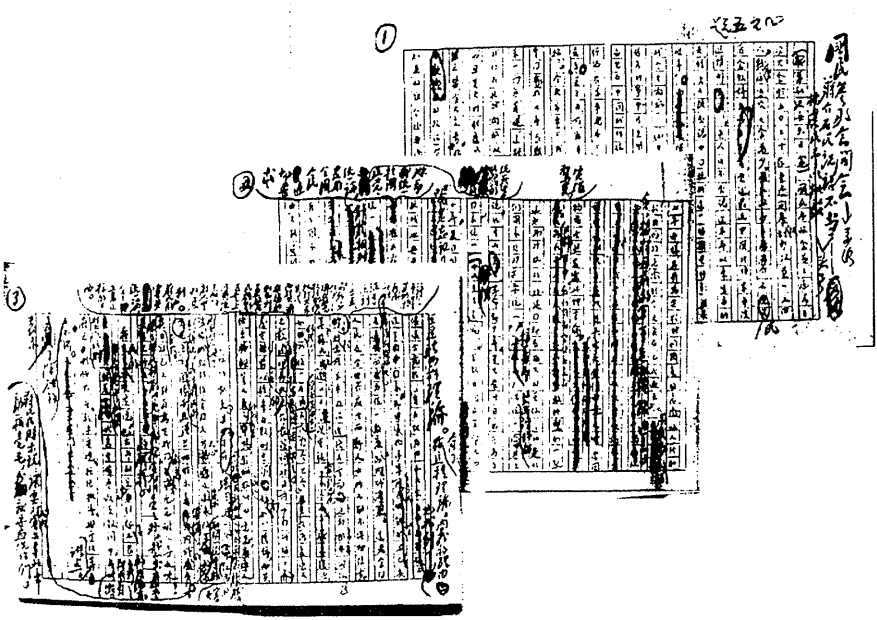
蒋氏的演说，已在参政员中引起了不良的反响。在老参政员林虎氏代表全体参政员的答词中，即可看出。林虎氏对蒋之粉饰太平、轻率乐观、拒绝批评、排斥改革诸点，表示了深刻的不满。

林虎氏说：“我们回顾国内，瞻念前途，不但不敢稍有乐观，而且抱有杞人的忧虑。因为当这个国家兴衰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能发奋振作，痛涤旧污，革除积弊，即是兴国之机。不然，若将现状拖延下去，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这并非我们故示危言耸听，种种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为大家所共见共闻的，这也用不着隐讳，也用不着一一列举。试请大家想一想，现在国内各战场作战的部队，能服从命令、忠勇杀敌的固然是多，而有些坏的是糟到怎么样？各级政府之用人行政，能尽职能合理的固然多，而那些渎职的颟顸的是闹成怎么样？这些情况都是使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前途发生隐忧的。我们参政会自二七年到今天所开的已是第十次大会了。检讨过去我们对于政府抗战建国诸端固曾有些贡献。但当盟军在欧洲与太平洋着着的胜利，欧洲战事或可望于今年结束，太平洋方面的盟军正在准备展开强大的攻势，整个战局的胜利已在目前。然而我们抗战八年，人力物力的牺牲已是不可胜计。在这整个战局胜利之中，我们应格外努力来争取主角之一

的地位，然后能收得一切牺牲的代价，万不可专靠同盟各国的胜利做胜利，致贻我们中华民族之羞。”一针见血，林虎氏将蒋介石的错误观点统统批驳了。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述评《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的手稿（部分）。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评述蒋介石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开幕词的新闻稿的手稿。

致张云逸、饶漱石等电[1]

（1944年9月7日）

第三党张云川等已离渝赴北平，准备到各根据地访问，望妥为招待，给以参观访问之便利。

[1] 这是毛泽东致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邓小平、滕代远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晋西北、晋察冀电[1]

（1944年9月7日）

美军观察组上尉考林、中尉琼思二人将于最近分赴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边区，考察地形、建立情报网和了解爆破工作实施之范围等。

[1] 这是毛泽东致晋西北、晋察冀电的主要内容。

为人民服务[1]

（1944年9月8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2]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3]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大会上的讲演。

[2] 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共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3] 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史记》130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1]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2]，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

[1]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2] 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说。图为张思德在山中烧炭。



为人民服务（宣传画）

为张思德题写挽词[1]

（1944年9月8日）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1] 1944年9月8日下午2时，张思德烈士的追悼大会在延安枣园后沟西山脚下的操场上举行，中央警备团全体指战员、中央社会部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在花圈上题写的挽词是：“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复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电[1]

（1944年9月9日）

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复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

（1944年9月11日）

参政会报告两党谈判[2]时，林准备根据周谈话[3]及复张、王信，对国民党反动意见加以驳斥，并宣传我抗战成绩、力量与合理要求，是对的，国民党提示案根本不提抗战需要，我党合理要求则全是根据抗战需要，这是双方根本不同点。根据来电，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拟和我党联合提出改组政府，请你们考虑现在我党中央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是否合宜。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3] 指周恩来1944年8月12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共谈判的谈话。

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

（1944年9月12日）

如与纳尔逊[2]、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2] 纳尔逊，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随赫尔利来中国。

复罗荣桓、黎玉、萧华电[1]

（1944年9月14日）

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做，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山东审干问题复罗荣桓、黎玉、萧华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

（1944年9月15日）

（一）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二）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1] 这是毛泽东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坚持为人民服务[1]

（1944年9月18日）

同志们！你们是从部队里选举出来的，你们代表了八路军、新四军，同时你们还代表了我们抗日根据地的九千万人民，也代表了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开会。虽然你们不是全国人民直接选举的，但实际上你们所执行的纲领和工作任务，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抗日部队抗击了在华敌伪军的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抗击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2]，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是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 豫湘战役，指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第二阶段。1944年4月中旬，日军以14万兵力首先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守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断败退，至5月25日，郑州、洛阳等38个县市相继陷落。5月27日，日军又发动湘北作战，6月18日侵占长沙。6月22日，开始对军事要地衡阳发动攻击，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经47天激战，大部守军伤亡，8月8日日军占领衡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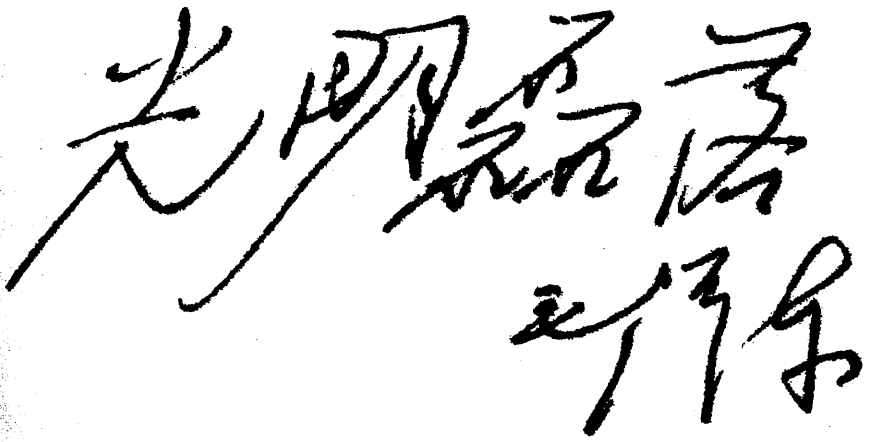
我们的部队，不论在前方打敌人或在后方保卫陕甘宁边区，不论生产或练兵，不论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有缺点，我们要改正缺点，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去年拥政爱民运动中，我们运用了自我批评的方法，我们有缺点还可以互相批评。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当然，这种自我批评只有在我们的部队里才有，在国民党军队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我们的心和全中国人民的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为张侠题词

（1944年9月18日）

光明磊落。

毛泽东



毛泽东为张侠的题词。

复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9月18日）

严肃批评，并指蒋名，甚为必要。如五参政员决定来延安[2]，最尖锐的批评可以暂停，但决不可作为条件，只可说如五参政员去延安及国民党态度改善，延安批评自然会和缓。

[1] 这是毛泽东对林伯渠、董必武16日关于国民参政会开会情况的来电的复电的主要内容。

[2]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决议，由参政员冷遹、胡政之、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人组成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后来，1945年7月到延安与中共会谈的参政员是6位，即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9月18日）

闻五先生决定来延，甚表欢迎，敬祈早日命驾为祷。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转胡政之、王云五、冷遹、傅斯年、陶孟和5参政员电的主要内容。

驳国民党政府提示案[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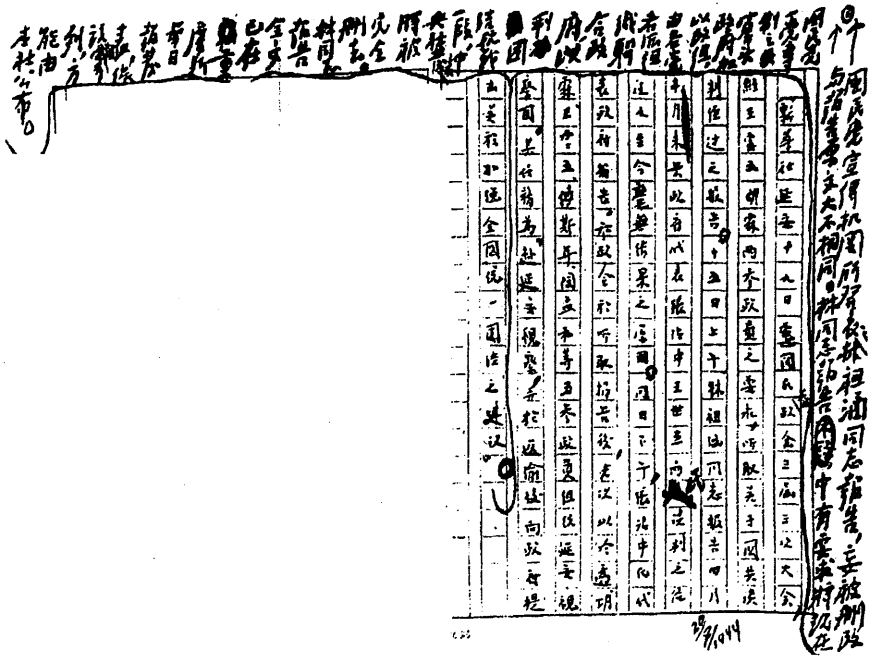
（1944年9月19日）

一看六月五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十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十万人，其余三十七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四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

[1] 这是毛泽东审阅新华社9月19日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大量重要改写的一段话。

庞炳勋、石友三[1]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1] 庞炳勋（1879—1963），河北新河人，1940年后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1943年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石友三（1891—1940），吉林长春人，曾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1940年6月，与日本驻军签订“防共协定”，准备公开投敌。后被处死。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电讯《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听取关于国共谈判之报告》的手稿。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1944年9月21日）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二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十二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七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六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一百二十里。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宾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土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之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

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分，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八、九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八月下半月与九月上半月中，连克五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六百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十六里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十六里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三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郓城、长兴四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千五百方哩。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

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做“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只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是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它，适以资敌。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9月22日）

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这次参政会公开，对我们是有利的，逼得蒋介石发表双方的文件。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十二条原则上提得对，但未想到改组政府。现在时机成熟，时局变化得很快。这次参政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已不敢提了。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审查干部问题，结论不忙作，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谈论形势、国共关系、审干等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1944年9月26日，毛泽东等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技术表演。



1944年9月，毛泽东和叶剑英、陆定一在交谈。



1944年9月，毛泽东和吴玉章、陈毅在延安。



1944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何长工在延安。



1944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发、叶剑英在一起。

为林伯渠[1]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2]的信

（1944年9月27日）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九月十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3]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

---

[1] 林伯渠，名祖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2]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湖人。两人均为国民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

[3] 参政会，指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31日决议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其中国民党人占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参政员为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7人。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1947年5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

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1]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2]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五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九月十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四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五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六月四日（于六月五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

所提正式十二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八条[1]，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做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做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四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

---

[1] 1944年5月22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以书面形式送交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王、张以二十条如此写法无异暴露政府之罪状为借口，拒绝接收和转呈国民党政府。5月31日，毛泽东就修改中共提出的二十条致电林伯渠，指出：“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修正后的十二条为原二十条中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三条，关于两党悬案方面的第一至第七条和第十、第十三条。原二十条意见中的其他八条即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二十条，参见《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

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致吕正操、林枫电[1]

（1944年9月30日）

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但在每一处打胜仗后应叫那里提高防备敌人报复的警惕性。

[1] 这是毛泽东致吕正操、林枫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1]

（1944年10月1日）

三年半前被蒋介石以所谓“破坏军令军纪”名义宣布为“叛军”的新四军，不仅一直坚持着华中的抗战，而且最近半年来屡次出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新四军的节节胜利，对于半年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败，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所口口声声强调的失败主义的有利于日寇不利于民族的“军令军纪”，则是一个严正的揭露，事实的讽刺。对于中国人民，则足以提高胜利信心。对于盟国击败日寇的战略，则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2]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作什么好事，但解

[1] 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新四军胜利出击》，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1937年10月起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扣押。

散新四军一事算是作得好。”

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新四军军部公布今年一月至六月的战绩，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枝，伪军反正四十二次，六千余人，粉碎敌伪“扫荡”三千人以上者十二次，五千人以上者四次，七千人以上者二十次，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华中敌伪据点去年冬总数为二千九百七十二座，今年六月底连新增者在内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三座。

我们再看今年华中新四军所进行的大战役。三月四日苏中的车桥战役，攻破五十三座碉堡，歼灭敌军一个大队约八百人，生俘敌官兵四十余人。三月下旬至五月间，淮北我军在三百里战线上进攻伪军，攻克归仁集、新集、魏集等据点五十一处，俘伪军一千三百人。四月十九日淮海区攻克高沟、杨口据点。四月二十七日我军进袭巢县、无为城郊。五月三日滨海我军攻克灌河下游敌人用以控制淮盐的主要港口陈家港，生俘敌伪四百余名。五月十三日我军进袭芜湖近郊。六月中旬，湖北我军南渡长江，攻克横堤。七月十二日至十七日，苏中我军攻克长江北岸之天生港、张黄港等五个港口。七月以来，浙东我军连续粉碎敌伪对四明山的三次“扫荡”。七月二十六日，苏南我军袭击南京外围地区，攻克薛镇、桑园等据点，打开秣陵关至横山一带的游击局面。八月二十三日起，我军在京杭国道上展开攻势，攻占长兴城，捣毁合溪煤矿，并攻入溧水、溧阳。以上共计，三月来我新四军进行的大战役凡十三次。

在政治攻势的成绩方面，我淮北区于六月间，继军事攻势之后，发动了政治攻势，驻泗阳之伪第二十八师，原有千余人，逃亡

得只剩三百多人。不少据点，经过喊话，不费一弹，即为我收复。

在破袭方面，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日，南通、海门、启东、如皋地区举行大破袭运动，参加者五万人，破路七百里，毁桥梁五十座。

以上总计起来，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苏中敌人所占领的地区，被我军挤缩得只剩百分之十六。斗争最残酷的苏南，我军也开辟了新的地区。夏初麦收前后反“扫荡”的胜利，使敌伪原定的抢粮计划，完全失败。敌华中派遣军编制的调整，及企图加强控制各部伪军，都表现出敌寇在我军的进攻下，不得不讲求新的对策。

新四军胜利出击的意义，还不止此。我们还应该指出下列的几点：

第一，今年新四军的出击中，许多是攻坚的战斗。这些攻坚战斗的胜利，证明新四军在整训之后，军事技术更加加强了。新四军现已拥有主力十八万，以五十万民兵游击队为其后备。它是坚持华中敌后战场的唯一力量。过去人们有一种想法，以为新四军只是游击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把新四军的力量过低估计了的。新四军今年出击的胜利，是以事实批驳了这种错误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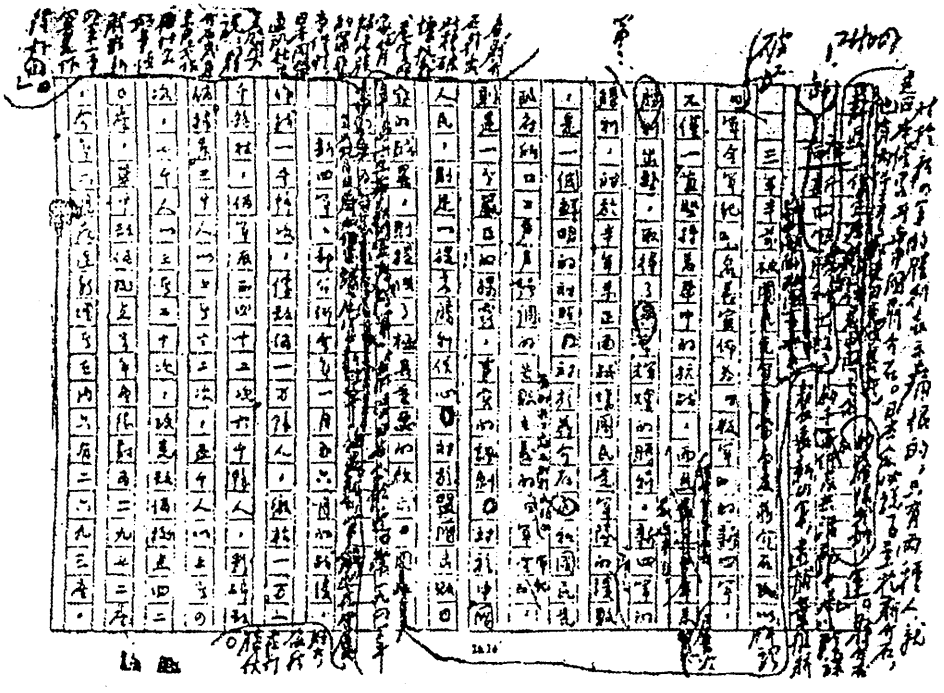
第二，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不仅军队本身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还有最大的长处，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它与人民打成一片，而且敌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新四军的作战和行动，经常得到人民的拥护与协助。车桥战斗生俘敌官兵四十名，这在抗战中是新的纪录。华中的伪军士兵，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呀，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半年来，伪军反正四十二次，六千余人，足见新四军影响之大。

第三，新四军所居的地理地位，更是异常重要。它控制整个华中海岸线，和最富饶的长江流域。这个地区，如果给日寇完全统治了，则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于我国与盟国，都将是最大的不利。

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华中的面前，弃甲曳兵，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只有新四军，一直坚持着这个地区的神圣抗战，为将来盟国的反攻准备了前进基地。国民党的投降派、失败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把新四军看作眼中钉，藉着所谓“军令军纪”，必要把新四军消灭以为快。皖南事变，千古奇冤，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居心，已经暴露无遗。时至今日，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师其故智，天天在强调其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而这所谓“统一”者，不是别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谁也明白，这样的“统一”，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因为五分之四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来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国国土，不就“统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吗？真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好计策！天皇陛下之传令嘉奖是毫无疑义的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决不准许这样的叛卖阴谋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决不准许这样的阴谋。单拿新四军来说罢，它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

我们庆祝新四军的胜利。我们怀念身在囹圄的叶挺军长与许多忠勇将士。我们还要勉励新四军的将士，加强自己，扩大自己的队伍，密切部队内部的联系，密切部队与人民的联系，准备在与盟国联合对日反攻的事业中，大显你们英雄的身手罢！



毛泽东修改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的手稿（部分）。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0月7日）

一

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

二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对红七军也应承认是有功劳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今后作战方向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张平群发言错误，人民要求立即改组政府与统帅部[1]

（1944年10月8日）

【新华社延安八日电】据中央社重庆四日电，是日下午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记者询问政府当局对于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政府发言人张平群答称："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延安评论家称：自从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同志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集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以来，为时已历三周。随着正面战场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国民党独裁统治腐朽无能的日益暴露，立即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已成为我国一切爱国同胞（包括许多国民党员在内）和盟邦友人的一致呼声。不料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一呼声，竟采取蔑视态度。张平群是国民党当局的发言人，他的话暴露了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顽固不化、毫无民主气息的狰狞面目。目前寇患日深，敌骑迫近桂林，大后方门户洞开，民族危难急于燃眉，只有立即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才能挽救这一危机。中国抗战事业必须胜利，同盟国共同事业必须胜利；废止国民党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友邦人士的一致要求。但是按照国民党老爷们的意见，则是"不值讨

[1] 这是毛泽东修改过的新华社述评。标题是毛泽东加的。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论”，也“不拟讨论”的。果真“不值讨论”吗？整个大后方人民或者已受或者要受敌骑蹂躏了，人民要求立刻追问国民党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值得讨论的。果真“不拟讨论”吗？你们尽管“不拟”，人民的死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讨论的。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

对《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抨击英首相丘吉尔演说》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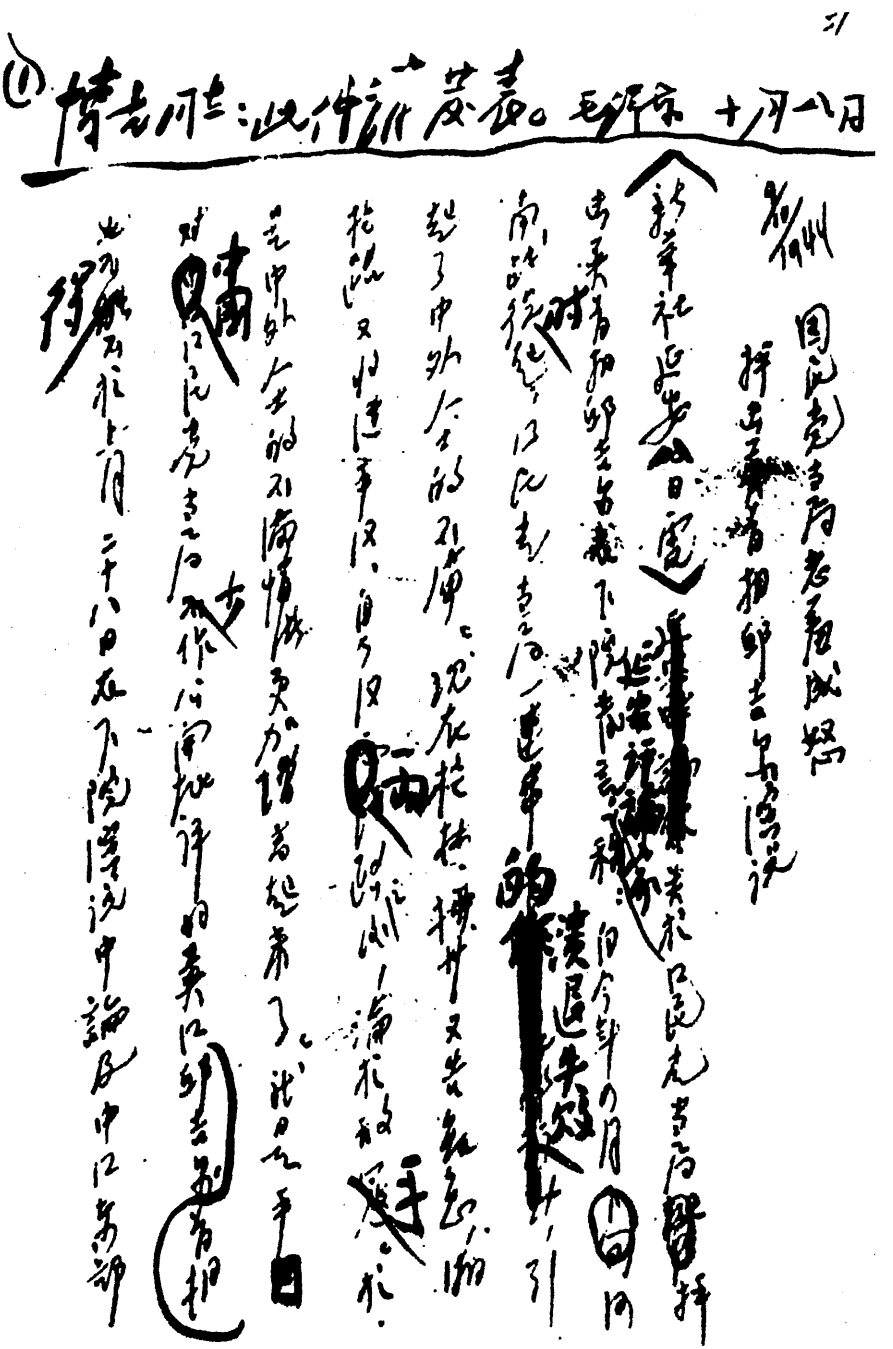
（1944年10月8日）

博古同志：

此件请发表。

毛泽东

十月八日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电讯《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抨击英首相丘吉尔演说》的手稿。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1]

（1944年10月11日）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说，大后方尚有广大土地，不怕敌人。寡头专政的国民党领导者们，至今看不见他们有什么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只有“土地”一项现成资本可资抵挡。但是谁也明白，仅有这项资本是不够的，没有正确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国主义是天天在威胁这块剩余土地的。蒋介石大概是强烈地感到了敌人的这种威胁，只要看他向人民反复申述没有威胁，甚至说，“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年间，革命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坚固”，就是他感到了这种威胁的反映。他又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他说，“国际观察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国舆论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都是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缘故。说也奇怪，罗斯福一类的外国人，也和宋庆龄一类的国民党人、国民参政会的许多参政员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都不相信蒋介石及其亲信们的好听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的申辩，都“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蒋介石对于此种现象感到烦恼，一向没有找出一个在他认为理直气壮的论据，直到今年双十节才找到了，原来却是他们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于是蒋介石在其演说中，用了极长的篇幅，痛骂这种所谓“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他以为经他这一骂，一切中国人、外国人的嘴巴可被封住了。对于我的军事政治，有谁再来“纷纷议论”的么，谁就是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我们认为蒋介石的这种指摘，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对于国民党的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敌寇汉奸从来没有批评过，倒是十分欢迎的。引起人们一致不满的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日本帝国主义作过多次衷心的称赞。关于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一事，也没有听见什么敌寇汉奸说过半句话，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天天压迫人民和天天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部，正是敌寇汉奸的希望。蒋介石及其一群历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提出的“反共”“灭党”两个口号，早已放弃了“灭党”，剩下一个“反共”，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宣战，他们说，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没有战争状态存在呢！国民党的要人们在上海南京宁波一带的财产，至今被敌寇汉奸保存得好好的。敌酋畑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蒋介石的祖坟。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特别是在日寇进攻紧急的时候，这种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由此看来，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已明其妙呢？这个“妙”的出处，究竟是“敌寇汉奸造谣作祟”呢，还是在

蒋介石自己及其一群的身上呢？

在蒋介石的演说中，还有一项声明，就是他否认中国将有内战。但是他又说："决没有人再敢背叛民国，破坏抗战，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在这里寻找内战的根据，并且他是找着了。有记性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正当中国叛卖者们宣布解散新四军，中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的时候，在蒋介石的一次演说中，曾说：将来决不会有"剿共"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讨伐叛逆的战争。读过《中国之命运》的人们也会记得，蒋介石在那里曾说：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勾结"过汪精卫。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上，又给中共安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八字由头。现在又读了蒋介石这篇演说，就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1]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2]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着蒋介石声言不打内战的时候，他已

---

[1] 庞炳勋，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孝强，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师长。他们于1942年、1943年间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

[2] 山西的决死队，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

经派遣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正在专门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的人民游击队。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他已宣布“放宽言论尺度”[1]，就不应该以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污蔑之词来威胁和封闭人们“纷纷议论”之口。他已宣布“缩短训政时期”，就不应该拒绝人们改组政府和改组统帅部的要求。他已宣布“用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就不应该又来寻找准备内战的理由。

[1] 1944年以来，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的普遍呼声。国民党为了搪塞人民的迫切要求，1944年4月，宣布所谓“放宽言论尺度”；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宣言“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国民党被迫所作的这些表示，事后一点也没有兑现，其压制人民言论的措施，随着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而层出不穷。

关于建立豫西根据地的部署[1]

（1944年10月14日）

郑、李、任、陈：

申艳电悉。（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2]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箕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3]，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郑位三、师长李先念、副政治委员任质斌和中共鄂豫边区委副书记陈少敏的电报。

[2]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太行军区第三团和新编的第三十五团，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1944年9月初，该支队在皮定均、徐子荣率领下挺进豫西，在箕山与嵩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3] 为增强豫西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以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八五旅第七七〇团和警备第一旅第二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1944年10月底，组建河南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刘子久任副政治委员。陈先瑞当时任豫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王、戴、刘、陈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委

酉寒

军委关于准备对付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致邓小平、滕代远等电[1]

（1944年10月14日）

邓、滕同志，并告山东、平原及五台：

申感电悉。华北有纵横六条大铁路，有连云、青岛、塘沽三个军商港，有公路如网，有冀鲁大平原（利于大兵战场），有东北依靠，有日本本土屏障，交通便利，空海易与陆军配合，在苏联不出兵满洲条件下，是日本陆军在大陆决战最理想战场，在华南因日之海空均劣势，运输困难，内地交通仅粤汉路而被破坏，将来盟国在粤闽登陆，日军可能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抵抗，以拖延时间，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然而使敌最感头痛的，是共产党八路军许多民兵游击队，这些抗日力量，不仅直接危害日军作战，而且是英美在华北登陆最好帮手，因此在决战开始前，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与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但目前日寇忙于准备美在菲岛登陆，隔断南洋，力求迅速打通安桂交通，华北敌军减弱，伪军动摇，我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根据地内之伪军、顽军及敌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敌人扫荡时破袭交通要道与袭击较大城市在外）。充实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准备对付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给邓小平、滕代远并告山东、平原及五台的电报。

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利用冬寒认真练兵。新发展区域及减租减息未深入地区，继续深入减租息斗争。减租减息已深入地区，注重各种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巩固军民团结与社会团结。在太行北岳山区努力增加子弹、炮弹、手榴弹、地雷、无烟抛身〈射〉药及炸药生产，隐蔽储存，以为将来严重不能生产时用。对伪军上下层工作均须加紧。这些工作做好，就是预见困难，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条件。以上意见，望斟酌实施。

军委　毛　朱

酉寒

在董必武、林伯渠来电上的批语

（1944年10月19日）

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对罗、丘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议，决定派五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对即将去前线干部的讲话[1]

（1944年10月25日）

一

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今年四五月间到现在变化就更大。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贪污腐化，没有一点希望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没有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中央就是这个政策。从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地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讲团结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关于审干、反特务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毛泽东总结讲话的一部分。

二

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党内也要加强团结。山头主义在今天才指出来，没有早些指出来，这是我的责任。

三

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

四

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上我讲的，就是一个原则，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



1944年，毛泽东和杨尚昆（中）、陆定一（左）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和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陈毅、刘少奇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和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和博古在延安。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

（1944年10月30日）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地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2]和秧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

[2] 秦腔，又名梆子腔，是流行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戏曲。

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1]，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

[1] 参见《论语·子路》。

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对随军南下干部的讲话[1]

（1944年11月1日）

要学会两种本领，头一个是松树的本领，第二个是柳树的本领。松树发育成长，不怕刮风下雪，严寒之下也能巍然屹立。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插到哪里都能活，一到春天，枝长叶茂，随风飘荡，十分可爱。柳树有“灵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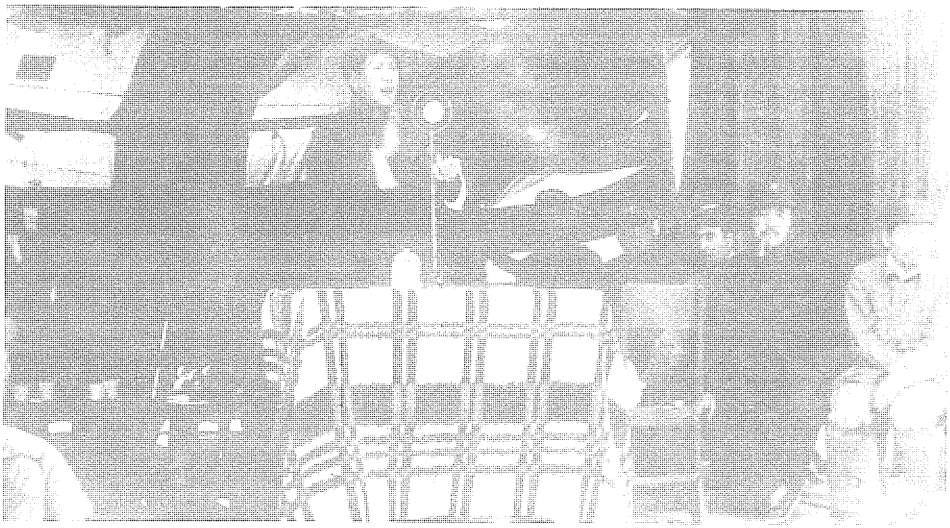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缺一不行。

---

[1] 南下支队由三五九旅抽一部分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由王震担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全支队分编为六个大队，其中第五、六大队由随军南下干部组成，于1944年11月9日告别延安南征。这是毛泽东对随军南下干部的一次讲话的一部分。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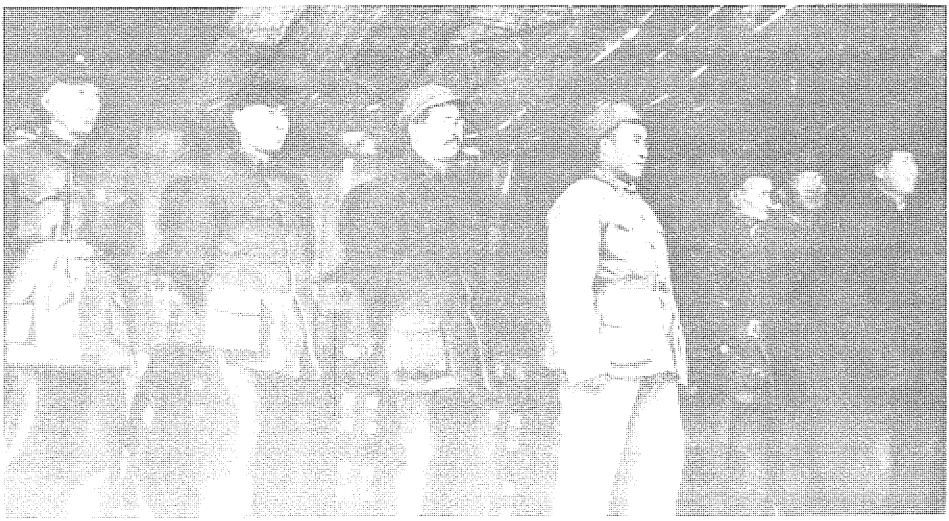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上讲话。



1944年11月，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聂荣臻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



1944年11月，毛泽东和陈毅在一起。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等检阅八路军南下支队。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检阅八路军南下支队。

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

（1944年11月2日）

饶、张、赖：

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2]，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3]带两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

（一）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4]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

（二）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三、二、四各师调五至六个团南进。

（三）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

（四）对各大城市工作作具体布置。

（五）对苏浙各区（浙东区、沪东区、杭嘉两区、浙西区、浙南

---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给新四军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的电报。

[2] 1944年夏，美军为抗击日军，准备在中国杭州湾附近登陆，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但到日本投降为止，美军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

[3] 粟裕，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4] 谭震林，当时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

区、苏南各区）作具体布置。

以上各项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哪些应急，哪些应缓，请提出意见。

毛　刘

戌冬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1月6日）

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他给以小的东西，加以限制，而得救命的大益。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赫尔利来延安谈判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和赫尔利的谈话[1]

（1944年11月8日）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2]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

---

[1] 赫尔利（1883—1963），美国陆军少将。1944年9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同年11月7日带着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题为《协议的基础》的文件飞抵延安，在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进行了3天的会谈后，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即跟着变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以后，赫尔利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国共两党多次接触和谈判中，他总是企图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并于1945年4月2日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本篇是毛泽东和赫尔利第二次谈话的一部分。

[2] 包，指包瑞德（1892—1970），美国陆军上校。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军观察组组长。

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1]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1944年11月7日，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欢迎赫尔利。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

[1]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的，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四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一百九十五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三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1]，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

[1] 赫尔利带来的《协议的基础》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

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

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

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一百九十五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七十七万五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

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

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

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六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百分之八十，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1]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2]，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十七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五

[1] 汤恩伯，曾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因在河南作战中溃败，当时贬任国民党军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驻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调查组，该组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于1944年7月到达延安。

十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三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赫尔利。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

电贺罗斯福当选连任

（1944年11月10日）

罗斯福总统阁下：

获悉阁下连任总统，谨致祝贺之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延安协定草案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1]

（1944年11月10日）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

[1] 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关于《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于1944年11月10日12时45分在延安王家坪签定的协定草案。

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　赫尔利
（见证人）　（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

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1]

（1944年11月10日）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的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的见证。

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

[1] 这是毛泽东就《延安协定草案》的签订和感谢罗斯福及其代表赫尔利为中国的团结统一作出的努力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写给罗斯福的信。

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于延安



1944年，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右起：马海德、博古、朱德、毛泽东、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聂荣臻。

华南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广西与南路[1]

（1944年11月14日）

林平同志：

（一）同意戌真电[2]所述各项。（二）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好输送干部给你们，因此派往西江的部队及干部能多一点为好。你们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向广西与南路[3]。（三）嘱咐去琼崖的人将中央对冯白驹[4]同志及其整个部队致慰问之意带去，并告诉他们的任务有二：第一，派得力部队向南路发展，和你们取得联系；第二，占领整个琼崖。（四）你们须办一大的训练军事、政治与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短的几星期，长的三四月毕业，分批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的电报。

[2] 指1944年11月11日林平给周恩来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该电汇报了广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情况，决定派干部到中区、南路、西江工作，成立珠江三角洲指挥部，成立中区军分委，派人与琼崖纵队联系等事项。

[3] 南路，指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部队是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

[4] 冯白驹，当时任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训，主要向广西方向派遣。

中央

戌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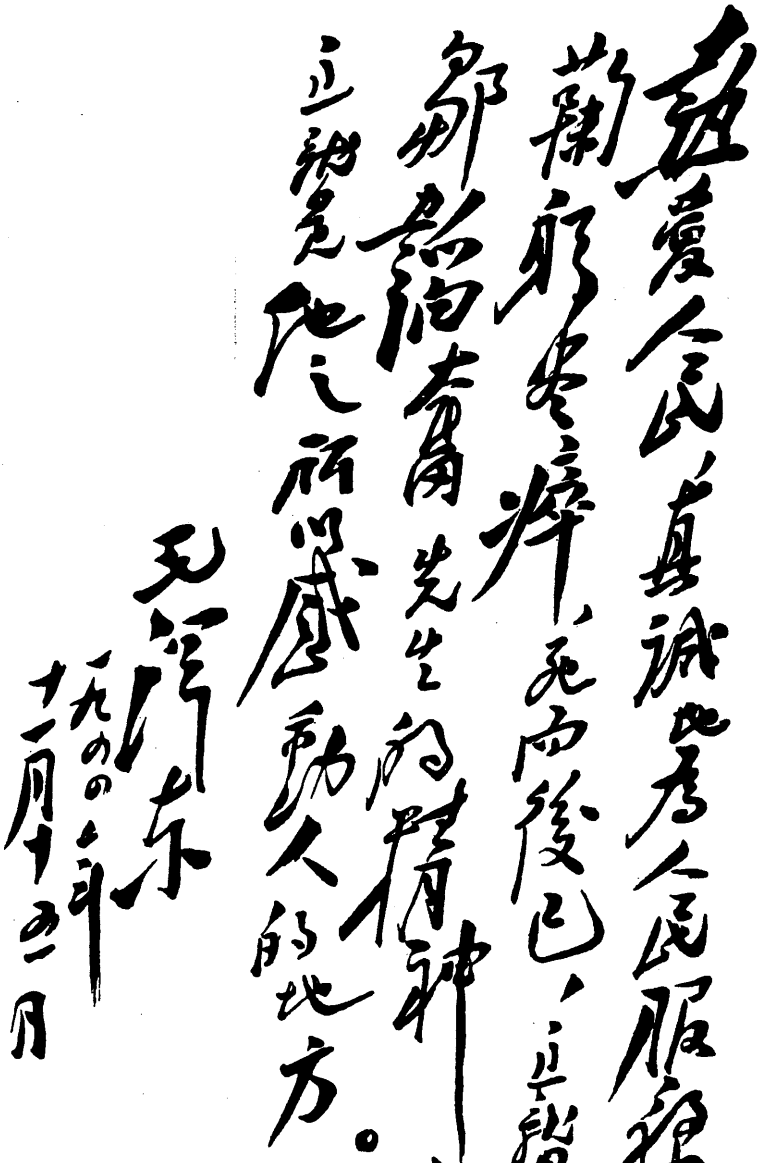
为悼念邹韬奋逝世题词

（1944年11月15日）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为悼念邹韬奋逝世的题词。

在一份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情况通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4年11月15日）

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1月19日）

我们总的方针是抗日统一战线，军事战略以抗日为主。统一战线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是自卫原则，有利是局部原则，有节是暂时原则。关于干部问题，城市工作干部原则上要派，但主要的还是从本地找。整个大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是不可靠的“左”的观点。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总之，需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取戴季英、王树声的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给郭沫若的信

（1944年11月21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1]，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2]，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

[1]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2]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1929年写的反映自己1910年至1911年生活经历的作品，1929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反正"，指辛亥革命。

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给柳亚子[1]的信

（1944年11月21日）

亚子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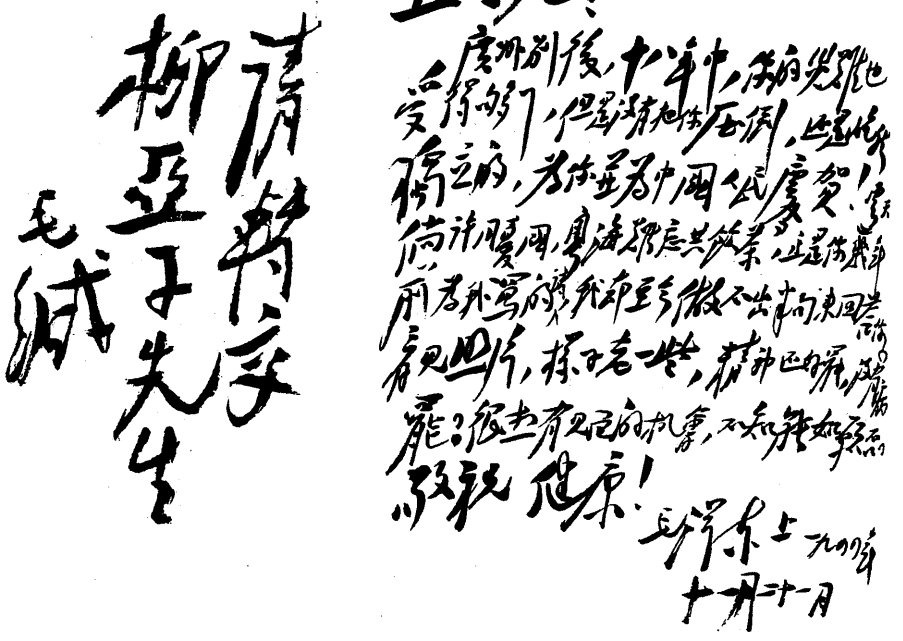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1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毛泽东致柳亚子信的手稿。

给沈雁冰[1]的信

（1944年11月21日）

雁冰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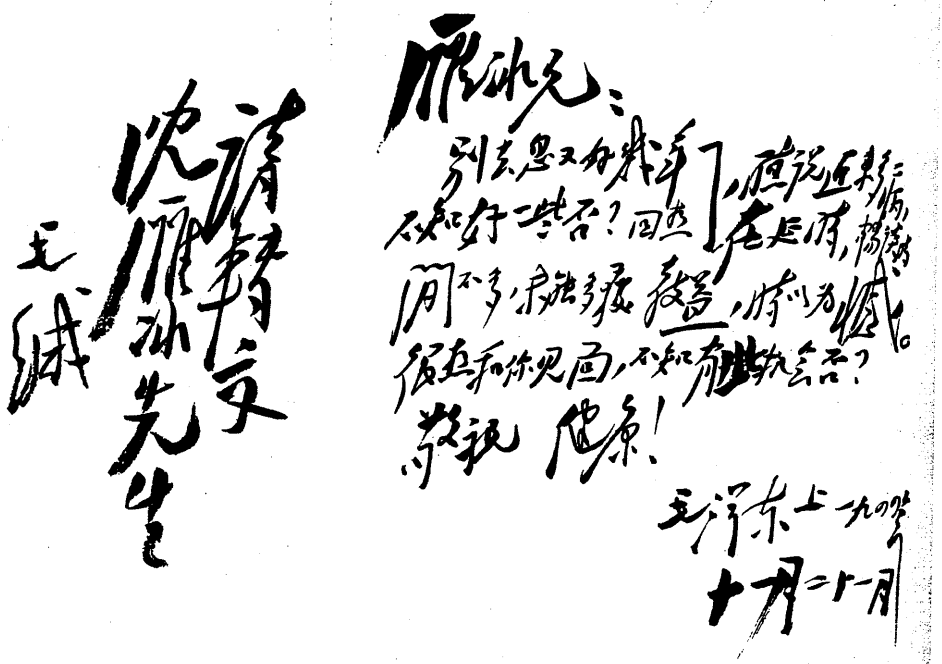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 沈雁冰（1896—1981），又名茅盾，浙江桐乡人，文学家。1940年5月曾到延安，并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



毛泽东致沈雁冰信的手稿。

在周恩来同赫尔利会见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44年11月21日）

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民党党政人事调动*

（1944年11月22日）

桂林、柳州失陷之后，日寇继续向黔边窜犯，正面战场的军事危机愈益严重，而政治经济种种方面的危机亦随军事的挫败而更加深刻化；国内广大人民及盟邦舆论不断严厉批评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并一致要求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成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军队的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作为挽救危局加强抗战争取胜利的起码步骤。国民党当局此次局部地更动政府人员，乃是今日国民党统治方面危机深刻化的反映。时至今日，国民党当局不能不顾及国内人民的愤懑及盟邦舆论的指责而撤换众矢之的的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以图缓和各方面的批评。但是，就是到了局势如此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仍未能下彻底改弦更张的决心，依旧想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寡头统治。因之，此次更调不能不是表面的，不彻底的，用以敷衍一时的。何、孔、陈虽然失去了军政、财政、教育各部部长的职位，但是依旧在国民党党政军中央机构中占领着枢要地位：何应钦依然还是职掌军令大权的参谋总长；孔祥熙依然是行政院副院长，他对财政部的影响依然存在着；陈立夫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依然控制着国民党庞大的党务机构。继任人选，并没有脱离国民党右翼集团的圈子，不特国民党外的其他党派没有加入政府，即国民党内较有自由主义色彩之孙科、宋子文等，亦没有增

加其在政府中的作用。这样，这次人事更动只是国民党当权集团内的职位更调，而这种更调是不可能真正有助于克服当前的严重危机的。要克服日益严重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种种方面的危机和加强抗战争取胜利，只有一种方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所早已主张的彻底改组政府和统帅部，将一切反民主派、失败主义者、法西斯分子，从政府与统帅部中肃清，吸收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利益与抗战利益的各党派、各军队的人物，组织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且一定要彻底改变政府的各方面的政策。只有这一办法，才有可能挽救大后方的危机。但是很可惜，国民党当局至今还没有这种决心。显然，这次政府人事更调，离全国人民这一要求，还相距十万八千里。如果国民党当局再欲拖延时日，不愿服从人民向它指出的正确道路，那么，危机只会一天一天地更加严重起来，甚至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这已经是十分明白的趋势。或者让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或者彻底改变错误方针，这就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两个方向，何去何从，惟国民党自择之。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1月23日）

来一个协定，去一个协定，现在又来一个协定，我们坚持同赫尔利在延安签订的协定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不同意，要发动一个尖锐的批评。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个步骤；另外一个步骤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可调一些人到广西、广东去，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华中来电决定向南发展基本上可同意。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国内形势等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复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电[1]

（1944年11月24日）

张、饶、赖[2]转浙东纵队诸同志：

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的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

---

[1] 1944年9月25日至11月5日，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在慈溪洪魏（后在余姚袁马）召开。会议听取了谭启龙关于《目前形势与我军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和何克希关于第二次自卫战争的总结。大会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致敬电。1944年11月24日，毛泽东给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复电。

[2] 张、饶、赖，指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

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1]

（1944年11月24日）

宣言草稿及八月决议均阅悉，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宣言在加上几句桂、柳[2]失陷情况及号召广西人民起来斗争之后，即可发表。八月决议应在干部中进行讨论，求得大家了解，坚决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的主要内容。

[2] 桂、柳，指桂林、柳州。

致周恩来电[1]

（1944年11月25日）

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事，并考虑有无办法来延，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

（1944年11月）

有的同志脑袋像个西瓜一样，西瓜表面是绿的，很纯净没有什么，但是切开一看，都是旁的颜色，红瓤黑籽，啥都有。有人表面看挺好，脑袋里装着自私自利，有封建迷信……这些复杂的观念是我们的包袱，就是敌人。

给陈毅[1]的信

（1944年12月1日）

陈毅同志：

来示[2]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3]，周、董[4]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

[1]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 1944年11月21日，蒋介石在拒绝赫尔利同毛泽东11月10日在延安签署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后，提出另一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允许中共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草拟了一个复案，毛泽东将此复案批送中央负责人和陈毅等阅看，征求意见。陈毅在看了复案和研究了有关材料后，于12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分析了国共谈判的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蒋介石不会走真正同共产党合作的这条路，而是要照他提出的协定办，因此建议中央暂不交复案，拖一段时间，等待蒋介石集团力量的削弱，同时在此期间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3] 复案，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蒋介石1944年11月21日提出的国共之间的协定草案的答复。

[4] 周，指周恩来。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周恩来、董必武在收到毛泽东1944年12月1日关于暂不交复案，“请周、董同时回延”的电报后，于12月7日回到延安。

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1]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2]公开后，伯承[3]即无秘密之必要。昨日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4]一商。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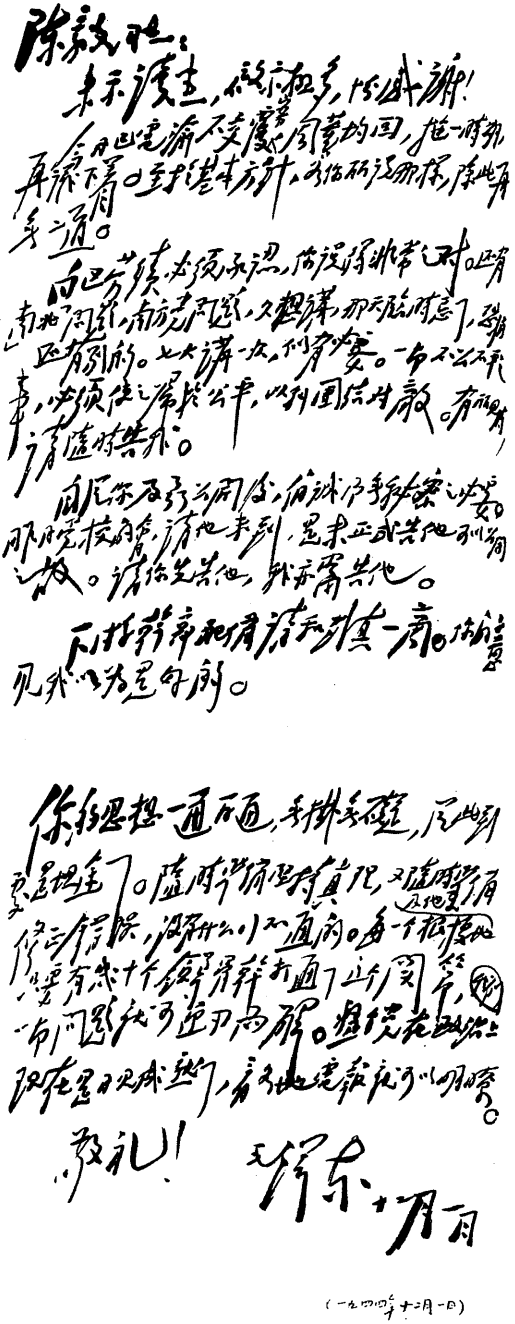
---

[1]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中，特意补充讲了南方、北方问题，大后方党的问题和白区工作问题。参见《时局问题及其他》中后半部分内容。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3]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毛泽东致陈毅信的手稿。

给谢觉哉[1]的信

（1944年12月1日）

觉哉同志：

此件[2]很好，略有增删，请斟酌。

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3]，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这一点以及此次参议会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请告高、林、罗[4]诸同志。

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这些请考虑。

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

---

[1] 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 指谢觉哉起草的他准备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参议会常驻会工作报告。这次参议会在1944年12月4日至19日举行。

[3] 毛泽东1944年12月2日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

[4] 高，指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林，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罗，指罗迈，即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在我们的这类文件上，不宜提及苏联宪法，免人误会。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复周恩来电[1]

（1944年12月1日）

复案已到，目前不宜交去，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如交复案过早是不利的。因此，请周、董同时回延，并告赫尔利周不能原机返渝。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1]

（1944年12月4日）

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1] 这是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察冀分局等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复王震、王首道电[1]

（1944年12月4日）

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筑工增兵，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王震、王首道2日关于“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通过”的请示的电报的主要内容。

和包瑞德的谈话[1]

（1944年12月8日）

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那三条建议的主要点是，共产党的部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的军队裁减到任何数目。此后，我们就将处于听任他摆布的地位。

这不啻是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但是这个委员职位是毫无意义的。冯玉祥将军和李济深将军当年都是显赫的将领，他们也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可言。实际上，整个军事委员会已经长期没有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席位，我们将能看到一切军事报告，从而可以获悉政府的各项措施，而且我们亦将处于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我们谨此表示难于苟同赫尔利将军的意见。我们明确告诉他，虽有一位共产党人参与全国军事委

[1]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1944年12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同包瑞德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包瑞德（1892—1977），美军观察组组长，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员会，但他对该会的工作的了解绝不会比局外人多，而且他在该会也不可能有比局外人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深知我们谈到的那种情况。

赫尔利将军还说，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席位，将使我们“有一只脚进了大门”，以此作为起点，将使我们的地位的重要性扩大，从而加强我们的影响，以达到如下之程度：最终我们将控制整个政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根本错误的概念。但是，我们未能说服赫尔利将军相信这是错误概念。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乃是，如果双手被反捆着，“有一只脚进了大门”是毫无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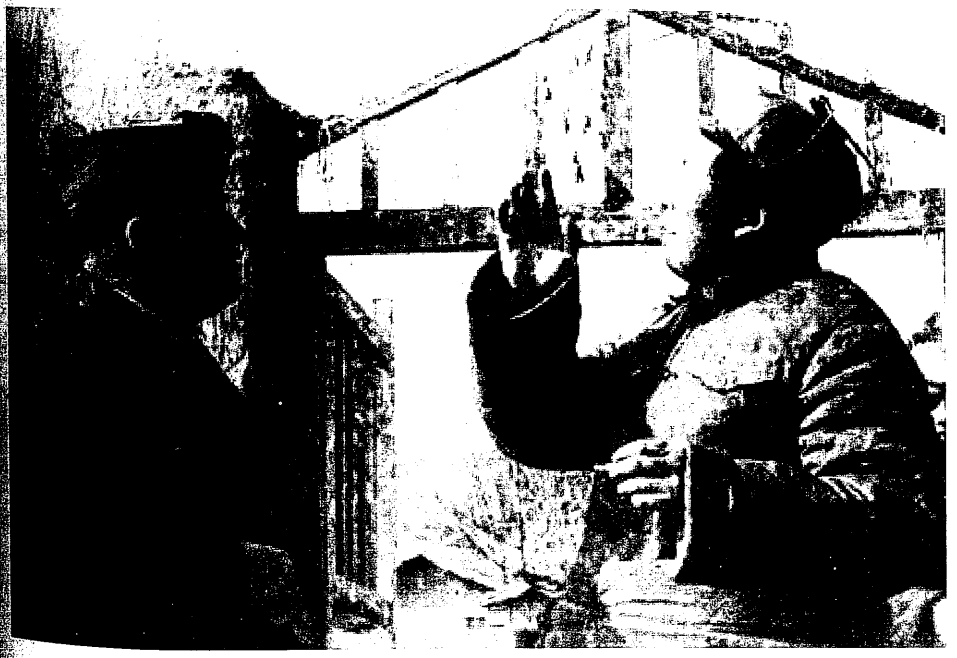
赫尔利将军、魏德迈将军以及麦克卢尔将军曾对周恩来将军说，美国渴望在军事上同我们合作，但是，在我们能够给予这一合作——这是我们非常乐于提供的——之前，我们必须先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然而，美国并没有向我们提供在这些条件下有关我们安全的绝对保证。我们感到我们不能合乎体统地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这类保证。实实在在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不能相信美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给予保证，不论它可能是何等诚挚地渴望这样做。我们不可能信任这位委员长具有良好的信义。任何人只要没有偏见地研究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都会通情达理地想到我们不会对他寄予任何信任。

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点令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时询问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于是，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那些条件显然是很公平的，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他的建议下提出的，但那个委员长却拒绝了这些条件。现在美国又那么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我们牺牲我们自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于理解的。

我们还被告知说，我们牺牲自己以挽救局势，那是高尚的事

情。但我们看不出，我们把自己置于听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时，又何以能有助于挽救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还说，如果我们让步了，我们将赢得世界上的赞扬。但是，如果我们听任这个委员长捆住我们的手脚，世界上的赞扬是帮不了我们什么忙的。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我们武器，他就能派美军军官来帮助我们练兵，并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衷心欢迎这类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如下代价，即委员长要求我们接受这种援助时，须经他点头批准。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下列事实：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唯一的自卫手段——我们的军队，我们就不得不屈从那位委员长所能够并将要强加给我们的各种限制；如果到了这个田地，我们简直就没有什么可以同你们合作的手段了。



1944年，毛泽东和包瑞德在一起。

毫无疑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但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就不给我们参加政府的机会。我们重复说一遍，如果双手被反捆着，一只脚进了大门是没有用处的。

要求我们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在很大程度上应对当前危机负责的那个委员长却不被要求做点牺牲，这看来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承认我党的合法性没有任何牺牲可言，我们也不能认为那无济于事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给我们一个席位是一种牺牲。

无论魏德迈将军可能是何等真诚地渴望给我们援助，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委员长的条件，他就不能够援助我们了。我们希望在同日本人作战中和美国合作，我们希望在当前危急的形势下也伸出我们援助的手，而我们也需要美国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援助。但是，全盘工作都被这个委员长所妨碍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合理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我们接受美国的援助当不会成为问题。但是，我们的条件竟被这个委员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而且他还妄图要把责任推到我们肩上。

美国认为蒋介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保留其执政，我们并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乐于赞成他继续当领导。然而，我们也并不打算放弃在全国军事委员会应分配给我们的那个席位的权利。

如果看看蒋介石的过去，美国希望继续支撑那腐朽的框架——蒋介石，那是美国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它所要做的一切事情，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难道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时蒋介石将会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吗？当然他是办不到的。史迪威将军已经知道在军事行动中可以依靠蒋介石的程度有多大。且看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吧，直到他把昆明、贵

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丢光，到那时也许它才会认清，支持他是完全无用的。

我们不像蒋介石，并不是必需其他国家的支持才活得下去。我们能够顶天立地，像一切自由的人民一样行动自如。

虽然这个委员长有许多缺点和短处，我们认为他还没有同日本人谈和，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不过话得说回来，唯有乌龟王八蛋才会拒绝同日本作战的。

根据五点建议，我们相信，在美国的帮助下，对于挽救当前的形势，我们还能做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同日本的战斗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相信，魏德迈将军知道我们能够做出什么帮助，如果我们得到允许的话。但是，我们不能被捆着手去打仗。我们完全愿意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政府的指挥，如果我们在这个政府内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席位将不会让我们有发言权的。

如果美国同我们分手，我们固然感到很遗憾，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我们将在任何时候，在目前或在将来，抱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援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同美国将领的指挥合作，万众一心，尽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对你们所怀有的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的海岸登陆，我们就将在那里接应你们，并且同你们的指挥合作。

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他们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撤离，我们将感到惋惜。如果他们撤离之后再回来，我们将再次欢迎他们。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打击日本人，而且我们也仍然是美国的朋友。

我们在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下已经同日本人战斗了七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如果美国不援助我们，还有英国和苏联会援助我们。（包瑞德按：我说明，根据我个人的意见，他们不可能指望英国会给他们很大的援助；他们对此没有作答。我没有就苏联的情况发表我的意见。）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并没有向赫尔利将军交代清楚，那五点建议就是我们的最后答复。上校又说，他认为赫尔利将军把那五点看作是我们的“讨价”。而那五点就是我们的最后条件，其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所要作的一切让步。我们在同意接受那个委员长为领袖时作了让步；我们在同意让我们的军队接受统一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时作了让步；我们还在美援助物资分配方面让了步，我们只是要求获得公平的份额，不能一无所得；此外我们并没有要求别的东西。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了。

我们完全知道，赫尔利将军不能担保那个委员长会接受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他仅说过以下的话，那些条件是公平的，他将尽他最大的努力使那个委员长接受那些条件。但是，蒋介石拒绝了这些公平的条件后，我们并不期望赫尔利将军再来延安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同意需要我们作牺牲的反建议。

如果美国不能理解我们就一旦接受了蒋介石的绝对控制时我们将遭到的处境的预料，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全都白费力气了。周恩来将军在重庆时，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向赫尔利将军说明这一点。如果赫尔利将军到现在还不理解，恐怕他永远不会理解了。周将军再去重庆把这些问题同他重谈一遍也将不会起作用的。

由于蒋介石已经拒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而我们又决心不再让步，所以我们也已经下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

控制下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织代表各该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不过我们也不指望将会获准。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将是组织另一个政府的初步措施。

周将军在重庆的时候，没有把拟议组织这种联合委员会的计划告知赫尔利将军。这一措施经过长时期的考虑，不过在周将军返回延安之前，他没有获悉这一措施已经肯定下来了。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现在采取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是的，我们已经把门关上了，但我们让窗户开得大大的。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将乐于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丢光了，我们就将不会按照我们早些时候提出的那些条件去参加了。

上校，你大概还记得，十一月十日在赫尔利将军即将动身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在那份由我们起草并按他的建议作了某些修改的条款上签了字，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同国民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是他建议我们签字以示我们经考虑认为这些条款是公平的。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份文件连同签字向中外报纸公布的时机总会到来的，虽然我们非常不高兴这样做。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2月9日）

一、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有四个目的：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这四个目的要鲜明地提出。二、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三、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1]

（1944年12月12日）

若飞同志：

（一）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周（恩来）致赫（尔利）信中提到准备发表五条即是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至于赫（尔利）在五条上签字及赫（尔利）毛（泽东）交换信件，我们自始无发表之意。我们所想发表者仅是我们向蒋建议之五条，因蒋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无法实现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开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此点待包瑞德回来再和他商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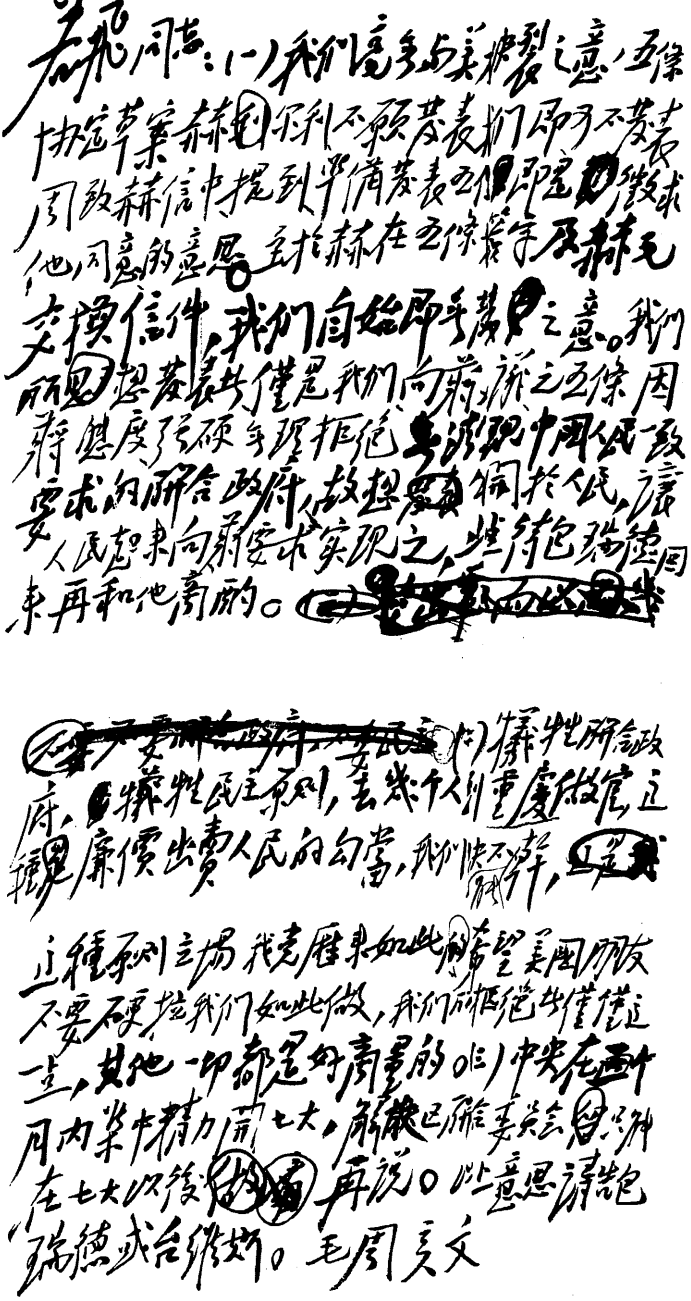
（二）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三）中央在三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说。以上意思请告包瑞德或台维斯。

毛　周

亥文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给王若飞的指示。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的手稿。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

（1944年12月15日）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2]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3]，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 莱特岛，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之一。1944年10月20日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同年12月下旬完全占领该岛。

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1]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

---

[1] 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8年6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5月至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

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的方法是必要

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

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

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

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

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有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

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给赫尔利的信[1]

（1944年12月16日）

十一月间，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请你转达给罗斯福总统，我对于他的这个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向他致谢！

请包瑞德上校带此信给你。我希望包上校能够早日回延工作。

其他要说的，均见于周恩来将军给你的信上。

[1] 这是毛泽东致赫尔利信的主要内容。

晋察冀部队应努力向日军占领区发展

（1944年12月18日）

子华[1]同志：

亥文电悉。（一）敌对蒋[2]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二）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三）沦陷区扩大，如我党能执行正确政策，便可使现有军队获得巩固，并可在新发展地方扩大军队。（四）豫湘粤浙四省明年可能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已抽出六千军队及干部分赴豫湘。（五）河南发展，胡宗南汤恩伯[3]两部又南调十余师，此间已不感威胁，不须再增兵。（六）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毛泽东

亥巧

---

[1] 子华，即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蒋，指蒋介石。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曾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因在河南作战中溃败，当时贬任国民党军黔桂湘边总司令。

在王树声、戴季英的电报上的批示

（1944年12月19日）

高岗、陈云同志：

王震来电，太岳大雪，多人受冻，脚部冻伤成残废者三十多人，要王戴部备足鞋袜。今阅此电，又缺少放哨大衣。请急为处置为盼。

怎样办地方报纸[1]

（1944年12月20日）

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1] 这是毛泽东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抗战日报》是《晋绥日报》的前身。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2月20日）

董老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沦陷区扩大了，沦陷区的工作很重要，应提到与解放区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扩大解放区，组织沦陷区，援助大后方，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五门搞好。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给邓宝珊[1]的信

（1944年12月22日）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2]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

敬祝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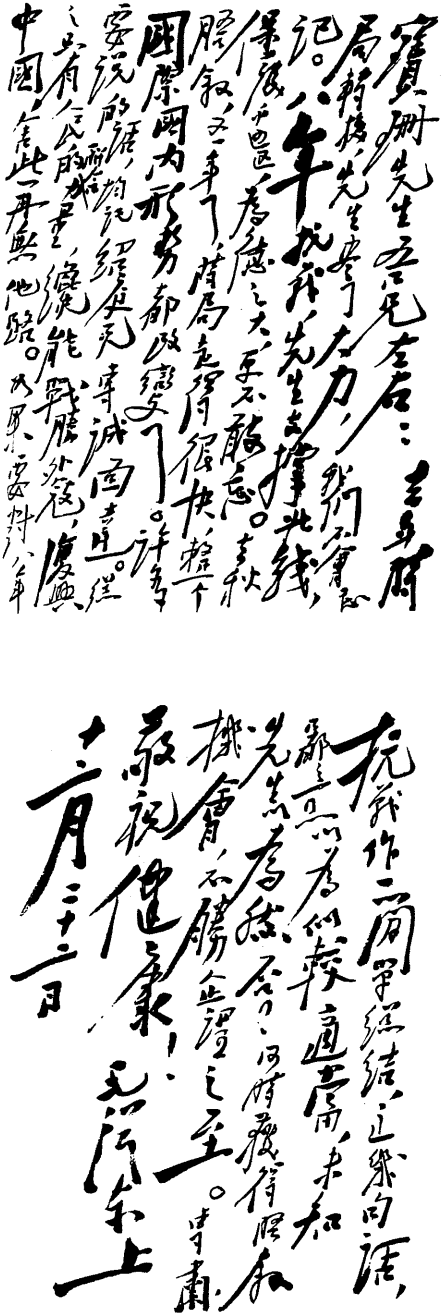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

[1] 邓宝珊（1896—1968），甘肃天水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2] 绍庭，即刘绍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毛泽东致邓宝珊信的手稿。

复赫尔利电[1]

（1944年12月22日）

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1] 12月21日，赫尔利来电，希望周恩来再去重庆商谈。这是毛泽东复赫尔利电的主要内容。

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

（1944年12月24日）

子华[1]同志：

关于李勇的落选[2]，你们的处理是对的。值得注意者，是李勇的骄傲，主要的由于我们未能向他多作教育，使他不要骄傲。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毛泽东

亥敬

[1] 子华，即程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

[2] 指各抗日根据地准备出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

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1]

（1944年12月25日）

罗、黎：

（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二）每一地区，从开始减租到全部澈底完成减租任务，大体要经过三年时间，还要抓得很紧，稍为放松，即难完成。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文教工作，大体也是如此。要有这些时间，全体干部才能学会，全体群众才能发动。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

（三）人民生产工作，希望加强注意。

（四）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

（五）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

（六）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须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可种。

毛泽东

亥有

[1] 这是毛泽东给罗荣桓、黎玉的电报。

复邓小平电[1]

（1944年12月25日）

关于十个问题[2]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1] 这是毛泽东复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毛泽东7月28日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电报中，要求各地答复的10个问题。

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电[1]

（1944年12月25日）

美军极注意国共磨擦，闻蒋令李宗仁发动对我进攻，他们即令欧高士等来你处进行考察，究竟谁进攻谁。望将国民党一切无理进攻情形随时告知欧高士，同时望通令各部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不给国民党以借口。

[1] 这是毛泽东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电的主要内容。

致王震、王首道电[1]

（1944年12月30日）

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据环境决定。并请告皮定均、徐子荣，中央对他们的努力，甚为满意，并问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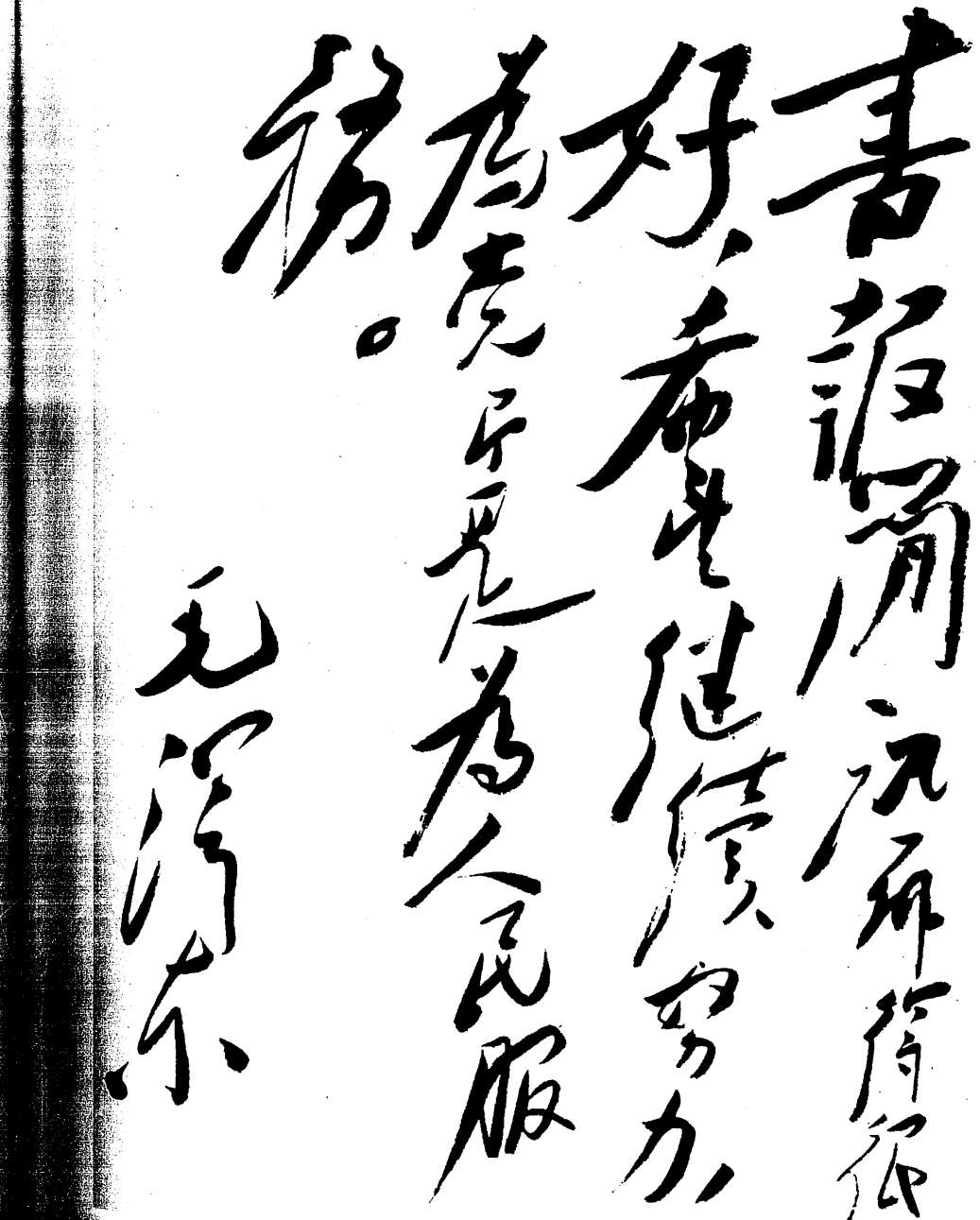
[1] 1944年12月27日，南下支队经过50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这是毛泽东致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

（1944年冬）

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的题词。

两次为中央直属机关群众代表大会奖状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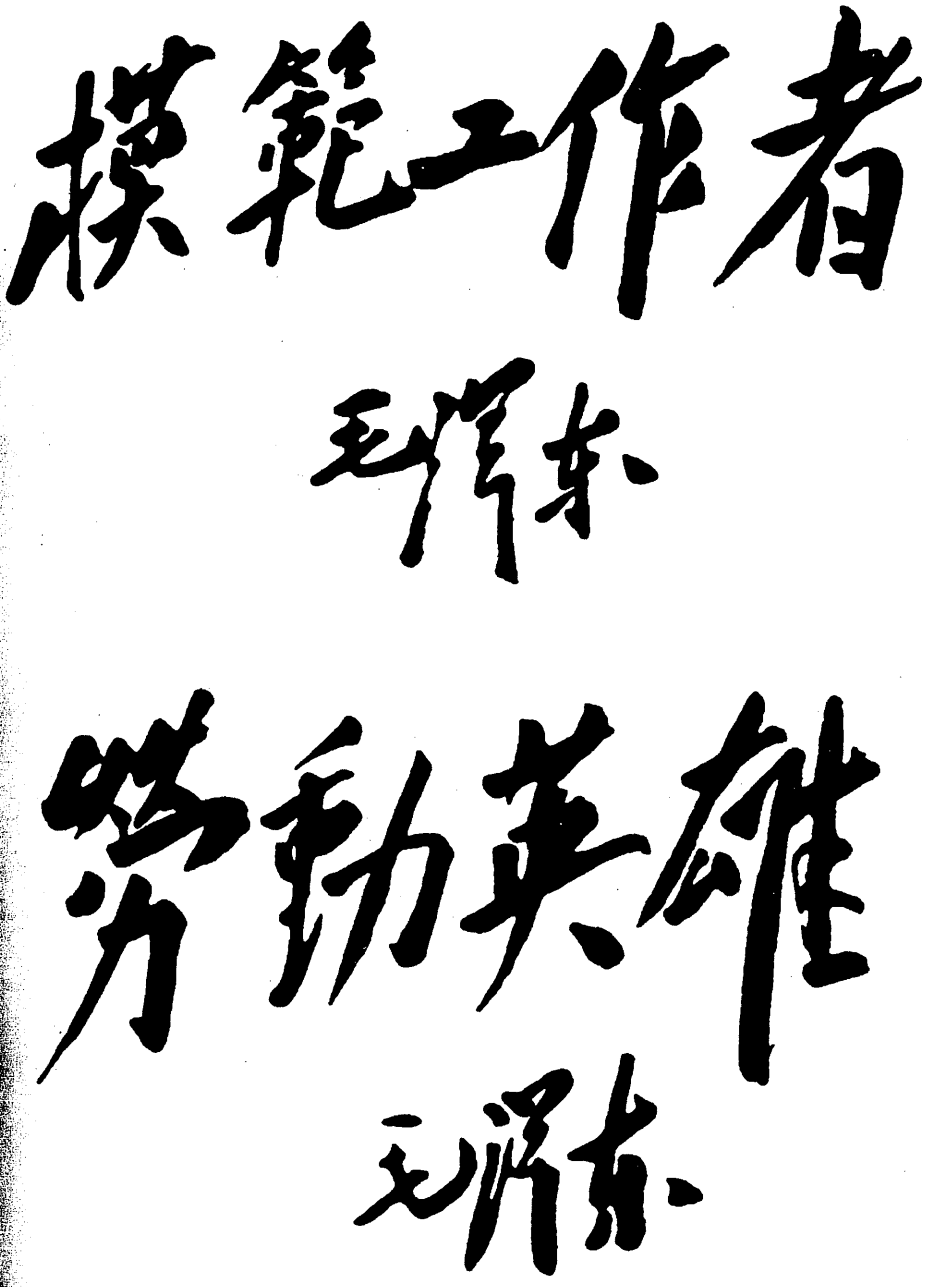
（1944年12月）

模范工作者。

毛泽东

劳动英雄。

毛泽东



毛泽东两次为中央直属机关群众代表大会奖状的题词。

对薄一波一份自我检查的批示

（1944年）

个人，同整个党一样，都有一个觉悟过程，文内所说，都是这个觉悟过程中的事。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

和王树声的谈话[1]

（1944年）

你分析得很精辟。中央也考虑，想派徐向前、戴季英、刘子久等同志和你一道，带一支生力军，速往中原，跟先期活动在那里的皮定均、徐子荣部会合，组成河南军区，发动群众，把汤恩伯丢下的大批武器捡起来，搞好根据地，抗战到底，夺取最后胜利。

[1] 时值抗日战争已进入决战决胜的阶段，王树声一心想要上前线。这是毛泽东听他分析了中原战局后和他谈话的一部分。1944年9月，王树声率部进入豫西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组建了河南军区，任司令员。

和G·斯坦因的谈话[1]

（1944年）

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则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

你们不要打击一个害病的人，必须打击这个人的疾病。

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只有一样是共同的，他们所共同的是他们的政治思想方法，全遵循马列主义的道路的。每个地方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区别开这种思想方法与另一种全然两样的事，作为思想方法的最终政治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制度。特别在中国的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分别清楚，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观察、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实际的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这种政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一定要作为我们的最近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

---

[1] 这是毛泽东和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G·斯坦因谈话的一部分。

1945



1945年，毛泽东乘飞机赴重庆谈判。

新年献词——争取胜利早日实现*

（1945年1月1日）

一九四四年过去了。这一年是反法西斯战争有决定意义的转变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以这样的辉煌的业绩标志着：苏联领土的全部光复，盟军在西欧第二战场的开辟，芬保罗轴心附庸的投降，法、比、南、希、波人民解放运动的巨大增长及这些国家领土的全部或大部解放。一九四四年完成了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德寇的战略计划，战争现在已经进行于纳粹帝国本土的边境上。苏维埃大炮轰击着东普鲁士的防线，美英大军攻打着德寇的西墙。无论德寇还怎样在竭力挣扎，甚至局部地还企图反扑，但是战争对希特勒是输定了。德寇的一切挣扎，至多只能苟延若干时日，但是绝没有可能抵御一九四五年的盟国的最后联合攻势。一九四五年将是纳粹德国最后覆灭的一年。

在太平洋上，一九四四年美军展开了对日寇规模宏大的攻势，相继攻破日寇的内外防线，从马绍尔、新几内亚经马里亚纳、帛琉而抵菲岛，并将日本本土放在美空军的战略轰炸之下。一年来日寇在海上丧土失地损兵折将，完全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日寇依然保持着它的海军主力，陆军尤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且在中国国民党战线上得到巨大的进展。因之，一九四五年在远东战场上将必然会有比一九四四年更残酷激烈的战斗。远东战争的胜利的迟速，在很大

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战争努力，取决于同盟国在远东海上与陆上的联合反攻。要增强中国的战争努力，准备与实施中国战场上的反攻，就要克服由国民党执政者的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而克服这种危机的道路，只有废除国民党腐朽的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

一九四四年是中国战场上重大变化的一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这五年零四个月，在中国战场上来说，形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停止正面进攻，集中进攻敌后解放区。国民党统治者，对于抗战则文恬武嬉，对于反共反人民则非常积极。因此敌后解放区的军民，就处在严重的困难情况中，肩负着坚持中国战场抗战的全部重大责任。这五年余的时间中，在敌后解放区的城市村庄，经过敌寇十余次烧杀的，只算是普通现象，毫不稀奇，而在边缘地区，甚至有经敌寇烧杀六七十次者。在这样闻所未闻的严重摧残之下，人民旧日的积蓄，荡然无存，然而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十大政策，团结更加巩固了，战斗更加强韧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解放区由缩小的状态又一天天地扩大了，我们打败了冈村宁次，也打破了国民党内反动派的三次反共高潮，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在国民党战场上，敌人五年半中没有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采取敌来我去的消极避战政策，驯致士气丧尽，见敌即溃。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专制独裁，贪污横行，党政军民离心离德，官僚机构腐败不堪。日寇把中国人民看作“猛虎”，而把国民党政府看作“猛虎的囚笼”，以至声明不以重庆军为敌。但是从去年四月以来，敌人由于美军在太平洋反攻所造成的战略形势的不利，无可奈何，不得不除了在敌后依然控制庞大兵力

以外，以一部兵力向这“不以为敌”的“猛虎的囚笼”进攻，以求得贯通大陆交通线及驱逐美军在陆上的空军基地。自从去年四月日寇恢复对国民党战场的攻势以来，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豫湘桂诸省相继沦陷，不到半年而达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而在同一时期中国解放区却节节胜利，解放了八万方公里国土，一千二百万同胞。一年来中国战场上的变化，鲜明地反映了抗战中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两套办法的对比：消极抗战、坐待胜利、保持实力、排斥异己的政策，引导到溃败与危机；而新民主主义的积极抗战的政策，则引导抗战走向巨大的胜利。

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军事失败，国民党战线处于严重的局势中。如果继续让日寇深入国土，那么，日寇是能够相对地暂时地挽回其颓势，使战争延长，使中国人民与同盟国人民的痛苦和牺牲增大。不承认这一点，或者不强调这一点的严重性，那就是对于我国人民，对于我们盟国不负责任。事实上，国民党战线的溃败，已经使日寇能够多少挽回其战略颓势，已经延长了战争，和增大了人民的痛苦与牺牲了。这个责任，是应由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担负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全国同胞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在可以反攻的地方要进行反攻，在应该准备反攻的地方要准备反攻，而另一方面则必须努力停止敌寇对大后方的前进。我们的任务，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概括为四个口号，这就是：“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在这四个口号中，最中心的一个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处于三种不同条件下（解放区、大后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所应

一致努力的任务。因为，一九四四年的经验，已经明白地指出了，如果不彻底革除国民党统治者的错误政策，采取新的抗战民主团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政策，不驱逐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说不上配合盟国实行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联合攻势。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挽救中国正面战场的危机，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缩短战争，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

今天抗战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了。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全国同胞备尝了战争的种种痛苦，我们渴望着战争的迅速胜利。而日寇则希望着拖延战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则以其错误政策来帮助日寇延缓中国的胜利，加深人民的痛苦。际此新岁，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以严肃的态度，切实的工作，来争取抗战的迅速胜利。尤其是在今年之内，要争取到这一迅速胜利的先决条件——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实现。

在延安干部新年晚会上的讲话

（1945年1月1日）

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过去我们早就实现了这个方针，今后更要加强它。共产党员，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团结得越好，则对于敌人的打击也越有力量。

和郭述申等的谈话[1]

（1945年1月1日）

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一万多地方部队。去年各根据地生产搞得好，部队每人每日五钱盐、五钱油、一斤菜，比前几年好多了。不管敌人是早倒还是晚倒，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 这是毛泽东和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等谈话的一部分。郭述申，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同年秋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该校第三部主任。

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1945年1月3日）

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八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地反省和一致地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入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借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被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

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日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一张，“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第二张，“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三张，“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七年半，不论哪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吗？“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

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吗？“俟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吗？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到了一九四五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一九二五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不先消灭寡头专制，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吗？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复太岳区党委电[1]

（1945年1月5日）

二日电悉。不是两年胜利，而是两年准备胜利。我们至少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对于争取胜利方有较大把握。

[1] 这是毛泽东复太岳区党委电的主要内容。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

（1945年1月10日）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你们的经验，这次会议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文件说得很好，不但这里适用，各地也可以适用，我就不讲这些了。我想讲一点我们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的经济工作。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

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比如我们提倡采取现有样式的军民生产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

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

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由于展开了生产运动，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方面都吃得很好。

我们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用费，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被服。

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

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钱）、盐（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用费的百分之五十，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地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样，也就很好。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有人说：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生产，就不能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这些都

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一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地开始了练兵运动。机关因为生产，工作人员生活改善了，工作更安心、更有效率，边区和前方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

在这里，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我们有些地区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会要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

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已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给刘昆林[1]的信

（1945年1月11日）

昆林同志：

来信收到。此信及以前各信均已转给中组部，并请他们找你一谈。

你长期不被信任，难怪你不满意。但真金不怕火烧，还是应该有耐心，等候同志们了解你，除此都不是出路。看你此次的信，你的问题似乎可以获得解决了，更希望你耐心等候。

这一向颇忙，我们暂时不谈。你在延安有一个停留，将来再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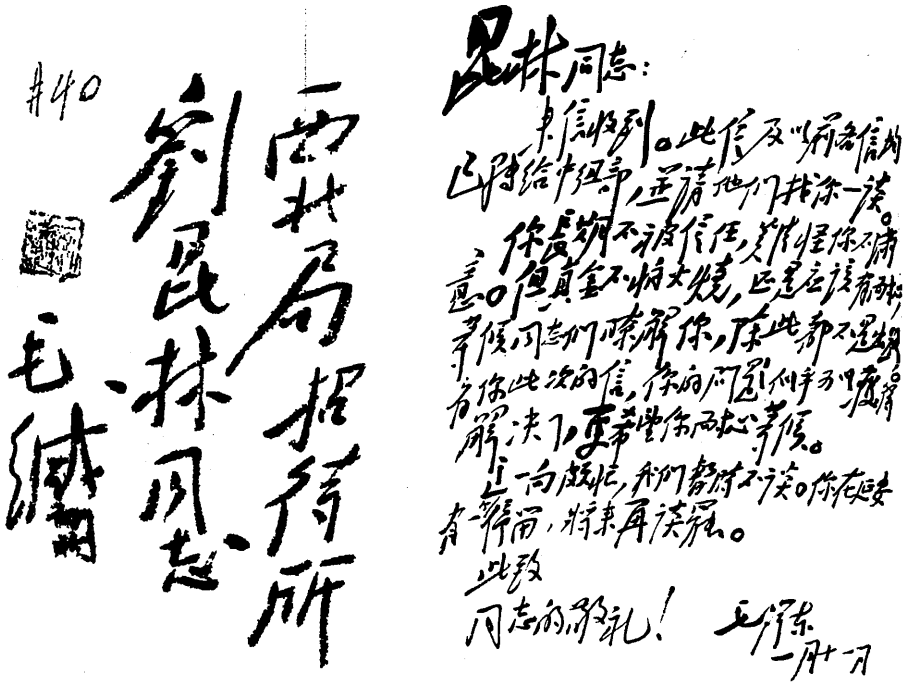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

[1] 刘昆林（1898—1980），湖南桃江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曾因1928年脱党等问题受到审查。



毛泽东致刘昆林信的手稿。

关于召开国事会议预备会议给赫尔利的信

（1945年1月11日）

赫尔利将军阁下：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来信敬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间敝党方面所提五条已为国民政府所拒绝。国民政府所提三条，敝党方面又万难同意，因有先由国民政府自动实行释放政治犯等四条之请求，借以证明国民政府是否有诚意在民主基础上解决国事问题。今接阁下来信，提议在延安开两党会议，并有阁下参加，盛意可感。但是鄙人仍恐此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徒劳阁下等之往返。八年来一切两党秘密会议，均证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鄙人现请阁下向国民政府转达敝党方面之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上述提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如何？敬请见复。顺颂时祺

毛泽东

给和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的指示[1]

（1945年1月24日）

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1] 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告知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和国民党政府谈判。这是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前毛泽东的指示。

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和国民大会等问题致周恩来电[1]

（1945年1月28日）

周：

敬、感两电悉。甚为欣慰。

（一）王世杰说五条中无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可反问他：国共两党能包办国事吗？如果你们同意五条，请问不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如何产生联合政府？没有写进五条中的东西还很多，例如各党加入联合政府的比例，取消特务，撤退包围，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等等，难道都不成问题了吗？

（二）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开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

[1] 周恩来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5、26两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情况。电报说，赫尔利和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了这两个补充办法，指出这是不公允和无理的。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复电。

国大把戏。

（三）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毛

和林伯渠等的谈话[1]

（1945年1月30日）

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解决。

[1] 1945年1月30日，毛泽东和朱德、任弼时听取林伯渠、李维汉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检查工作中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有些党外人士认为他们有职无权，非党员受歧视。这是毛泽东在听汇报后和林伯渠、李维汉谈话的一部分。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1]

（1945年1月31日）

我们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的生产运动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不成问题了。但是在游击区中，在敌后之敌后，是否也能够这样，在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还缺少证明的缘故。

可是现在有了证据了。根据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一九四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张同志报道中所提到的区域和部队，有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有山西的代县和崞县的部队。那些区域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公路如网，敌人利用它的军事上的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处地转移。"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了生产。其结果："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许多人说：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首先在农业为主的方针下，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共有九种办法：第一，平毁封锁墙沟；第二，平毁可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在其两旁种上庄稼；第三，利用小块荒地；第四，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第五，与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伙耕；第六，部队化装，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边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第八，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伴种。"

农业生产是可以的，手工业及其他生产大概不能吧？果真不能吗？请看晋察冀："沟线外部队的生产，不限于农业，而且也和巩固区一样，开展了手工业和运输业。第四区队开设了一个毡帽坊，一个油坊，一个面坊，七个月中盈利五十万元本币。不仅解决了本身困难，而且游击区群众的需要也解决了。毛衣毛袜等，战士们已能全部自给。"

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吧？果真如此吗？请看晋察冀："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以第二分区第四区队为例。当春耕开始时，就派有专门的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这个小部队从二月至九月初，作了七十一次战斗，攻下了朱东社、上庄、野涯、凤家寨、崖头等据点，毙伤敌伪一百六十五名，俘伪军九十一名，缴了三挺轻机枪，一百零一支长短枪。""把军事动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配合起来，马上进行政治攻势：'谁要破坏大生产运动就打击谁。'代、崞等县城内敌人问老百姓：'为什么八路军近来这么厉害？'老百姓说：'因为你们破坏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伪军在下面

纷纷议论：‘人家搞大生产运动，可不要出去。’”

游击区人民群众是否也可以发动生产运动呢？那些地方，也许是还没有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农民是否也有兴趣去增加生产呢？这一点，晋察冀那边也肯定地答复了。“沟线外部队生产运动的开展，还给了当地群众以直接的帮助。一方面，用武力掩护了群众的生产；另一方面，又用劳力进行了普遍的帮助。有的部队，规定了农忙时期以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群众生产情绪因此大大提高，军民关系更为融洽，群众都有了饭吃。游击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同情和拥护，从此更增高一步。”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晋察冀边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沟线外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由于干部的思想转变，重视生产，重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培养了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初步总结中，有六十六个英雄模范），仅仅五个月中，我们沟线外的部队，不仅在生产任务上按时完成了计划，而且特别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新创造。”

一九四五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是中共中央所殷殷盼望于整个解放区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我们希望这一计划能够完成。

关于劳动英雄的讲话

（1945年1月）

劳动英雄三大作用

（一）带头作用，把生产和工作标准提高了，做出一个榜样，群众向你们看齐。（二）骨干作用，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们团结了群众，开展生产和各种工作。（三）劳动英雄是桥梁，起带上来、传下去的作用。群众的经验和意见，你们带上来；你们又到上面来开会，大会讨论的东西，如果你们认为对，就带回去告诉群众。

不要骄傲，改掉毛病

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就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在去年的劳动英雄大会上，曾经讲过“洗脸”和“扫地”，劳动英雄最好天天打扫灰尘，灰尘就是毛病，希望大家都注意改毛病，努力学习自己没有学到的东西，年年当劳动英雄。



1945年，毛泽东和劳动英雄杨步浩交谈。

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
致周恩来电

（1945年2月3日）

周：

（一）子卅两电及丑冬电均收。

（二）敌有准备攻滇样、高平、老开，已增兵一师团，似尚有后续；赣州、南雄可能失守。敌正扫荡沿海，使美军登陆时无法接济国民党。罗、邱、斯三人已在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

（三）请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万难参加政府的（此点是用口讲，不作任何文字声明）。至于会议名称、成分及方式，可以从长考虑。

（四）接电后，请即回延，有新意见待面谈。

毛泽东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2月3日）

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为着大局，可能还要忍耐一点。如何避免缴枪，要采取慎重步骤。但要注意前途是流血斗争，绝不能剥笋，无法剥笋，要反对右的危险。党派会议是预备会议性质，是圆桌会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国民党要先实行几条才能召开国事会议。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周恩来1月31日和2月2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党派会议问题的来电时讲话的一部分。

延安权威人士驳斥魏道明谎言*

（1945年2月4日）

魏氏关于租借物资分配的说法，乃是蓄意造谣，无耻撒谎。魏氏说“运交中央政府作抗日之用的租借供应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配给共产党，以便用于同一事业”，这实在是一个漫天大谎。除非在魏氏特有数学上，零等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否则这种说法是完全抹煞事实的无耻造谣。从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完全断绝了八路军的一切接济，非特没有分配给共产党以支枪、粒弹、颗药、分文，而且以数十万大军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解放区，没收了一切进入边区的物资，包括中国保卫大同盟向英美募捐来的数吨药品在内。此种情况，迄今仍未稍变。中国共产党与租借供应品的关系，仅仅是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反共军队确实是以“相当大的一部分”租借供应品武装着。因此，魏氏的话，应改为“运交中央政府作抗日之用的租借供应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配给反共产党的军队，用于另一用途”，才合乎事实。

至于魏氏所以要这么无耻撒谎，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美英舆论界以及政府负责人士对国共关系及对国民党政府如何使用租借物资，均表重大的关心。最近美副国务卿格鲁、英上院议长自治领大臣克兰波恩均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团结及“不管其有分歧，而帮助

中国政府及在延安之共产党政府”（克氏语）。国民党专制主义者惶急之余，遂不惜令驻外大使当众撒谎，说什么“国民政府已对共产党作了好多让步”，什么“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配给共产党”之类，其目的想欺弄国际视听，以利其继续保持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但是，国际舆论和外国政治家，是和国内人民一样，不会轻易被谎言所愚弄的。我们奉劝国民党当局多少珍重一些国格，勿使驻外使节永远被人目为骗子与说谎者。

复周恩来电[1]

（1945年2月5日）

狄巴斯[2]带来信件已悉，同意你的做法，但请注意：（一）对王世杰提案[3]不完全拒绝，只说可回延商讨；（二）不要强调国事会议；（三）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请于三四天内探明各方真意后回延。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狄巴斯，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

[3] 指王世杰提出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

挽彭雪枫联[1]

（1945年2月7日）

一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垂，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二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

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

[1] 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在河南夏邑与日伪军作战中牺牲。1945年2月7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彭雪枫大会。本文一是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联名送的挽联。毛泽东还写了挽词。本文二是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写的挽联。

为彭雪枫题写挽词[1]

（1945年2月7日）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1] 1945年2月7日，延安各界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举行追掉大会。这是毛泽东为彭雪枫题写的挽词。

给孙毅[1]的信

（1945年2月7日）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五[2]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天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

同志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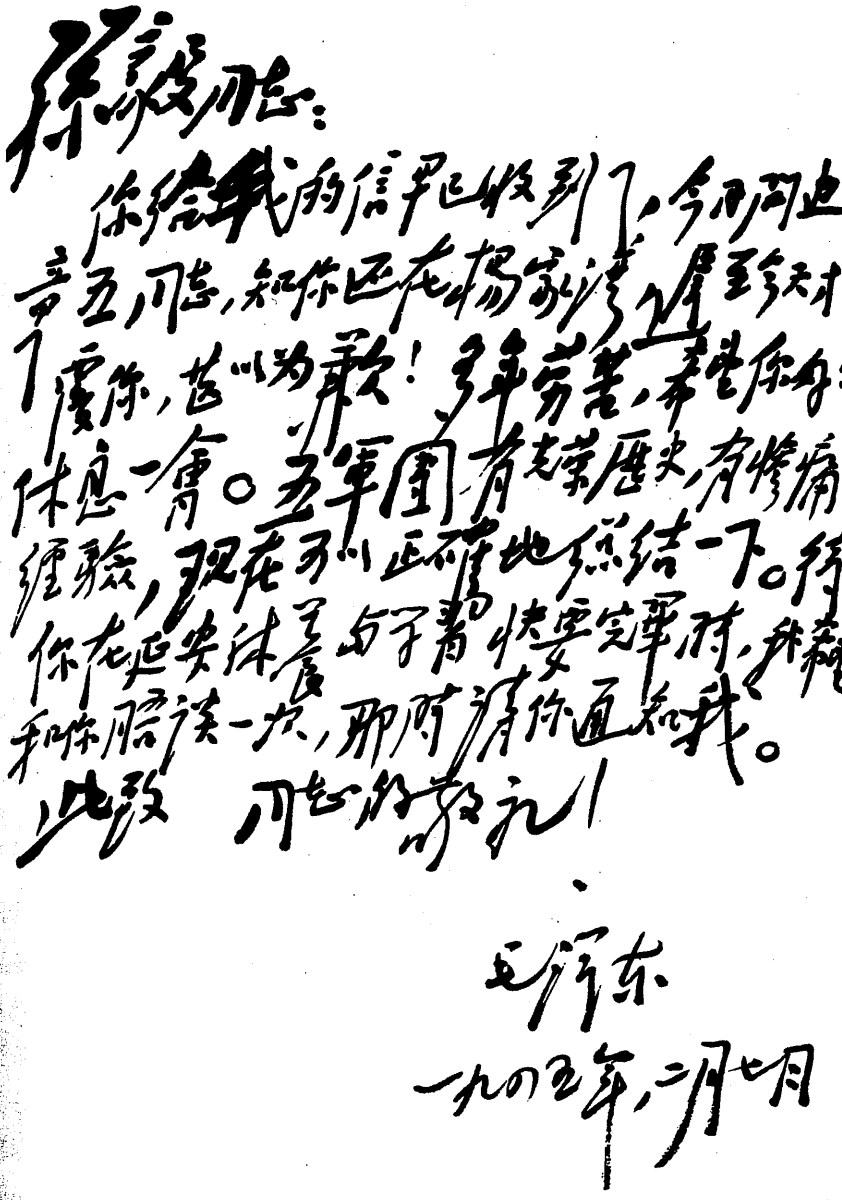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

[1] 孙毅（1904—2003），河北大城人。1931年12月参加宁都暴动。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2] 边章五（1900—1954），河北束鹿人。1931年12月参加宁都暴动。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共中央军委任局长。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同志亲自来访，知你已在杨家湾工厂参加了实际工作，甚以为慰！多年劳苦，希望你身体休息一个时期。为军国有益历史，有修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息时，可将你的经验写好，最快要完毕时，我和你商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

毛泽东致孙毅信的手稿。

坚决打击反动者，争取较好者[1]

（1945年2月11日）

坚决打击反动者，争取较好者。在打击时，先打一部，再打他部。在作战时，集中全力包围歼灭之。此种方针，在豫西已见效，豫中宜仿行之。此报转皮徐、王戴[2]参考。

军委

丑真

---

[1] 1945年2月7日中共河南区委副书记、八路军河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子久和八路军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韩钧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过黄河以来在豫西发展的情形。这是毛泽东转发刘韩的电报时写的一段批语。此件还转发给中共中央北方局。

[2] 皮徐、王戴，指皮定均、徐子荣，王树声、戴季英。194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以太行军区两个主力团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即第一支队），皮定均、徐子荣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45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2月底正式成立八路军河南军区，王树声、戴季英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巩固根据地[1]

（1945年2月11日）

上件[2]转给你们参阅。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加以兵力不够分配，胡宗南计划未必能充分实现。但我王戴、皮徐、刘韩[3]三部，在王戴统一指挥下应在豫西豫中两区，于最近数月内，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比较巩固之根据地，然后相机南进，打通五师联系，以防胡军之进攻。

军委

丑真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就转发胡宗南致蒋介石密电给新四军第五师、北方局、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八路军太岳军区等写的批语。

[2] 指1945年2月初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致蒋介石的密电。电报说：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向黄河南岸“窜扰”，再过两月豫、鲁、皖、冀将均非我有。建议“清剿”，提出：一、派新一军以两个师分两个纵队以伏牛山为根据地，向渑池、新安、洛阳、临汝、登封、鲁山、叶县、漯河跃进，另以周贵昌部编成六个纵队，向太行山、中条山前进以为策应。二、在灵宝、郑州等11个地方各设战地学校一所，收容高中以上学生，训练两个月，分配各地区，秘密使用，组织民众。三、大量发展河南地方团队，以团队阻止“奸军”发展。

[3] 王戴，即王树声、戴季英。皮徐，即皮定均、徐子荣。刘韩，指刘子久、韩钧，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和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电[1]

（1945年2月11日）

豫中局面尚未广大打开，王树声、戴季英进到豫南尚需时日，五师在豫南部队应维持现状。为加强河南，已令太行再出一部（两千人）渡河南下。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5年2月11日）

断然拒绝赫尔利[2]，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民主同盟宣言》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意所在。今日美新闻处广播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2月11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月10日同赫尔利、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情况。会谈中，周恩来强调在召开党派会议之前，国民党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四条主张。赫尔利敷衍其事，提出发表由他和宋子文起草、有利于国民党的共同声明，当场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后赫尔利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提出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点，以明真相。

给秦邦宪[1]的信

（1945年2月12日）

博古同志：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2]，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3]及路家口村新闻[4]，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民主同盟宣言》[5]请予发表，广播。当《新华》[6]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

---

[1] 秦邦宪（1907—1946），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

[2] 张平凯，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部部长。他写的这篇文章载于1945年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

[3] 这篇社论载于1945年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

[4] 指《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一文，载于1945年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三版。

[5] 《民主同盟宣言》，指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15日的对时局宣言。宣言向国民党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废除法西斯特务机关、立即停止党化教育等十项要求（即信中所说的“十项主张”）。

[6] 《新华》即重庆《新华日报》。该报1945年1月26日全文发表了《民主同盟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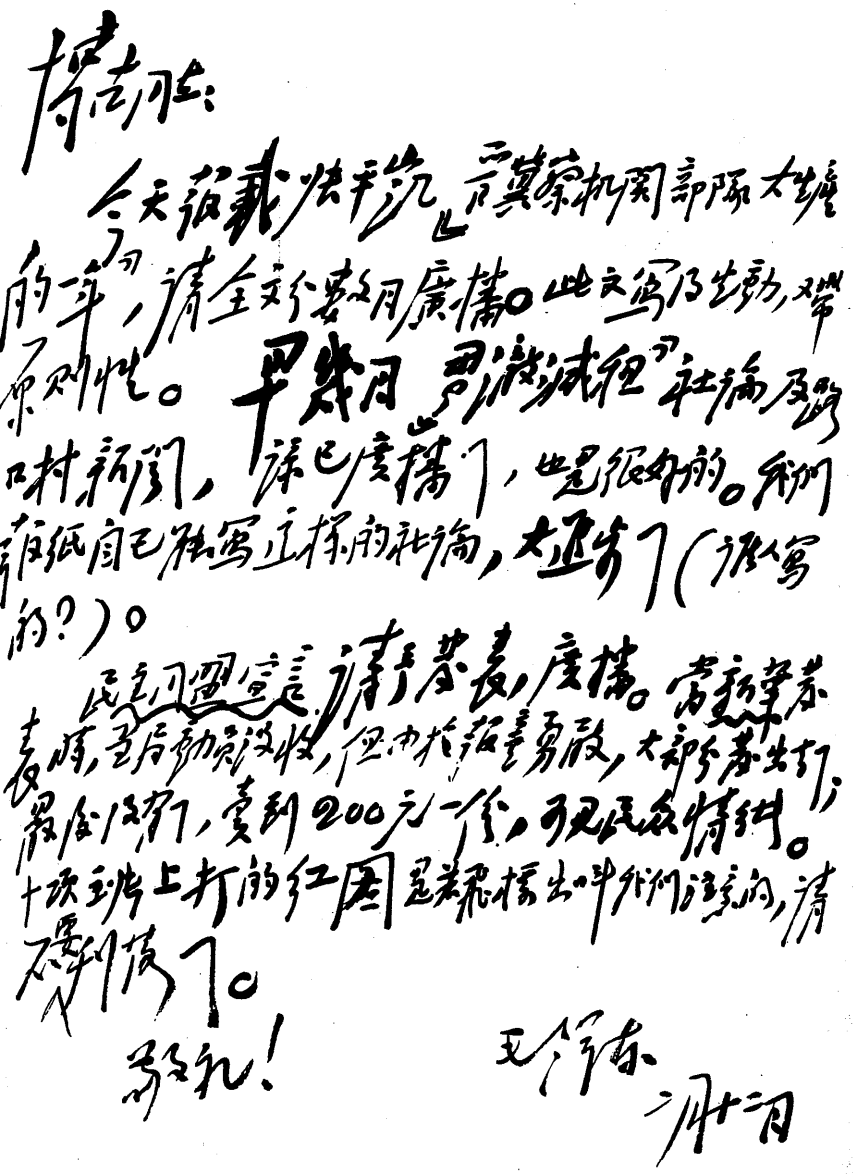
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十项主张上打的红圈是若飞[1]标出叫我们注意的，请不要刊落了。

敬礼！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1] 若飞，即王若飞（1886—1945），贵州安顺人。当时是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毛泽东致秦邦宪信的手稿。

接见中共中央军委通讯局春节拜年同志的谈话[1]

（1945年2月13日）

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了你！"

这个错误的责任在哪个领导，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在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鞠躬礼。）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怎么办呢？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的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拜年的同志不约而同地说："请主席复帽。"）

我们在整风审干中，得到了两条经验，一条经验就是取得了成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中共中央军委通讯局春节拜年同志时关于抢救失误者运动的谈话的一部分。

绩，另一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坚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对所有错戴帽子的同志，都要向他们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采取这种态度。

对延安地区拜年团的讲话[1]

（1945年2月14日）

去年一年当中，靠大家努力，做出不少成绩。今年大家要更加团结，要多生产粮食，要多纺纱织布，要讲卫生。

[1] 农历正月初二，延安市西区群众、警备团、枣园机关的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200余人，齐聚在俱乐部，给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拜年。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感谢。这是毛泽东对拜年团讲话的一部分。

时局问题及其他[1]

（1945年2月15日）

同志们：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五部、六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五部、六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一　时局问题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

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三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末，三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1]，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八十个师，苏联出了二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

[1] 指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并发表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英、美两国人民比过去也不同了，现在觉悟起来了。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那个时候的政府——北洋政府，就参加了战争。那个时候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怎么样？比现在就差得多，英、美两国人民的觉悟，欧洲人民的觉悟，中国人民的觉悟都是如此。那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反动的战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反对那一次战争，而第二国际领导下的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却拥护参加那次战争的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怎么样，应当说觉悟程度很低。无产阶级尚且如此，其他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中国那时候怎么样呢？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十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同志们，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诞生，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万党员。从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中国起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二十四年的变化，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二千四百年，甚至超过了三千年、四千年。现在，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我看这是很好的。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到。由于这个原

因，英、美的人民觉悟了，欧洲人民觉悟了，我们东方中国人民也觉悟起来了。因为人民一致要求打倒法西斯，结果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打倒法西斯的政策。那一班反动派，英国、美国、中国都有，他们反对联合苏联，但是广大人民不赞成，他们就没有办法。比如美国的选举，孤立派就吃了亏，因为孤立派分子反对同苏联合作，美国工人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倒下来了。同样，我们中国人民的觉悟使得蒋介石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不能得逞。比如前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国民党宣传要解散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国际都解散了，你们为什么不解散？又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老百姓的态度怎么样呢？没有一个拍掌的，延安的群众开大会，发通电进行声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是这样打平下去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三个国家团结，三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打日本要打到哪一年终止呢？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美国把菲律宾占领了，会不会在中国海岸登陆？日本是不是在几个月之后就会倒？看样子几个月它还不会倒，因为日本法西斯手里现在还有东西，它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钱慢慢打，它就是这么一个计策。

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要靠我们把它打出去，要靠我们党校的同志们毕业之后到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根据地坚持工作，把它打出去。我们现在小米不足，步枪不足，机关枪也不足，军队还不够，根据地还不大，我们还要增加小米、大米，增加步枪、机关枪，增加军队，扩大解放区。同志们都要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世

界上的东西，你不去搬它，它就不动。比如这张桌子，我不搬它，它不走，这把茶壶我不拿它，它不起来。日本人也是这样，要我们“请”他走，他才走的。现在我们的军队发展了，我们的解放区也扩大得很快，生产运动在各个根据地也都发展了，但是还不够，城市工作尤其不够。正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小，日本人他才不走，所以我们要准备力量。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做“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把杨虎城放出来吧！把叶挺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做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

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四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八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同志们，赶走日本侵略者，要靠我们在座的同志，靠我们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工作的同志们，靠中国人民多搞小米、大米，多搞步枪、机关枪，多搞军队，扩大解放区，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游击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民主运动。做这些事就靠得住，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英、美、苏三国的团结等，都只是条件。

时局问题就讲这些。

二　山头主义问题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党是由很多部分结合起来的。所谓山头，这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中国这个社会，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因为受压迫就要革命。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家，交通很不方便。内战时期，党以及革命队伍被敌人割开了，分为一个白区、一个苏区。白区有这个省那个省，苏区有这个苏区那个苏区，时间很长，达十年之久。抗战时期也是这样，时间很长，有八年之久，也是这个根据地那个根据地。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方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党校，内战时期没有办过。现在西北、华

北、华中、华南、东北，全国各处大概都有在我们这里学习的。但是，我们的根据地还是被敌人分割的，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需要我们开办党校来分析，来讲清楚。但是，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而各个部分检讨历史，要在一个前提下，就是指导思想必须是正确的，这样检讨才会有益处，才会有益无害。

什么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呢？我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讨论。

首先是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一百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是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

难过，这是正常的。现在中央有决议案，提倡大家讲话，无论是什么时候，你们凡是看到工作中间有缺点，有毛病，你们就讲。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确的东西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使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已经被客观事实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解释，就要批评。认识了的真理就一定要坚持，如果不坚持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把共产党打烂，革命就会失败。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体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错误，这就是在人民斗争中间不适合的，在斗争中间讲的话不对的，做的事跌了跤子的，写的决议案或者全部不对或者部分不对的。错误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没有理由保持下来。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的，话讲错了，事做错了，决议案写错了，就应该修正。如决议案有十条，九条不错，一条错了，那错的一条就要修改，这叫做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要采取这种态度？要的。一个共产党员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在党校学习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这就叫做公道。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这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比如对的和不对的，不承认这一条，就是不承认辩证法。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不能分析的，那他就没有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准备。许多同志因为没有这种准备，毫无主动性，经常是被动的。我

们要提倡主动性，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办好事。我们党校就提倡这一条。党校出去的同志，都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哪里就跟哪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自己看不到的缺点、错误还很多，那就要准备请人家讲。缺点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则说之，无则不说；讲对了很好，讲出了真理；讲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

同志们！我们奋斗了二十四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是有可能胜利。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有一百多万党员，这就是要胜利的条件。从客观条件（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来说，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还要有主观的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内战时期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这两个时期留下了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人。第一个时期留下的人很少了，是不是还有一两千人，要调查一下。人虽然很少，但这是一堆宝贝，一不是金，二不是银，比金银还贵重。第二个时期的人便多一些了，有多少呢？现在还保存下来的党

员有两万左右。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两万人多一点，这一批人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是哪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种子就是那两万多人。前两个时期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也做了不正确的事，叫做跌跤子。我们把内战时期的历史检讨了一下，有些同志还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1]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你们各部分开会，检讨历史，大革命时期也好，内战时期也好，抗战时期也好，那部分也好，这部分也好，第一个出发点就是团结。讲团结那就一团和气吧，开会喊一声“团结”，再喊一声“团结”，不就完了吗？照辩证法办事就还没有完，要分析，要批评，要搞清问题，分清是非轻重。讲团结就要加上分析，并且是精密的分析，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反复地看，思想酝酿成熟。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一个岂不好吗？这很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长两个耳朵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一个耳朵听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那一面。团结加上分析，对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不对的；或者全部是不对的。分清是非，然后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团结。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如果不谨慎，头一步走得就不对，就不是为了团结，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评工作也不很妥当，那末，落下去的地方就必然是不团结。这种情况，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了解这些历史很有好处，它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觉悟了，盲目性逐渐减少了、去掉了。我们有了现在这样一套正确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准备在中国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和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呢？会要达到胜利的。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

在山头主义问题上，各位同志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们毕业以后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估计到各种情况。王震[1]同志率部南下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又是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讲光明就讲光明嘛，又讲什么困难？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

[1] 1944年11月上旬，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王震任司令员。

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1]、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不然三五个月后，你们毕业时就要长叹一声说：“早晓得是这样的延安，老子就不来了！”果然，后来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没有听到我讲这些话，或者没有听进去。以后开了文艺座谈会，这个问题讲通了。那末，怎样看延安，怎样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呢？照辩证法的方法，从整体出发。陕甘宁边区是什么地方？边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之一也。之二晋西北，之三五台山，之四太行山，之五……，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华中、华南，都有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这样的定义对不对？当然对。在这样的定义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何一个根据地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是万岁！就是一个万岁吗？万岁之外，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任何一个根据地还有它的缺点。陕甘宁边区十年之后

[1] 绥远，即绥远省，1954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还会有缺点，就是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里还会有缺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二十多年了，三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红军相当强大，打仗的时候希特勒都怕得很，但是他们还出了戈尔洛夫[1]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准备。你们出发到各地去，到每一个地方要喊万岁，九千岁都不行，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做的是艰苦奋斗的英雄事业。但是同时，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准备那里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人多了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小米、大米没有那样多。还有，那里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只晓得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有说一声“团长同志请坐呀”，不很尊重，也没有开欢迎大会，让你坐冷板凳，或者你小有缺点人家话就来了。这样，你心里就容易产生一个东西，叫做气。所以同志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有多少封锁线，有敌人袭击，不开欢迎会，开了欢迎会掌声不够，稀稀拉拉的几个巴掌。要讲这些丧气话，但是不是只讲丧气话？不是。我讲的头一条，就是壮气话，没有专讲丧气话。但是如果只讲壮气话，只讲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实上有缺点，有困难，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随意开支票。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每一个地方都有缺点、困难，我们要事先估计到那里的缺点、那里的困难。到一个地方不要去批评人家，要采取学习的态度，在那里落下来，工作搞熟了，那里的人了解你了，然后再讲有什么缺点，这样人家就能听进去了，人家就会赞成，也会改的。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采取谦虚的态度。现在各个部分开会，领导骨干要经常商量，指导要恰

[1] 戈尔洛夫，是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在话剧《前线》中塑造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个前线总指挥，他脱离实际，不肯学习新知识，又好摆老资格。

当，作风要好。这一点很重要。指导恰当，运动就能胜利，会就可以开好；指导不恰当，会就开不好。

三　审查干部问题

上次我在这里讲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

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

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

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我要讲的主要问题讲完了。

上次我在这里讲到各部分革命团体，讲到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每一方面军里头又有各个部分，其中讲得不完全，还有一个十五军团讲漏了。在我报告以后，有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十五军团从前有过很大的牺牲，应该讲到它。今天我想补充讲讲那天没有提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

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三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磨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1]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

[1]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正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1]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2]，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

---

[1] 戴季英（1907—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44年10月被任命为八路军河南军区政治委员，同司令员王树声从陕北率两个团及大批干部进入河南，建立河南人民抗日军。

[2]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6月被捕，1935年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等职。薄一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原地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被捕，1936年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政治委员、中共太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等职。

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十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1]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2]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十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开办和组织一些伪装进步的报社、书店及文化团体，甚至组织假共产党，诱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迫其自首，再让他们加入或留在共产党组织内部充当内奸，同时又派遣干探，以“左”的面目混入共产党机关内潜伏，伺机破坏。国民党的这种反共策略被称为“红旗政策”。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出现过对这方面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反“红旗政策”扩大化的现象。

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三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百分之百，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这三个问题，因为上次没有讲今天补充一下，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这些，完了。

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1]

（1945年2月17日）

【新华社延安十七日电】一月二十四日由延安飞赴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留了三个星期，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举行了多次商谈。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恩来同志乃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飞返延安。谈判内容，恩来同志于十五日发表之声明内有明确之叙述，此声明登载于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并将译文交付外国报纸驻重庆之记者。该声明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为他只说了在国共谈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谓让步，而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第一，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其所领导的一切军队移交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即是说，移交于国民党领导，因为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第二，在谈判中，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不能结束。由于有这两个条件或前提，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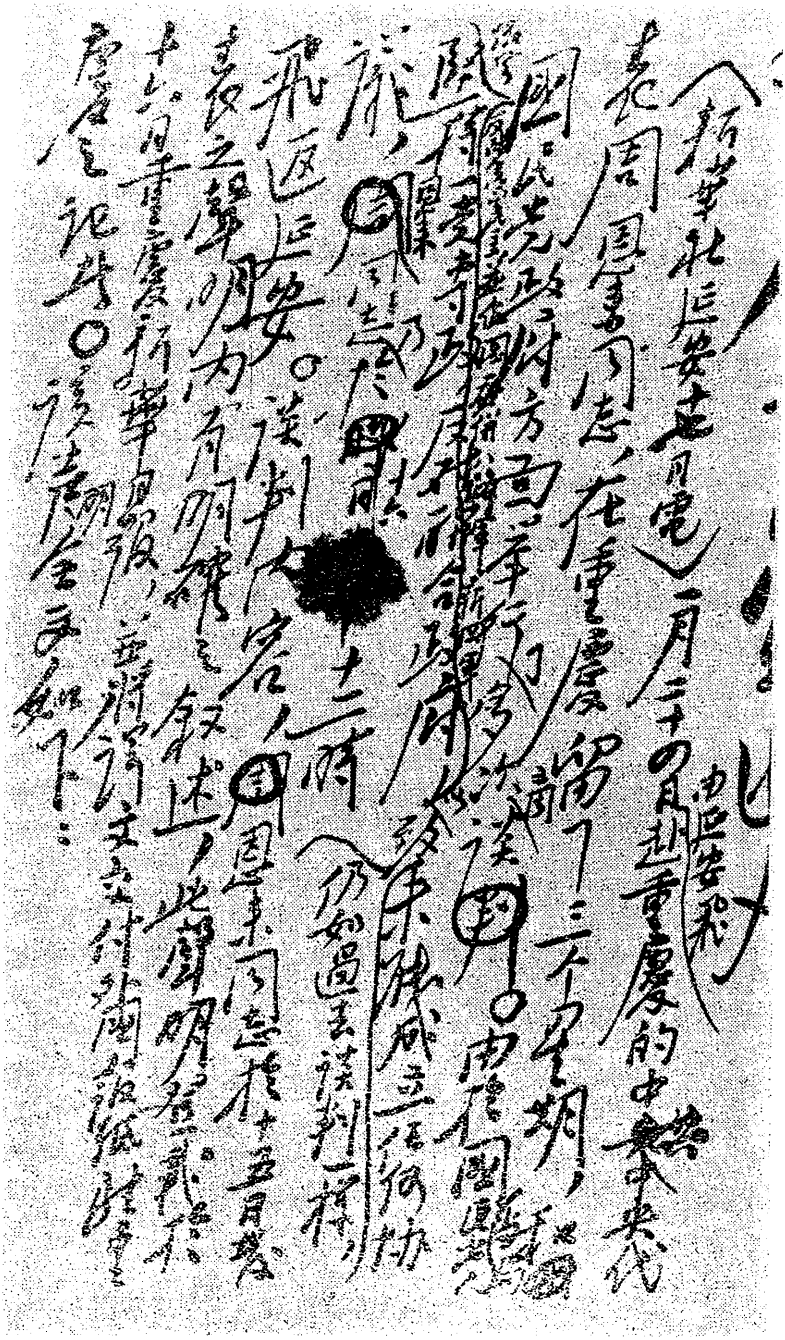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编辑的消息，导语部分是毛泽东写的。

所谓的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战的力量。具体说来，第一，不把军队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便没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从来就不开会，也没有任何权力。第三，在党治下的行政院内设置所谓战时内阁，并无最后决定政策之权。第四，不取消党治和不改变排除异己的军事政策，三人委员会改编中共军队仍等于将中共军队移交于国民党政府。而且照打敌人的成绩看来，应该改编的不是中共军队，而是国民党军队。说明了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为什么拒绝了国民政府整个的提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拒绝了我们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以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议。我们又曾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后，好实现联合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的答案是一种咨询性质的会议，而会议中预定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因此，我必须回延向我党中央报告。至于我们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退一切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等项，政府当局并未接受。这就是数月来两党谈判的主要内容。数月来两党谈判承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热忱相助，不断努力，吾人在此表示感谢。

以下是外国记者对于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二月十四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明的记录译文，可供参考：

半个月以来，政府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曾与共产党代表周恩

来先生在重庆会谈。政府方面曾提出若干重要的让步，下列各项亦在其内：（一）承认共产党为合法的政党；（二）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容纳共产党高级人员；（三）为构成一种战时的内阁起见，在行政院内容纳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代表；（四）组织一个三个人的联合委员会，以考虑改组共产军及他们给养的问题——在该委员会内，政府及共产党代表有同等地位而可能由美军官任主席。但共产党觉得这些提议并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他们拒绝了。共产党提出召开一个各党派的会议。政府之所以允许再次召开一个国共代表及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领袖会议，以考虑国民大会以前关于政治及军事团结的过渡办法，就是接受这个提议的一般的意见。周先生已带了这个提议返延，征求他的党的意见，至于结果如何，则非我所能预料了。过去数月中，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对两党谈判，努力相助，吾人表示感谢。



毛泽东为新华社消息《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写的导语的手稿。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2月18日）

自去年九月以来，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特别是这一次，因为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国民党军队现在情况与以前不同了，不但杂牌军而且中央军也开始变化了。谈判的方针我看是对的，赫尔利来时我们开了中央会议，现在还是那五条方针。国民党和赫尔利都是要我们廉价或无代价下水，我们抵制了这些东西，现在又要套我们的军队，我们也抵制了。我们提出八条和党派会议，这是有原则的妥协，“左”一点、右一点（不妥协或无原则的妥协）都是危险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给萧三[1]的信

（1945年2月22日）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2]，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3]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

---

[1] 萧三（1896—1983），湖南湘乡人。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

[2] 指萧三在1945年2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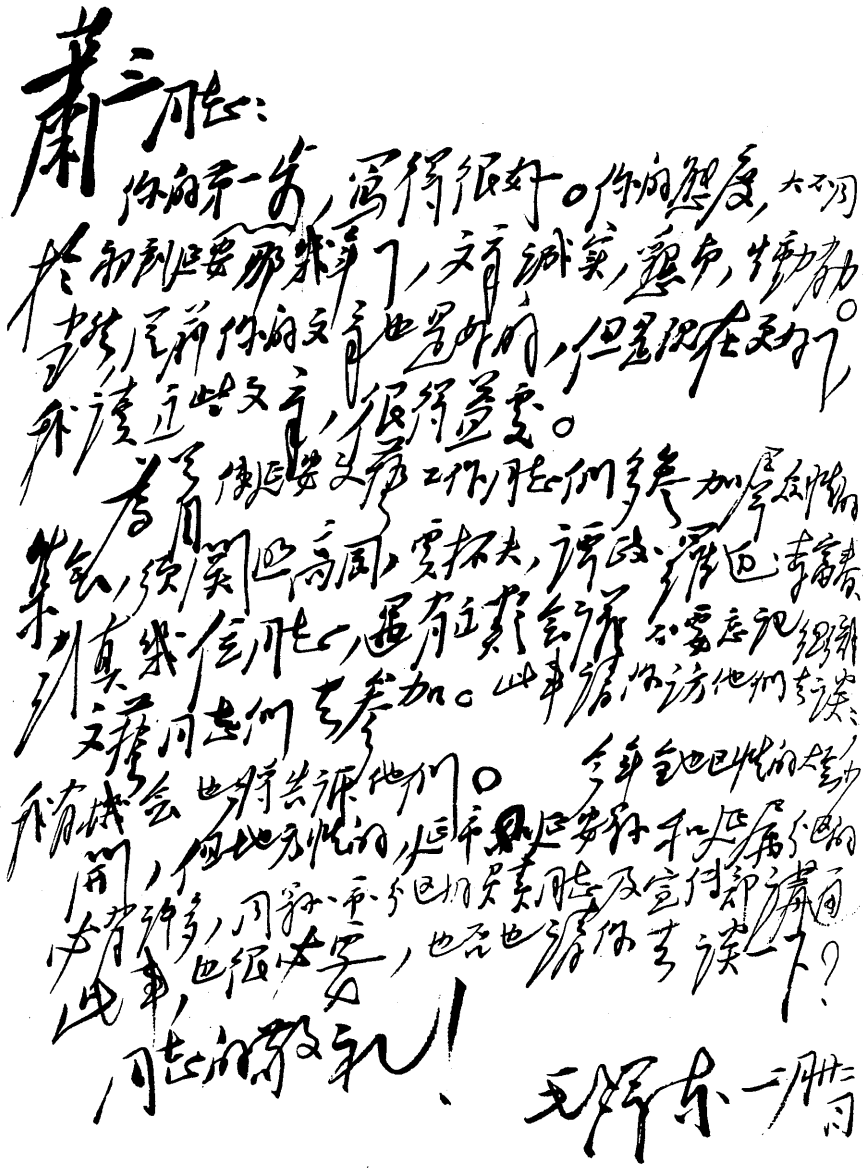
[3]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贾拓夫（1912—1967），陕西神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毛泽东致萧三信的手稿。

为苏联红军纪念日致斯大林元帅的贺电

（1945年2月22日）

斯大林元帅：

红军在你的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胜利，鼓舞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欣逢红军二十七周年纪念日，谨致祝贺之忱！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复河南区党委电[1]

（1945年3月1日）

华北各根据地因长期战争，连年旱灾，财政均感困难，你们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不要希望外援。但中央仍决定由华北各根据地共帮助你们伪联币一千万元作资本，嗣后即须全部自给。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河南区党委电的主要内容。

给王梓木[1]的信

（1945年3月2日）

梓木同志：

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么，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三月二日

[1] 王梓木（1895—1969），黑龙江木兰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被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重庆等地做统战工作。1945年2月回延安，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

在王若飞三日来电上批注的一些意见[1]

（1945年3月5日）

一

根本谈不到成熟。

二

王提议应拒绝。

三

看见了一方面利益，但马上出去，政治上不利。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目前逼蒋让步条件的批注；本篇二是关于王世杰的提议的批注；本篇三是关于来电所述周恩来再去重庆可以推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意见的批注；本篇四是关于下届国民参政会的批注。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注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

四

不争议席，听其委派，但均可参加。

电唁A·托尔斯泰之丧

（1945年3月6日）

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同志：

惊闻苏联著名作家，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不幸逝世，谨致哀唁。

毛泽东

三月六日

在王若飞六日来电上的批示[1]

（1945年3月7日）

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

[1] 这是毛泽东在王若飞6日关于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的来电上的批示。

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1]

（1945年3月8日）

【新华社延安八日电】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氏七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2]审议。"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博士据说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现在看来并未学通。所谓国民参政会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独夫蒋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吗？把所谓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交给这样一个机关去"审议"，"审议"的结果说可以召集，根据王博士的法律，难道就可以召集吗？国民参政会的大多数参政员，都是我们的独夫及我们的博士那一党的"同志"，开国民党大会去决定召集好了，何必要这个机关去"审议"？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2]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员占大多数。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日益反动，国民党反动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在参政员的成分中更增加，民主分子更减少，而且民主分子的言论更受束缚，该会就日益表现出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来粉饰独裁统治和制造反共舆论的单纯御用工具。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曾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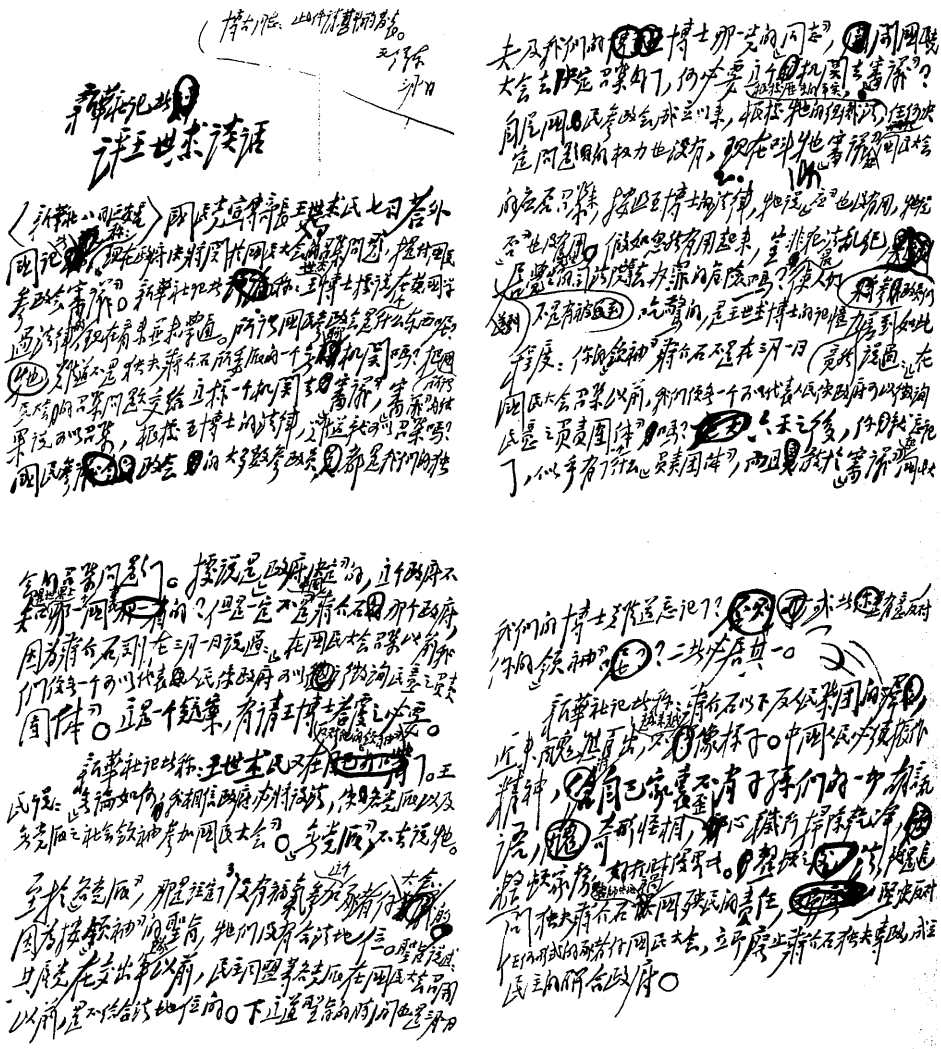
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参政员们不是有被居觉生先生[1]的司法院拿去办罪的危险吗？最使人们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记忆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三月一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吗？六天之后，你就忘记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负责团体”，而且敢于“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了。据说是“政府决定”的，这个政府不知是世界上哪一个国里的？但是一定不是中国蒋介石那个政府，因为蒋介石刚在三月一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这是一个疑案，有请王博士答复之必要。

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领袖”了。王氏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无党派”，不去说它。至于“各党派”，那是注定了没有福气参加这个猪仔大会的，因为按“领袖”的圣旨，它们没有合法地位。圣旨说过：共产党在交出军队以前，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不给合法地位的。下这道圣旨的时间也是三月一日，我们的博士难道忘记了？或者有意反对你的“领袖”？二者必居其一。

新华社记者称：蒋介石以下反人民集团的一群，近来丑态百出，越来越不像样子。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将自己家里不肖子孙们的一切胡言乱语，奇形怪相，歪心秽行扫除干净，整顿家务，

[1] 居觉生，即居正，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

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的手稿。

给王枚的信[1]

（1945年3月10日）

来信及代耕粮款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及援助。我不缺少物资，我决定把你送给我的三千五百元转送给你，作为我对你致谢的礼物，希望你接受。

[1] 这是毛泽东致王枚信的主要内容。王枚，当时在军委第二局菜园生产队任文化教员。

和谢伟思[1]的谈话

（1945年3月13日）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任何人的；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它不希望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它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

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

---

[1] 谢伟思（1909—1999），出生在中国四川成都。1938年到1941年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其后，到重庆美国驻华使馆任二等秘书。1944年7月，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政治顾问，参加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至1945年4月，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作过多次正式与非正式谈话，在半年中，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电讯、报告30余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主张。

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由于上述原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但是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

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的市场。

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1]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

[1] 华莱士（1888—1965），美国政治家。在罗斯福政府中1933年至1940年任农业部部长，1941年至1945年任副总统，1945年3月起任商务部部长。1944年曾访问延安。

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国外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

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像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可以预料，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破坏和解，因为在和解中他和支持他的集团必将被迫削弱权力，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但是他现在所选择的道路正直接导致内战和国民党的最后自取灭亡。

蒋介石拒不承认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还宣布打算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这都表现出他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这种大会完全是国民党的一种工具。无论邀请哪一位非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会议，都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在一九三六年由国民党组织挑选出来的。当时（一九三六年）在国共之间处于公开内战的时期，那是一次最虚伪的普选的骗局，那些代表不能代表在过去七年中同日本人进行战斗并在解放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他们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

由这伙傀儡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使他的政府成为合法的中国民主政府，那将成为一出丑剧。不能设想和期待这样一个政府会有任何作为。但直接的危险还在于这个国民大会将被蒋介石利用为要求中共承认其权威并交出自己的武装的一种手段。毋须赘言，在没有把敌人从中国的国土上赶出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敌战区人民是决

不会接受这些无理要求的。于是他们就会被蒋介石宣布为反叛，公开内战的帷幕就要拉开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最重要的朋友美国必须认识清楚蒋介石最近这个策略所具有的内在危险（决定在国民党一党基础上马上成立“立宪政府”），这就是我们目前对蒋介石开展强大宣传运动的原因。这场斗争关系重大，我们不得不克尽全力大声疾呼。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管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外，为数众多而且日益增加。他们之中包括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派系集团、小党派、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许多近代资本家。

但是他们不可能推翻国民党组织或改变国民党现在的反动领导，他们也无力控制蒋介石集团策划的新的“立宪政体”。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要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还得经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联合政府是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的唯一希望，它将在民主的基础上容纳和代表全国各派力量。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刻不容缓，因为这是目前统一全国各派力量，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唯一途径。

为什么在国家尚未从日本人那里收复失地，解放区人民尚无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之前，蒋介石现在就要决定推行“宪政”了呢？因为他知道人民是不会同意的。在欧洲，对于被占领各国已有规定，只有等全国解放，人民能决定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之后，才能确定政府的形式。这项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向同盟国的领导人推荐采用它。为什么中国是个例外呢？上海比雅典大，中国的敌占区相当于比希腊大得多的一个国家！

美国没有觉察到它对中国的影响及左右中国事态发展的能力。蒋介石依赖美国援助。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他可能早就垮台了，或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得到民众的支持，不得不改变他的政策。美国

不干涉中国内政？没有那么回事！你们在这儿，作为中国最大的盟国，你们的参与这一事实就事关重大。

美国的用意曾经是良好的。当赫尔利[1]大使来到延安并签署了五项基本协议的时候，我们是表示赞赏的。要不是他了解罗斯福总统具有同样想法，他是不会签字的。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毫无疑问，蒋介石的动机和伎俩是十分明显的。他提出“战时内阁”和“党派会议”的建议不解决任何根本分歧，因为它们是毫无权力的，它们在各方面都不及联合政府。蒋介石提议“改编共产党军队”并“将它们置于美国指挥之下”，这都是企图挑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以引起误解。像英国人在欧洲那样，我们是乐于接受美国的指挥的，但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蒋介石一直企图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为了取得外国消费物资，他布置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宣传骗局，这就是答应在今年通过召开一个伪国大，立即实现“民主”。我们不相信美国人会轻易上当。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当祖国的一半土地遭到分割或被敌人占领的时候，当国民党以

[1] 赫尔利（1883—1963），1944年11月至1945年11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外的一切政党都被视为非法的时候，不能召开国民大会。形势所要求的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挽救目前的时局。我们希望美国能发挥自己的影响促其实现。做不到这一点，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给任弼时的信[1]

（1945年3月24日）

弼时同志：

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

[1] 这是3月24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从头至尾修改一遍后，给任弼时写的一个短信。

给李富春的信[1]

（1945年3月29日）

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今日印五十本，留一本给我，四十九本由秦邦宪交你。今日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发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附白纸一张，请他们再写意见，于三十一日开会时带交。给陈绍禹、冈野进、王稼祥各发一本。

[1] 这是毛泽东致李富春信的主要内容。

对河南区党委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的复示[1]

（1945年3月30日）

[1] 这是毛泽东对《河南区党委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的指示》的复示。在报头上还批有“此报转发华中、湖北、王震”字样。3月11日，《河南区党委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的指示》中指出：一、近来国民党顽固派积极组织河南地方势力，动员河南国民党，组织反共反八路军，并公开勾结敌伪。其实际企图，是在河南组织反共统一战线，抵抗与进攻我们。我们的策略，应广泛与切实地在河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络一切可能联络的各种地方势力，团结各阶层人民，要力争中间阶层大部同我们联合或中立，应认识到河南社会势力中，中间阶层占大多数，河南社会也是两头小，中间大。二、我们打击的对象只是少数，对其余的采取不打，要中立它，联合它，与大部分地方势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三、国民党顽固派与河南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中间阶层与军阀、军僚、大地主之间，敌伪之间，河南基本群众与国民党统治势力之间，均有许多矛盾，我们应注意利用，实现争取群众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四、对国民党在河南地方党员，我们一般地采取合作与督促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执行我们的军令政令，但不能给他们以任何领导权，领导权要完全掌握在我们之手。五、对河南保甲政权，我们除一方面暂时利用外，一方面深入组织农民抗敌救国会，逐步地从农抗基础上改造乡村政权，组织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是我们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六、对乡村士绅，应注意好好团结他们，采取一区及一县为单位，组织参议会，争取士绅们为民主政权、地方行政服务。

河南区党委：

你们寅真电所述策略是正确的，望好好执行。

毛泽东

寅卅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窑洞春早》（中国画）

复王震、王首道电[1]

（1945年3月30日）

你们跳跃前进及留一营兵于鄂南设小后方之计划是很好的。你们究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或以郴州、宜章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待你们南进后看情形再定。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

入湘后可相机公开号召。

[1] 这是毛泽东复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建立湘北根据地然后南进[1]

（1945年3月31日）

王震、首道：

你们占领平江、崇城[2]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包括崇、通、平、浏、岳、湘、长、潭[3]），然后再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毛泽东

寅世

[1] 1944年，日军向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进攻，国民党军接连败退，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1945年3月，他们先后抵达崇阳、平江地区，并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这是毛泽东给王震、王首道的复电。

[2] 崇城，应为崇阳。

[3] 指湖北的崇阳、通城和湖南的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长沙、湘潭。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

（1945年3月31日）

一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蒋介石就是束缚群众，他在柳州会议[2]上讲所谓精神征服。我们对同志与人民是诚诚恳恳，无所谓精神征服，对敌人则是武力征服。我这个报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话还要少一些。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2] 指蒋介石1940年2月23日至25日在柳州召集的军事会议。

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1]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见很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采取了。

我们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是否“左”倾了？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2]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因为我们是不合法的，不像苏联，而蒋介石又非罗斯福、丘吉尔[3]。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

---

[1] 十二月会议，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否定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

[2] 斯坦因，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福尔曼（1898—1978），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重庆记者。1944年6月，他们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分别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3] 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丘吉尔（1874—1965），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1]之类。有的人看到三月一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2]回我们的电报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3]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4]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

---

[1] 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2] 赫尔利，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3] 爱金生，今译为阿特金森（1894—1984），美国《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1944年任重庆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同年9月、10月间曾到延安参观访问。高桂滋（1891—1959），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军长。

[4] 谢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作家。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他们参加了1945年2月22日发表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

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1]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领导问题我在报告中讲了一下，除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2]。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3]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

---

[1] 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2]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成长，“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3] 华盛顿（1732—1799），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第一任总统。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任大陆军总司令。1787年主持费城会议，制定联邦宪法。1789年当选总统。林肯（1809—1865），1861年至1865年任美国总统，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南北战争爆发后，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改变，以后还可以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如果大家同意报告的这些基本观点，则修改后即发给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

二

刚才几位同志提到大会的精神算不算旧账的问题。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扯到军事历史、华北历史、各个山头等等，更是扯不清楚。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没有说品质，没有说非法，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取了这个方针。

政治报告中关于军事方面有一点还要说明的，即共同建设人民的军队问题。抗战中我军内部情况已有很大变化，有一些军事首长不是共产党员。军队要全部是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即使内战时期红军中的党员也不过占三分之一。如果有的军队和我们合作，以后又不合作了，这时我们应该让他们走，留余地，不要伤感情，即使再变成敌人也不过同合作以前一样。同别的军队的外部合作，山东

做得很好，我们许多地方还是“左”了，需要耐心说服。

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不过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为了委曲求全，而这个政府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不在报告上写。还有，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故历史问题延至现在的七中全会解决才成熟，各地的历史问题现在就不必急于解决，因为不成熟。

关于布置接收第一架起义飞机致华中局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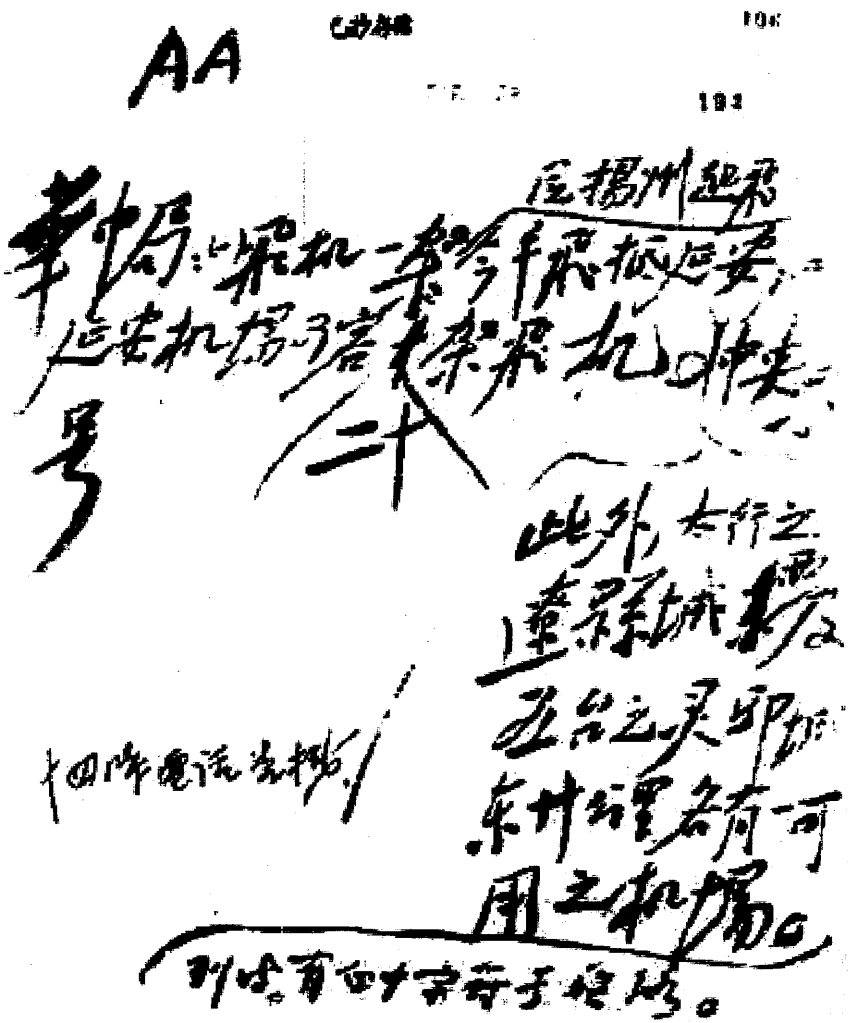
（1945年3月）

华中局：

（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廿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

中央

[1] 1945年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一些汪精卫伪政权旗下人员逐步认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才是中国的希望，开始想办法起义投诚，奔向光明。汪伪空军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就是其中两位。他们通过多方联系找到新四军苏浙军区，向司令员粟裕表达了起义的愿望。经过秘密商谈，周致和、黄哲夫计划于8月20日驾驶汪伪“国府专机班”专机“建国号”从江苏扬州飞抵延安起义。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的电报，要求华中局安排布置降落机场。周恩来在电文中加了一句：“到时，有白十字符号联络。”1945年8月20日，这架飞机飞抵延安。



毛泽东致华中局电的手稿。

和谢伟思的谈话[1]

（1945年4月4日）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1] 这是毛泽东在住处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谢伟思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的一部分。谢伟思于1945年4月4日离开延安，奉召回美国。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1945年4月9日）

郑、李、陈[1]：

寅寒郑电、卯冬三人电[2]，均悉。

（一）派兵困难，不要依靠。

（二）你们将重点移到路西[3]，向老河口方向发展是对的，兵力部署你们自己调剂。

（三）财经、民运干部，已令组织部考虑酌派。

（四）你们除食粮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一九四〇、四一、四二整整三年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情形比你们还要厉害，从四三年起就是依靠这一办法解决了问题。仅有人口一百五十万的边区，却养活了十万公家人而民不伤。五台、太行两

---

[1] 郑，指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少敏（1902—1977），山东寿光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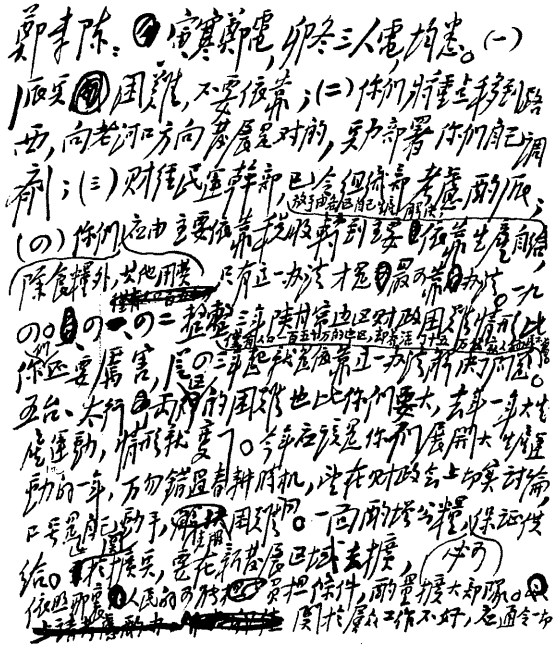
[2] 寅寒郑电，指郑位三1945年3月14日给中共中央并华中局的电报。卯冬三人电，指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1945年4月2日给中共中央并华中局的电报。

[3] 路西，指平汉路以西地区。

区的困难也比你们要大，去年一年大生产运动，情形就变了。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万勿错过春耕时机，望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一面酌增公粮，必可保证供给。关于扩兵，要在新发展区域去扩，依照那里人民的可能负担条件，酌量扩大部队。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游击战争特点所引起的方法，不知你们认为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办为盼。

毛泽东

卯佳



毛泽东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的手稿。

对《新华日报》五日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的批语

（1945年4月9日）

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

关于太岳四四年生产情况与四五年生产计划的报告给太岳区党委的复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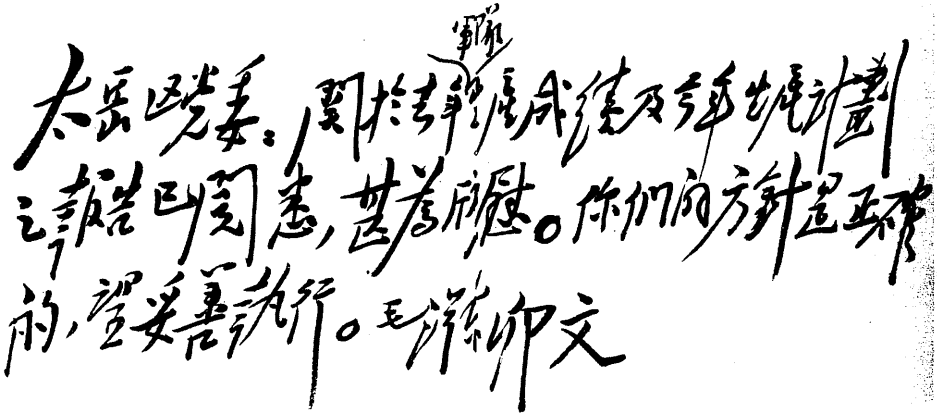
（1945年4月12日）

太岳区党委：

关于去年军队生产成绩及今年生产计划之报告已阅悉，甚为欣慰。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

毛泽东

卯文



毛泽东给太岳区党委的复示的手稿。

[1] 毛泽东在太岳区党委1945年4月8日的电报上写有“此报转发平原、山东、华中、湖北、河南”字样。

关于罗斯福逝世的唁电[1]

（1945年4月13日）

华盛顿杜鲁门总统：

罗斯福总统不幸逝世，我们谨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吾人之深切吊唁。举世均将深痛此种损失。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延安

[1] 这是毛泽东、朱德为吊唁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给继任总统杜鲁门的电文。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

（1945年4月20日）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〇年不许提路线[1]，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2]，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

---

[1] 在1940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比立三路线还大，使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根据地损失不止十分之九。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会议讨论中，有同志不同意提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毛泽东稍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只说在土地革命时期后期有“许多过左的政策”，这种过左政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提是路线错误。

[2]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对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毛泽东为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中，指出：“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1]，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2]，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3]。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

[1] 典出《史记·项羽本纪》。项庄是项羽的武将，沛公即刘邦。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占秦都咸阳后，派兵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军攻入，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叔父项伯调解，刘邦亲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项羽谋士范增以“助兴”为名命项庄舞剑，欲乘机刺杀刘邦。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体掩护刘邦。此时，刘邦谋士张良至军门告诉刘邦参乘樊哙：“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于是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刘邦才能乘隙脱身。

[2] 指王明1945年4月20日写给任弼时并转毛泽东及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同志的信。他在信中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

[3]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1]、“轻骑队”[2]、“西北风”[3]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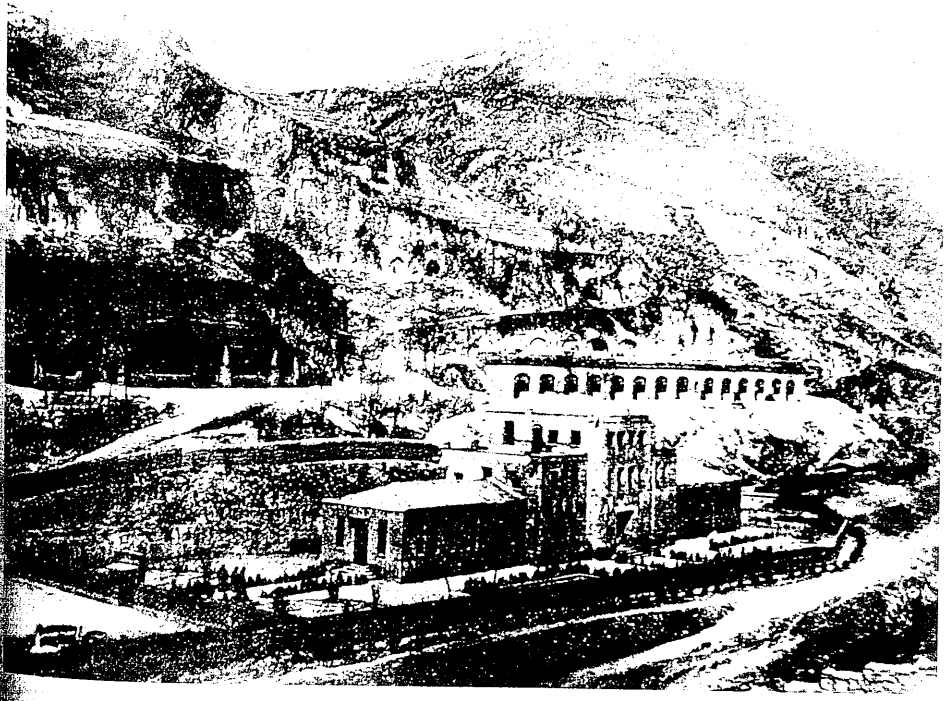
防止敌人利用，这一点也要说一下。人家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

[1]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他写的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分两次发表在1942年3月13日和23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2] “轻骑队”，是中共中央青委机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办的墙报。

[3] “西北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办的墙报。

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但是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图为会议旧址。



1945年，毛泽东和康生在延安杨家岭。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

（1945年4月21日）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不讲很远的历史，单讲比较近一点的历史，也有一百多年了。从一八四〇年和英国人打仗的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已经是一百零五年了。这一百多年中间，有很多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着资产阶级刚刚开始产生，或者稍微长大一点，或者后头更长大一点的时候，当着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先锋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还不高，但是资产阶级有各种优势，它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经验上都占优势，它有政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

党，有口号，有自己奋斗的目标。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它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只是近二十几年，无产阶级才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起来一次，被打下去，再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有八十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历史，据说有五十万年。[1]这五十万年之中，一段是野蛮史，一段是文明史。文明史只有五千年或者稍多一点。我们中国的历史算长得很，但也只有四千多年至五千年。从黄帝纪元算起到辛亥革命四千六百零九年，再加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四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四十三年。其实所谓黄帝那个时代，还不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从奴隶社会算起，在中国据现有的可靠资料，应从商、周算起。文明社会五千年来，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因此打起来。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在座的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就会知道，记得此事。这次战争，刚才讲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到那种程度，就要出这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这次

[1]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战争是破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损害人类利益的战争，是抢夺市场的战争，这是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中国就是一个。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来接着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这些都被打垮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分裂的，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觉悟也不够。胜利的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九一九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

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所以我说，同志们，你们很幸福。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了，还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1]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2]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

---

[1]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1916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1902年至1904年，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几次讲到过马克思。朱执信（1885—1920），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禺，同盟会会员，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者。1906年1月，他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内容，还提到《资本论》。

[2] 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连载了施仁荣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

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1]，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2]，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3]，一个是陈公博[4]。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

---

[1]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39年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这个报告中还说他“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

[2]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1945年4月，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3]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叛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4]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先后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等职。

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1]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二十四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四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叫做土地革命。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主要是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是国内战争，一九三七年至现在是八年抗日

[1] 参见《庄子·人间世》。

战争。现在的同志经历三个时期的不多，经历两个时期的那就很多。这是就我们全党讲。在座的代表中，这个统计还没有做，究竟是三朝元老多，还是两朝元老多，还是一朝的多，现在还不知道。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三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一九二五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座的林老[1]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2]，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3]。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

---

[1] 林老，指林伯渠。

[2] 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1923年10月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及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参加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后回国。

[3] 据道家说，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水浒传》中把梁山泊的前36名头领称为三十六天罡星。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36名委员。

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

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

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联共党史》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一九一七年就胜利了，三八年才由中央出版《联共党史》，经过二十年，可见此事不易。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这样。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

历史问题。

我再讲一讲治病救人。治病救人是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人本来是好人，但病菌进去了，得了病，就请医生看一看，吃点药，治好了。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但是，官长不能打士兵，这就是说，干部与党员要有正确的关系。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1]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

[1] 阿Q，鲁迅《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

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1]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2]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

---

[1] 罗明（1901—1987），广东大埔人。1933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曾因提出闽西上杭、永定等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2] 这里可能是指1927年3月至4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最早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个观点。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看这个趋势，农村将完全退缩到自足经济时代，除盐以外，农村将抵制一切商品进乡，同时又将尽量阻止农产品进城，如现在把谷米阻得天死地煞一样。”后来作者修正了这个观点。

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二十四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两个中国之命运[1]

（1945年4月23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2]；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3]。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现在的时机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的一部分是在西方，那里的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是苏联红军努力的结果。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大概在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2] 指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

[3] 指毛泽东准备在这次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

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多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条件，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完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论联合政府[1]

（1945年4月24日）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

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

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

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

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

团结。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

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

[1]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1936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

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

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

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

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

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1]，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

[1] 参见《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关于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

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统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比较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

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卢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卢沟桥，又从卢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

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的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

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1]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

[1] 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

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面，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

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

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

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

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

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

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

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

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1]；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2]，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

[1]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1932年8月，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联保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1934年11月7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决定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保甲制度。

[2] 这里是指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

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1]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

[1] 开罗会议是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并将侵占的中国领土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

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

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对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

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

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1]。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吗？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

[1] 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泽东的这句话是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最后撤退到四川山地。

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1]。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

[1] 参见《必须制裁反动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

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1]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

[1] 参见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6～297页）。

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

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哪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

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的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曰“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

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

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第七　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

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

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

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1]。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

[1] 这是指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的一种错误说法。

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十　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1]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

---

[1] 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8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联合发表的一个文件。莫斯科会议是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德黑兰会议是1943年11月至1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克里米亚会议是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南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当时所有这些国际会议都决定以联合的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

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1]。

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

---

[1] 1944年8月至10月，苏、美、英、中四国代表按照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草拟了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1945年4月至6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有5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时中国解放区派遣董必武为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

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无疑地，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有一种适合时宜的民主的改革。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

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

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

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地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执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

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

---

[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45年7月13日，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开会，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日本投降以后，因为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

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

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

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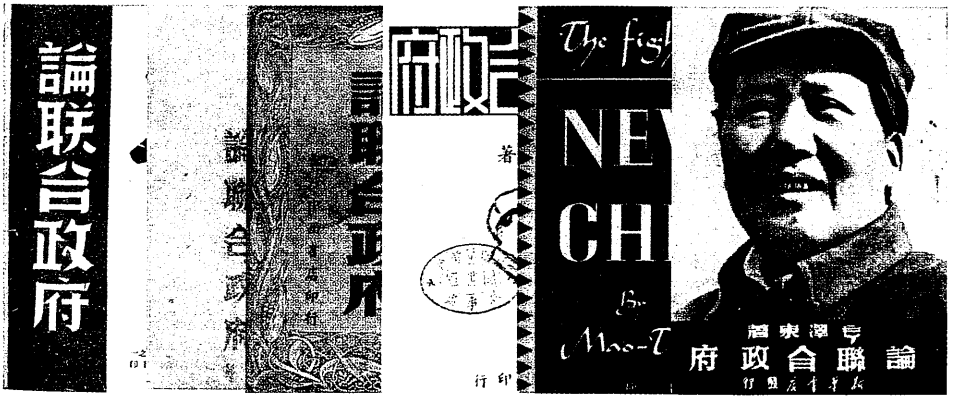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

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图为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论联合政府》（部分版本）。



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1949年3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论联合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

（1945年4月24日）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一　路线问题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

[1] 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时又在大会上作了这个口头政治报告。

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这样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呢？是的，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之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

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阶

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1]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

[1] 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代理主席。他于1945年3月18日发表声明，表示民盟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

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后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帮助组织国民党；最后在革命过程中组织了广大的农民协会，会员有几千万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昨天林老[1]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在中国，现在搞马克思主义，怎样搞法呢？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他又不要这个领导地位，那还领导什么呢？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地主说：共产党，你可不行！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城市人口。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

[1]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

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抗战一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那时候，中央认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可以打倒日本。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

主义者是假的。有些人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动摇，好像不要人民的战争也可以打败敌人。那他想依靠什么力量呢？比如，依靠国民党，甚至依靠国民党里面的顽固部分，认为依靠他们可以打败日本。但是过一个时期，他又觉得这样不行了。那时候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多，后来才多起来的。在我们党里头，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同志也相当多。我们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八月开了洛川会议，十一月在延安开了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中央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线被这些会议批准了、决定了。在这些会议上，中央不相信不发动人民战争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这一点，在决议案上是写了的，在文件上也写了的。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吗？依靠它能够胜利吗？我们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相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个早晨暂时地跑掉了。以后就要找一下，把马克思主义找回来。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我们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这样的提法曾经被人家驳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说这个提法是要领导权。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纲领，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纲领有力量，要在广大人民中，在农民中，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共产党这一套没有用处！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并广泛地宣传我们的主张，说："农民们！小资产者们！各位同胞！你们要知道：只有自己

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制度，把它改造成为有民主，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团体的，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即使借外国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国还是黑暗的！”我们的宣传员就是要讲这样一些话。对于非共产党员，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向他们宣传：“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军队，组织人民的政党，组织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来，它就不起来，怎么办？那就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要改造它，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并且国民党内部要发生分化，但是没有来得及。进步势力没有发展得那样大，中间势力也没有来得及争取，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结果改造就落空了。这样我们蚀本了没有？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老百姓听了我们这个话以后，会觉得共产党的话有道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1]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

[1] 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1947年6月并入国民党。

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同志们,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方针呢?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上,我们纠正了上面所讲的这类错误思想,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它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就是这类错误思想的一个标准的口号。这样的东西是错误的。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

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从此以后，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无数次的进攻，并且逐渐展开了攻势，比如像去年开始的攻势，今年就更大了。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

防御为辅，这是对日本而言。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将国民党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了呢？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国民党也请了一个教员，跟我们是同一个教员，叫冈村宁次[1]，他从前住在北平，现在住到委员长附近去了。这个教员一教，国民党的影响就低落了，势力就缩小了。现在国民党的影响还有没有呢？还相当大。国民党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历史。要我们的影响去，他们的影响才会走；我们的影响不去，他们的影响就不走。所以说，国民党的影响是低落，而不是没有，势力缩小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

---

[1] 冈村宁次（1884—1966），当时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1]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现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还有若干同志不相信这一条路线。那末，是不是现在都觉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样彻底了呢？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了呢？我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万岁的，有九千岁的，有八千岁的……。就是从我们党员来讲，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最近华北、华中开了很多座谈会，反映出来不但在党外人士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而且在党员中间也有些人，对于我们这样一条路线，是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说，在我们广大党员中，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别很大，我看是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有，虽然万岁也有。

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比如我们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参

---

[1] 参见鲁迅《故乡》，原文是："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页）

加旧金山会议[1]，国民党开始不肯，但结果我们还不是去了？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2]已经到了华盛顿。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3]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4]，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

---

[1] 旧金山会议，指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等文件。

[2] 指董必武。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3]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4]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1937年9月1日，他在《申报》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

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关于这一部分，最后我讲几句，结束一下。

第一，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抱什么态度？八年以来也好，二十四年以来也好，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非常欢迎像我刚才所讲的政策。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第二，小资产阶级怎么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第三，自由资产阶级怎么样？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又比如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们是抱中立态度。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他们在两边劝架，给这边说不要这样，给那边说不要那

[1]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样。最明显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出吧"。这是自由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这样的事，多得很，现在时间有限，一下子说不完。总之，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能够使自由资产阶级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

第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怎么样？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是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他们是国内抗日战线中的反动派。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1]一样。昨天报纸上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篇文章[2]，同志们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号是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成立联合政府，在下次大选当中用选举来推翻丘吉尔。他说的"推翻"在我们中国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的特点和外国不同，在我们这里，"推翻"就是要争取领导权，过去我们曾经"推"过一次，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

[1] 丘吉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2] 指1945年4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的文章《论英国大选》。

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1]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最后，讲到外国。外国怎样呢？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其他外国，几个大国，同盟国[2]，也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为什么《解放日报》上没有登这个话呢？没有登不是永远不登，并不是否定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报告中提醒了这个意思。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现在的世界面目已完全变化了，这一方面在我的报告中写得很多，很充分。关于黑暗的一面，我写得很少。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

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叫形势与路线。

---

[1] 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二　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第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1]，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2]，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党发布过很多对时局宣言，都是具体的纲领。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

---

[1] 指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为抗战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

[2] 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写具体纲领的时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

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1]，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在后头，我还要讲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就是这个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

---

[1]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为什么不强调呢？如果要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因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从前我在井冈山打土豪时，曾到一个土豪家里去看有没有书，一个老妈妈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找东西，她说："昨天已经共了产，东西都共掉了，现在没有东西可共了。"我们的农民同志很多都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他，这就叫共产主义。这当然不对。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然而它也不过是第三而已。再有还可以叫保守党。但是，一

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美国的新闻记者福尔曼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的报导》。还有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翻译为《西行漫记》。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们还总是把红账挂在你的身上。所以并不在乎名称。国民党这名称总算好吧，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那样不喜欢国民党呢？从前有许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个坏的名字叫猫，叫狗。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1]，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的。有一个新闻记者叫爱金生，多少带点自由主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称我们为“温和的民主集中制”，可见我们并不那样“红”。资产阶级的代表都那样讲，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民党。对国民党我们尖锐地批评它，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他们有一点好处，我们也要给他们挂在账上。可惜国民党的好处不多，虽然想挂，却是很难，只能挂几笔，而且还拖了一个尾巴，要委员长洗去脸上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我们说过打倒委员长没有呢？没有。在我的报告里，就连一个委员长也没有提。这位委员长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中国之命运》，本来应当提一提，但还是没有提，这实在是可惜。我的报告里提到的，去世的人

[1] 王镇恶（373—418），东晋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刘裕部将。在辅佐刘裕之子镇守关中期间，因与中兵参军沈田子不和，为沈所杀。

有孙中山，现在又加上一个罗斯福[1]，活着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为妙。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了，他有几次要挑动我们去犯这样的错误，挑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要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

[1] 罗斯福，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1945年4月12日病逝。

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1]，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这个方针，就会犯错误。麻烦是很多的，我们和国民党的麻烦更多得很。

第六个问题，关于改造旧军队。改造旧军官，利用旧军官，这里有思想问题，要在我们全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军队多得很，这中间有很多的军官需要改造，不能个别地对付，要有整个的政策。

---

[1] 参见《列子·汤问》。

除彻底的反动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不相信旧军官能改造，认为旧军官不好搞，旧军官没有马列主义，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许多旧军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饭吃、找出路的，到我们这里才有出路，我们不怕他们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两种，一种是公开造反，一种是秘密造反，搞特务。公开造反我们有准备，而且公开造反已造了好多年，并未造出结果来。秘密搞特务我们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严肃性、警惕性。另一个就是走人，如果他带了枪走，我们并不蚀本，因为枪支是他带来的又带走了。你要走，送你几块法币，开个欢送会，并且告诉他将来要来还可以来，这就叫做政治。对比较进步的军队，要适当地帮助，从前我们对这些军队也有过帮助。有两种极端思想，一种是对旧军队一个都不要，不信任还要缴枪，这是不好的。另外一种是对比较进步的军队，什么东西都送给他，这叫帮倒忙，也是不好的。我们改造旧军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七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不像国民党的军队那样人人都要入党，我们也讲过党军，但这是指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求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历来我们军队中的党员最多只有一半，经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党员是占少数的。在军队里，少数共产党员应该跟多数的党外人士合作，所谓“人士”就是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

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个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些人听说无产阶级领导他，他就不高兴。有些人却偏要喊你要归我领导，如果你不归我领导那就不正确，路线就发生问题。这种神气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欢迎。在这里，我们要讲清领导的性质。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而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们一开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第八个问题，扩大解放区。在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但是我们要注意防御敌人的进攻，敌人进攻我们就粉碎它，我们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

在抗战初期，是进攻的，到处发展。在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缩小，以防御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发展。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我们规定了这样两条：第一条是进攻，第二条是防御。不要因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损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就怕。根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我们的任务需要发展攻势，扩大解放区，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个团）和小的兵力（武工队），到敌后之敌后举行攻势。因为日寇的情况变化了，它的兵力疲惫，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地方扩大了。我们和敌人两方面的情况都变化了，世界的情况也变化了，柏林快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相当的兵力，在可能条件下，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举行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各地作的关于一九四五年任务的计划，第一条就是进攻，第二条就是防御。这不是冒险主义，因为我们讲是在可能条件下，不是讲在没有可能的条件下去进攻，而且还讲了敌人有可能来进攻我们，要注意巩固根据地，所以这不是冒险主义。

第九个问题，准备转变。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我们提出过，但那时只是一种希望。那时候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那时我们前面的敌人是日本人，后面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我们被夹在中间。我们的力量在那时是个小手指头。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点，也不多。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增加

力量，长大起来。加一个指头，又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使它长大起来。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游击战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是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一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动我们，挑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我们现在要“就敌就粮”。敌人的据点很多，但敌人只有点、线及小面。敌人要搞点、线，我们就分散搞面，这是“就敌”。人要吃饭，集中在一起没有饭吃，要分散吃饭，这是“就粮”。内战时期搞正规化，就是因为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没有搞通这一点。军队不生产，专门吃老百姓的，吃上几个月，吃上一年，粮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来个万里长征，可谓“英雄豪杰”。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

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灭你一百人。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报告里写了这样一条，有哪一天我们得到新式武器，就会更加无敌了，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包含准备转变的意思。在解放区的任务里面，我讲到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就是说，进攻应在前，防御应在后。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将来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时，如果没有准备就不好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方针也要变，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爆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

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说要我搞乡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确。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没有那么多房子，乡村没有人去，行吗？所以我在报告中号召大批知识分子下乡，不要穿学生装，而要穿粗布衣。但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由于作战方法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也要准备在这个转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一定会或多或少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我们准备得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少一点，准备得不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多一点。这一点中央应该有准备，各地也应该有准备，事先要头脑清醒，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这样意见分歧可能减少一些。

第十个问题，军队与地方。要深入农村，争取国民党统治区，争取沦陷区。我们要夺取大城市，但我们现在的旗子并没有插在北平、武汉，还是插在山上，像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等等。我们

现在的根据地，是战略的出发地，但现在拥有的人口太少了，我们要发展到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一半。我们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中十万军队。首先因为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的军队，我们就能集中地从日本人手里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条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将来我们是“武器加数量”，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几百万军队，全国老百姓负担也并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况下，扩大军队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我们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军队，但是如果到处扩大，扩大得不亦乐乎，一月、两月没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对了。所谓在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十一个问题，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召集这样一

[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45年7月13日，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开会，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日本投降以后，因为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个会议，是我们大会向各解放区人民的提议，这是一件大事。报纸上还没有公布。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当然要搞也可以搞，现在各解放区也有普选，但是这次我们要求比较快，不能太慢了。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东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同志们！我那个政治报告名叫《论联合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讲得很少，在这里就讲一下。请委员长组织联合政府，我们请了没有呢？请过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来同志去请过，我们《解放日报》、新华社不是几天就请一次吗？你每请一次，他总是摇头，不大高兴。他说组织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怎么就是推翻政府呢？我们说是和他联合，他说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们说开党派会议，他就叫“分赃会议”，他说他的政府是赃，不赞成人去分。周恩来同志同蒋介石讲：“孙中山先生讲过，将来要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说：“你们把我的政府当作北洋军阀的政府，你们就是总理！”那个人实在难得讲理，还有一点流氓脾气，比较坏。

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党外人士要占大多数。我们准备选举一个机关，它的名称叫什么好，大家都想一想，你们想的也许很好。现在拟定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要解放中国人民，谁人敢讲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权利，都要争取这个

权利，反动派如干涉进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权利，是绝对不许可的。提起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骂我们“称王称霸”，我们就是称王称霸，是称解放之王，称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们解放！

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讲到我们党内，这一点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党这个军队同人民的其他军队比较有许多特点，它是先进的部队，是

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干这样工作也好，干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

我们党现在是不是统一了？历史决议案上写着空前的统一，这是说比较过去要统一，没有讲党是完全统一的。有的同志讲："放下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

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1]。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2]。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是解决了生产问题，没有生产党也不能前进。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

[1] 吴满有，1942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赵占魁，山西定襄人，1939年进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司炉工。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和劳动英雄。张治国，陕西吴堡人，1943年任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七团第七连副班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2] 客里空，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写的话剧《前线》中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的名字。

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1]，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2]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还有到杨家湾小学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女同志，在清凉山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医生，他们和老百姓结合得很好。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有一段时间《解放日报》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3]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2] 赵毅敏（1904—2002），河南滑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3]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

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历史问题也比较恰当地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那天在预备会议上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

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比如讲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应在这些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各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的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党务工作方面也有根据地、沦陷区等各种工作地区的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上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有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党内几部分干部的问题。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我们对这几部分同志要特别注意。

（一）理论工作者。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因此我们党内要学习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

做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

（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

---

[1]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1章第4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1]。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2]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3]，《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

[1]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苏格拉底，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2] 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3]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的主要谋士。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刘伯温，即刘基（1311—1375），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受朱元璋礼聘参加起义军，提出时务18策。明朝建立后，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三）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一到根据地里头，他们就感觉吃不开。根据地里的首长多得很，看起戏来，首长总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长、中首长、小首长，这些同志心里怄气。审干的时候又找了他们的麻烦。“你是哪里来的？上海？西安？”“有没有问题？”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你住在哪一个旅馆？”“有没有介绍信？”因为我们根据地都要介绍信，以为在上海住旅馆也要介绍信，你说没有介绍信，那就怪得很。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这些同志对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作风问题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我在报告里头已经写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1]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我提倡作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们历史上的大纠纷。这一次开完大会之后，还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1]，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树声[2]，出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过这些话。不要怕多讲，不要怕讲得舌敝唇焦，现在看来，舌也没有敝，唇也没有焦，我们说得还不够。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

---

[1] 王首道，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委员。王震，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2] 戴季英，当时任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人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

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五）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在军队里面有后勤工作，在整个根据地、解放区有广大的经济工作，有广大的同志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对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们提倡、宣传得不够，使得许多同志感觉到，在这些部门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没有地位。我曾经讲过，延安有一个同志告诉我，要他做总务处长，他不愿意当，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不起。人家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做一般工作。为什么他说做一般工作呢？是因为做总务工作吃不开，现在我们应当使他们吃得开。有些同志认为，做军队工作、党务工作吃得开，在军队里面是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开，做后勤工作还是吃不开。因为他们吃不开，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们吃得开。

（六）民运工作干部，工、青、妇干部。这些干部也感觉吃不开。有人把他们叫做“杂牌军”，其实都是“中央军”，没有什么杂牌军。大城市打开以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开展起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现在留下的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我们要照顾他们，尊重他们。同样，没有青年工作、妇女工

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我们现在还叫他们是新干部，好像老干部就是万里长征来的，那就没有几个大人，不过一两万而已。同志们，在座的多数同志是老干部，因为你们富有经验，领导正确，所以被选为代表，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做工作的同志，数目虽小，没有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把经验当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轻轻快快。对同志们讲一个数目吧！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和内战时期入党的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几万。否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味道大得很，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这样不好，我们年纪比较老，并不十分漂亮，还是他们比较漂亮，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大多数是青年同志，当然年纪大的也有。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没有我们不行，没有他们也不行。两万人的眼睛要看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要尊重他们，不要使他们感觉这两万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跟你谈话时到底怎样讲法。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1]，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要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党外干部。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

---

[1] 胡适之，即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这句话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73页）。

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

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1]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

---

[1] 徐老，指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参见《论语·为政》。

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

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1]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

---

[1] 徐老，指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参见《论语·为政》。

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1]，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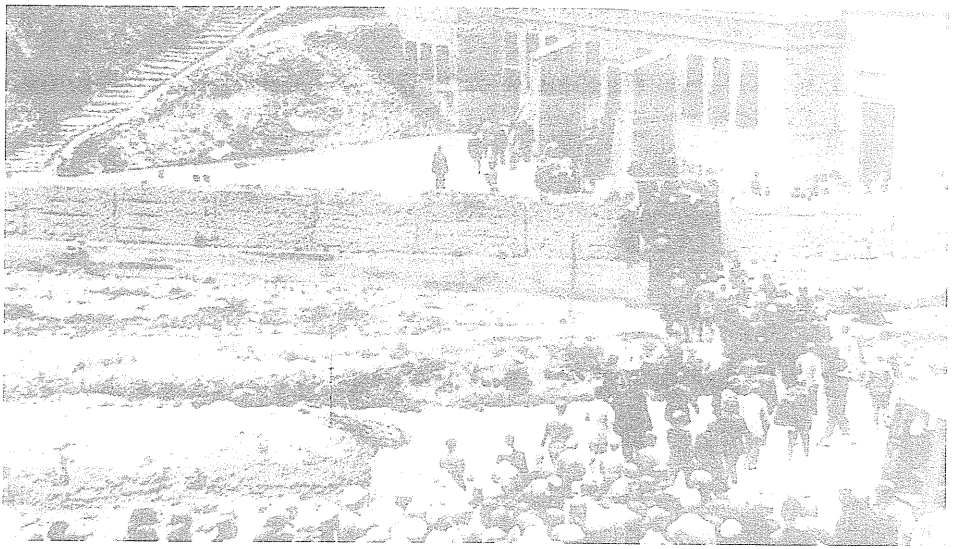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

[1] 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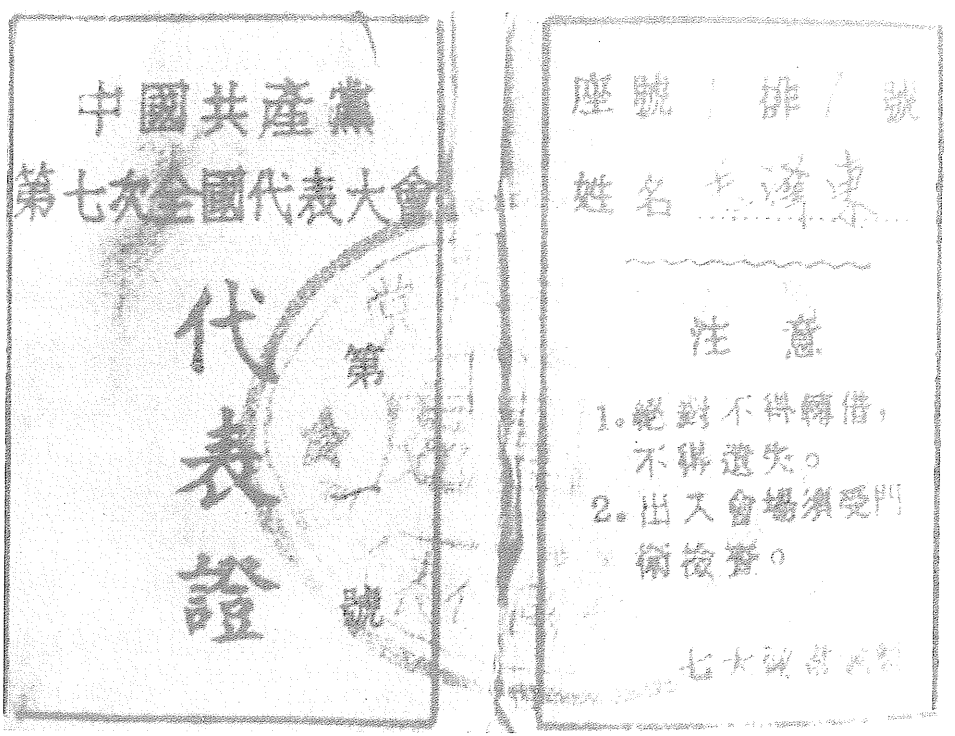
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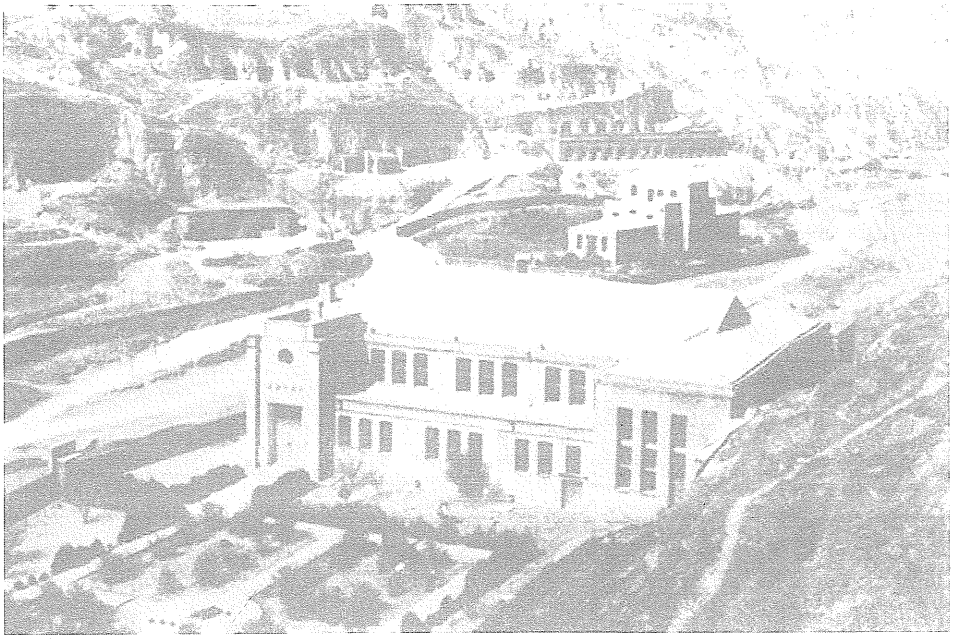
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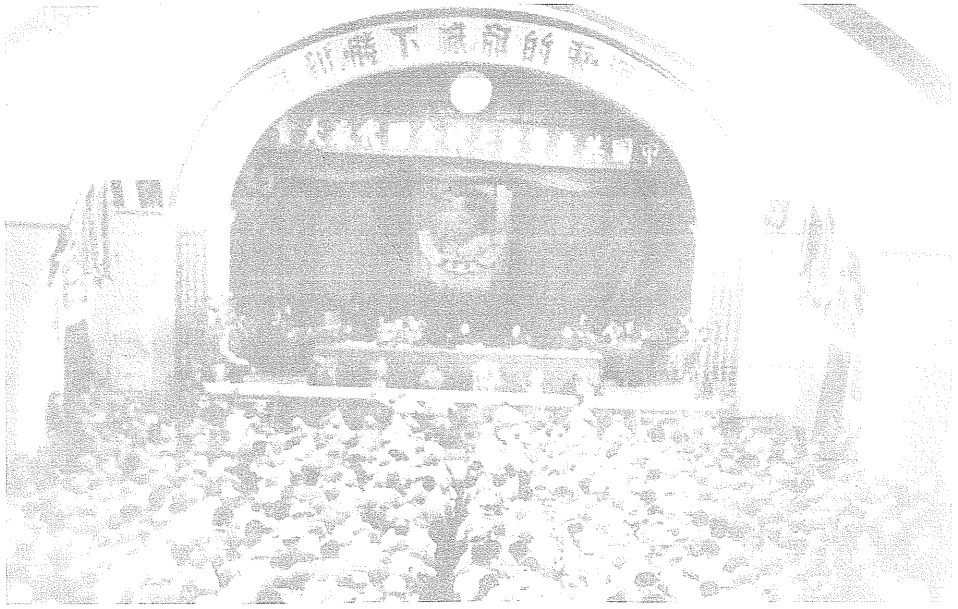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图为七大代表正在进入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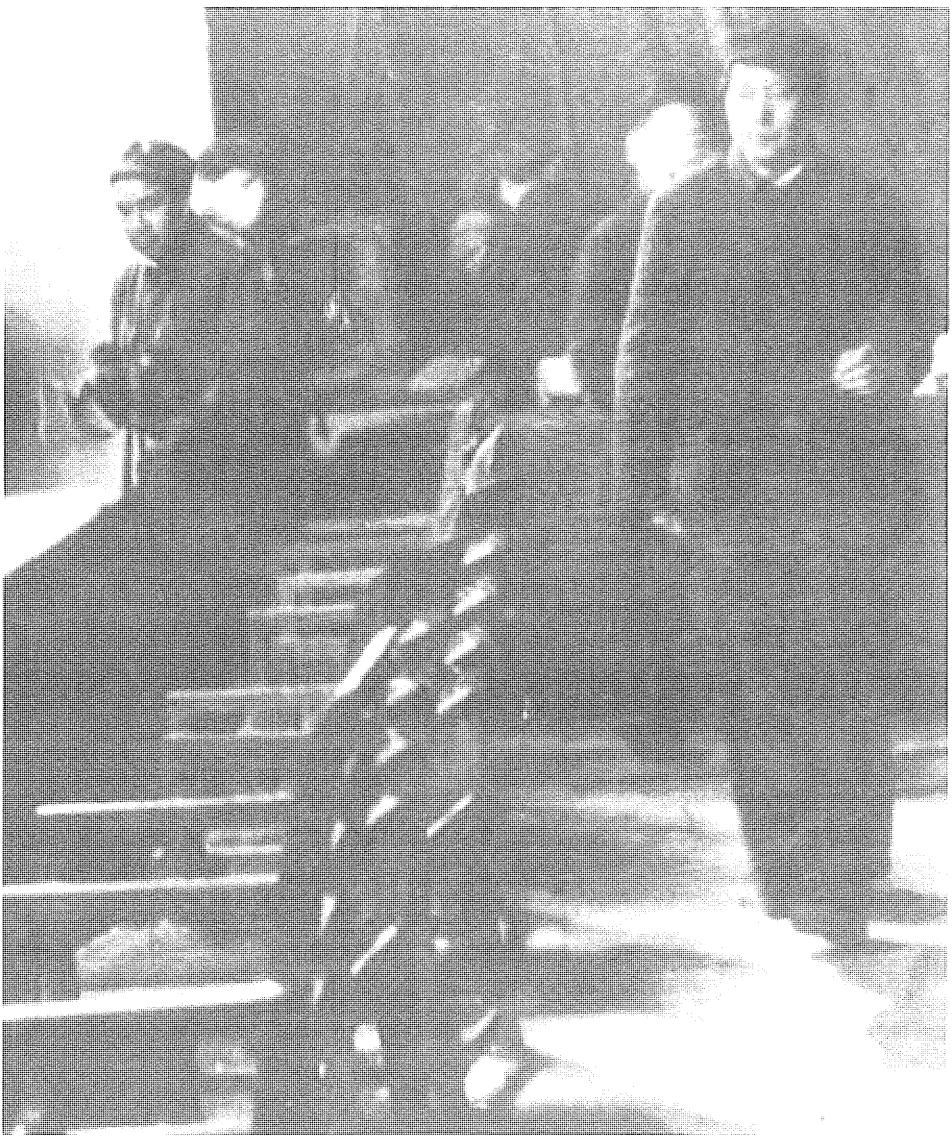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中共七大会议旧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毛泽东等步入七大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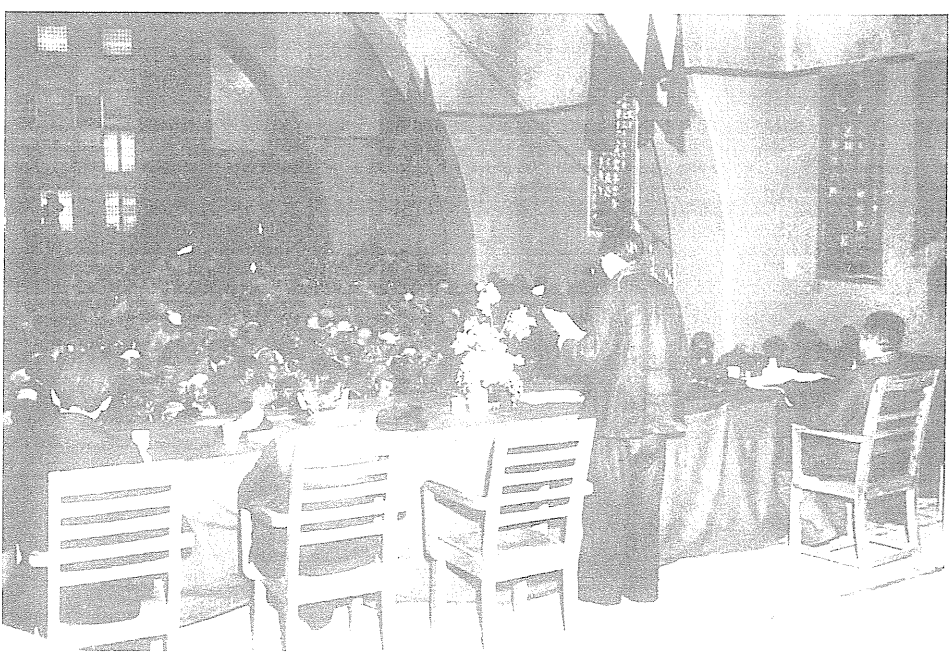
毛泽东等在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台上作报告。



毛泽东在七大上致开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口头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级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



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台上作报告。



毛泽东在七大上作报告。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中国画）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0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